

# 陶淵明評傳



蔡日新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九日編訂

## 作者簡介



蔡日新，字志遠，號企愚。

1951年5月生，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原來從事教育，現為

自由作者。早年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曾經發表探討中國古典文化之論文數十篇，有《說文敘篇疏證》、《仁學注析》、《陶淵明評傳》、《容膝居室文鈔》等著作。後來從事佛教文化的研習，先後出版了《禪之藝術》、《禪門悟道公案選析》、《希遷與曹洞禪述評》、《洪州禪述評》、《禪門天皇史略》、《中國禪宗的形成》、《禪悅人生》、《楊仁山居士評傳》、《漢魏六朝佛教概觀》、《臨濟禪法述略》、《五家禪源流》等著作。著作及論文發表地涵蓋中國（含台灣與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頗受讀者的好評。

## 自序

《陶淵明評傳》的殺青，至今已有兩年多了。由於筆者後來由於準備作一個禪宗研究的大課題，以故暫且將之擱置了下來。

陶淵明的祖籍在「五溪」，屬於今天的常德地區，後來徙居於潯陽。由於受兩晉以來所形成的那種嚴格的士庶制度的制約，原本出身寒微的陶氏家族，到了陶淵明的祖父陶侃時，才好不容易躋身於士林。爲了給陶侃一個出頭的機會，陶侃的母親湛氏作出了巨大的奉獻。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嚴冬，鄱陽孝廉范逵投宿於貧寒得徒有四壁的陶侃家，這可使當年的陶侃非常爲難。而他的母親湛氏卻叫陶侃儘管去留客，她自有辦法來招待客人。爲了招待好范逵，以便給陶侃的升遷尋找一個機遇，湛氏將自己所蓄的長髮割下來賣掉換成了米，將自家的屋柱削小一半以當柴火，將自家的草席鋤了充當馬草……范逵在得到了陶家這樣難得的禮遇之後，又激賞於陶侃的「才辯」，遂推薦陶侃到了張夔的門下做了個督郵。後來，由於陶侃屢立戰功，他在金戈鐵馬的拼殺中終於換來了東晉王朝給他的封妻蔭子，致使當年的陶侃任荊、江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反思陶侃的這一發跡，自然少不了那位賢母的幫助，湛氏也因為陶侃的發跡而被後人視爲賢母的代表，其行狀收錄於《列女傳》之中。

另一方面，在東晉那個玄風熾盛的歷史年代裏，陶侃卻表現出了與時代精神迥然不同的作風，他具有向上的積極進取精神。據《晉書》本傳記載，陶侃經常向人們說：「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他十分強烈地反對他的部下飲酒、賭博，也極力反對當時盛行的老莊「浮華」，他所崇尚的是一種十分踏實的作風。另外，在《世說新語》卷三收有陶侃「竹頭木屑」的故事，也足以見出陶侃謹嚴的吏治作風與厲行節約的優良品德。但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士庶制度裏，儘管陶侃具有這樣一些美德，但仍不免要遭到當時貴族的歧視，陶侃甚至還被某些貴族辱罵爲「溪狗」……

陶侃的家族延續到了第四代時，出現陶淵明這樣一代不朽的詩人，他以其飄逸、灑脫的田園詩風獨擅於東晉的文壇，為中國的詩歌創作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領域。相比之下，陶淵明的名聲遠遠地超出了他的先祖陶侃，他同時也是中國詩壇不可多得的大家。因為，陶淵明的藝術創作不僅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寶貴遺產。反本窮源，陶淵明那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作品，雖然是創作於江西的鄱陽湖畔，但其先祖的根源畢竟還是在常德的武陵。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要稍微思索一下《陶集》中那篇膾炙人口的《桃花源記》，就不難見出陶淵明的這種戀祖情結。

在中國文學史上，像陶淵明這樣率真的詩人並不多，達到其藝術造詣的詩人就更不多了，因而筆者戮力成就是書，作為本人天命之年的作品。由於此著完成於 12 年前，電子文檔存在不少錯誤，加上當年 Word 版本較低，也常常出錯，因今賦閑，姑且校正昔日舊稿云爾。

時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長沙酌爽齋主人蔡日新謹識

# 目 錄

自序	3
引言	6
一、陶淵明的家世與青年期	10
(一) 陶淵明的家世	10
(二) 陶淵明的青年期	25
二、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35
(一) 陶淵明的第一次出仕與歸隱	35
(二)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與歸隱	48
(三) 陶淵明的第三次出仕與歸隱	80
三、陶淵明的歸隱期	99
(一) 陶淵明隱居生活的前期	99
(二) 陶淵明隱居生活的中期	118
(三) 陶淵明隱居生活的後期	135
四、陶淵明的晚年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145
(一) 陶淵明的晚年	145
(二) 陶淵明對後世的影響	181
五、附錄	192
(一) 關於陶集中未定年代的作品	192
(二) 蕭統《陶淵明傳》	203
(三) 顏延之《陶徵士誄》	204
(四) 陶淵明詩文繫年表	206
後記	208

## 引言

兩晉的統治基礎是由司馬氏爲主的大地主、大貴族集團組成的，這個統治集團的目標就是爲了維護以司馬氏爲首的貴族集團的利益。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年代裏，廣大的人民群眾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作爲貴族的司馬氏集團在精神上道德淪喪、品性卑污，他們幾乎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那些具有正義感的人士則大加政治迫害，乃至動輒殺戮，許多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諸如何晏、嵇康、郭璞、潘岳、陸機、陸雲、劉琨等，都慘死在他們手裏。

西晉的統治基礎在那些醉生夢死統治者的運作下終於釀成了其自身滅亡的悲劇，「八王之亂」的爆發，致使許多人民捲入了毫無休止的戰亂之中，西晉的統治基礎也隨之而崩潰。發跡於西北的少數民族也乘機進犯中原，整個華北不久被他們佔據，接踵而至的是「五胡十六國」的統治，由此給人民帶來的仍然是一個動亂的政治局面，而這個動亂的局面又長達數百年之久，中原人民的苦難生活就可以想見了。

與此同時，在「八王之亂」以後逃難到南方的貴族，他們在以王導爲首的貴族代表領導下，共同推舉了一個毫無進取心的司馬睿爲晉王，在南方建立了一個苟安的東晉王朝。儘管東晉的統治者不圖進取、無所作爲，但無奈天意憐之，仍然使它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其間雖然出現了桓溫父子（桓溫與桓玄）的陰謀奪權以及後秦苻堅的南窺，卻都沒有能使這個該死的王朝滅亡。直到後來太尉劉裕掌權時，纔實現了其篡位的目的，由是東晉王朝的氣數也真正完結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劉宋王朝，中國的江南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更替，史稱南朝。

儘管兩晉的統治是非常殘酷的，兩晉的人民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但這個在以大地主、大貴族爲首的統治集團維繫下的王朝，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卻是空前的。這一方面是因爲那些大貴族有了非常優裕的物質條件，自然可以考慮從事文化藝術的生產了；另一方面，由於當年的崇尚清談、講究對形而上的哲理作思辯的玄風曾一度成爲社會

## 引 言

主要的意識形態，而這一意識形態對於促使文化藝術意境空靈與完美，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加之由西域傳入的佛教也對在伴隨著這種時代精神而傳播開去，佛教「般若」的無上智慧自然也被玄學思想所接納，同時也對當時的文化藝術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在那個時代燦若群星的文藝作者之中，卻也不乏一些具有崇高品質與精神的作者，他們儘管在統治者的高壓乃至殺戮的恫嚇下，仍然不低頭，因而給後人留下了極富價值的意識作品。而在這一類作者之中，我以為陶淵明的人品與作品均具有不朽的價值，他的詩文創作應當可以代表東晉、乃至整個六朝文學創作的峰巔。

陶淵明作為一代田園詩人，連他的傳記也給編入了「隱逸」一類之中，乍看勢必還會使我們以為他對於社會不無多大的貢獻。其實不然，陶淵明作為隱逸詩人固然是不錯，但未見得隱者就全都是逃避現實、全都是無所作爲的。若果將一個作者放在一個具體的時代裏去加以考察，祇要那個社會是頹廢的、沒落的，而人們又處在無法去改變那種社會現實的情況下，那麼，人們與其去同流合污，還不如隱居以保持自己的清操為好。從這一角度來看，隱居比起那些熱衷於名利、幹盡了壞事的人畢竟要好得多。

即便是太平盛世，也未見得人的際遇都很好，也總還有不得意的人存在，這些人如果沒有甘於隱遁的思想，則對於他自身與社會都不會有好處。況且，有時多了能人，對於那個社會、那個時代也未見得是福，例如秦末農民起義以後的「楚漢戰爭」，長達近十年，其間對於人民帶來的恐怕不是幸福而是災難；又如三國時期的長達近百年的戰爭，畢竟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地損失，給那個時代的生產力帶來了嚴重地破壞，因此，小說裏「既生瑜，何生亮」的慨歎，也未見得就沒有一點道理存在。

歲月流逝，時代遷流，自然會有不少的英雄人物被湮沒，而人生的際遇不幸，也會使得一些能夠有所作為的人物的風采才華無法施展。陶淵明恰恰就是屬於人生際遇不幸的那樣一類人物，他不但出生在那個由大地主、大貴族組成的沒落的東晉王朝，而且又處在東晉王朝政治鬥爭劇烈、戰亂頻繁的年代裏，這對於他的人生選擇來說，恐

怕也祇有當隱者的唯一選擇了。

自然，在隱者之中，也有像孔稚珪《北山移文》裏所說的「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的「周子」那樣一類沽名釣譽的人物，那種人一旦遇上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就會「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sup>①</sup>。但陶淵明不是那種人，他的隱居不但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其隱居生活是非常貧困的，且他在當年完全可以混個一官半職，斷不至於生活那般清苦，但他爲了使自己的清操得以保全，他毅然選擇了這條艱苦的道路。爲了保全他自身獨立的人格，陶淵明不但放棄了作官的打算，而且還不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他寧可親自下地耕種，寧肯過著衣食不敷的困窘生活，也不接受來自統治者的嗟來之食<sup>②</sup>。正因爲陶淵明具有這樣一種可貴的精神，他不祇是創作了許多不朽文學作品，而且也成就了他完美的人格。

陶淵明的生平事跡，雖然在多種的史傳中均有記載<sup>③</sup>，但畢竟還是語焉未詳，那些文獻只給我們描述了陶淵明這個人物的大體性格，其具體材料保留下來的並不太多。由此，我們的「評傳」，祇能將史傳與陶淵明的詩文創作結合起來，從而力圖恢復陶淵明這個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與此同時，我們對於陶淵明的述評既是歷史的評述，同時也應當是美學的評述，因爲陶淵明的作品畢竟在中國美學史上產生

---

① 參見《古文觀止》293頁，中華書局（北京）1959年版。

② 據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所載，他當年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其中的「環堵蕭然，不避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等語，足以見出陶淵明當年生活的困窘；又如《自祭文》曰：「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可見陶淵明當年的生活困窘之一斑了。但陶淵明處在這種困境中，對於一般的來歷不明的人的饋贈，他是堅決拒絕的。《南史·隱逸傳》載陶淵明曾經一度貧困，且「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疾餒有日矣。道濟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③ 對於陶淵明的生平事跡的記載，早在蕭統編輯《陶淵明集》時，便作了傳記，在《晉書·隱逸傳》、《宋書·隱逸傳》、《南史·隱逸傳》等史傳中，均收錄了陶淵明的傳記。但各種文獻之間，均大同小異，並無許多新鮮的事跡，後人儘管在研究陶淵明方面有所突破，但諸多考證也都還存在許多須要重新印證之處，因而陶淵明真正可供研究的材料並不太多。

## 引 言

了非常深遠的歷史影響。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美學的評析，以凸顯這位偉大詩人的高操，以窺視這位偉大詩人的藝術造詣。

## 一、陶淵明的家世與青年期

陶淵明的思想與性格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個特定的時代，也取決於他所處的家庭環境及其文化教養。我們可以這樣說：是東晉社會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和陶淵明那個特定的家庭環境與教養，造就了陶淵明的人生理念與審美尚好，使之成爲了一代偉大的詩人。

### （一）陶淵明的家世

在東晉那個以貴族爲統治基礎的社會裏，陶淵明作爲東晉開國元勛大司馬陶侃的曾孫，他自然是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對於陶淵明是陶侃後裔的這一家世的記載，各種文獻幾乎都是一致的：《晉書·隱逸傳》說：「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sup>①</sup>《宋書·隱逸傳》說：陶淵明「曾祖侃，晉大司馬。」<sup>②</sup>《南史·隱逸傳》也說：「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sup>③</sup>蕭統所作的《陶淵明傳》也曰：「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sup>④</sup>這麼多的文獻都一致記載陶淵明是東晉開國功臣陶侃的曾孫，想必應當不會再有訛了。但在《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中載：「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sup>⑤</sup>

在這裏，並無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的名字，因此，有人據此而認爲陶淵明並非陶侃的後裔。顯然，這種說法恐怕過於武斷了一點：因爲，

---

① 參見電子本《二十五史》中《晉書》卷七十四 635 頁，山東出版總公司 1998 年 1 月版。

② 參見電子本《二十五史》中《宋書》卷五十三 391 頁，山東出版總公司 1998 年 1 月版。

③ 參見電子本《二十五史》中《南史》卷六十五 614 頁，山東出版總公司 1998 年 1 月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 頁，作家出版社（北京）1956 年版。

⑤ 參見《晉書》卷 66 之 1779 頁《陶侃傳》，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陶侃有十七個兒子，見於舊史者雖然僅僅九人，其中畢竟還有八人未見於舊史，此其一。其二，在《晉書》的《隱逸傳》中分明說陶淵明不但是陶侃的曾孫，而且還說他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這就說明了陶淵明不祇是陶侃的孫子，而且陶茂也應當確是陶侃的兒子，祇是因為史書採用了互見的方法描述而已。其三，在這麼多的文獻中都說陶淵明是陶侃的曾孫，其中沈約的《宋書》與蕭統的《陶淵明傳》的成書是比較早的，想必他們應當是有所本的。此外，在陶淵明的《命子》詩中，也分明說：「在我中晉，業融長沙」，又說：「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酬我，專征南國」<sup>①</sup>，這些話，想必也並非是攀龍附鳳之說，因為憑著陶淵明那「率真」的性格，也是絕不會出現一絲的攀附之舉的。

如前所說，兩晉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貴族構成的統治基礎，在那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裏，對於一般平民來說，儘管你有如何有出色的才華，也是很難有出頭之日的。東晉這個由大貴族王導與司馬氏組成的社會，自然也不會例外，而且其中還存在著更加復雜的南北方貴族之間的矛盾。西晉滅吳以後，對於南方的士族就一直採取打壓政策，陸機在推薦賀循的《表》裏曾經這麼說：揚州人士現在還沒有人做到郎官的，荊州和江南人士在京師作官的一個也沒有，這就可以想見當時司馬氏對南方人士的打壓情況了。東晉這個由逃難的貴族所組成的政治集團，儘管他們偏安於江南，對於江南的士族不得不採取一些調融的政策，但在他們的骨子裏是看不起江南的士族的。而南方的士族對於北方逃難來的這群貴族也抱之以蔑視的態度，例如陸玩因在王導家裏食酪而生病，他寫信給王導說：我雖然是吳人，卻幾乎做了傖鬼（南人輕視北人的稱呼）。南方士族對於北方士族擁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不服的，義興郡（江蘇宜興）強族周玘因為被北人輕侮，準備起兵殺諸朝政當權者，以南士代北士。後來其陰謀敗露了，他憂憤而死，臨死時還囑咐兒子周勰說：我是被那伙傖子氣死的，你能替我報仇，纔是我的好兒子。南北方的士族在通過一段衝突之後，逐漸由對抗轉

---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1頁，作家出版社（北京）1956年版。

化爲調融，這顯然與王導對南方士族採取忍讓與調和的政策相關，王導爲了聯絡南方的士族，他放下了北方士族那高傲的架子，常常說吳語，他在周勰替他父親報仇的舉措敗露之後，也能採用包容的態度而不再追究，這便使得南北方的士族之間的隔閡逐漸地消除了，同時也使北方的逃難政治集團能夠在南方立住了腳。

但東晉王朝的君臣是並不圖進取的，他們對於北伐中原、收復失地的祖逖採取歧視的態度，祖逖屢次擊敗石勒軍，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全部失地，但晉元帝給祖逖的封賞卻僅僅祇是一個鎮西將軍的稱號。321年，當祖逖準備渡過黃河出擊石勒，收復河北時，而晉元帝卻派遣了徒有虛名的戴淵做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而真正出征的祖逖的官職卻僅僅是鎮守，而且祖逖已收復了的或未收復的州郡都得以戴淵來統轄，致使祖逖報國無門，就在這一年因憂憤成疾而死去。晉元帝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擔心祖逖在北伐中原中建立了戰功，會擁有很高的威望，則對於保全他本人的帝王寶座會有不利。殊不知他這樣斤斤計較於內部的權力鬥爭，反而致使他自己原來很有限的一點威望也因此變得日益縮小了，這對於保全他的王位反而更加不利了。東晉王朝就這樣忙碌於內部的權力鬥爭之中，後來儘管有謝安主持了淝水之戰，挫敗了苻堅的軍隊，但卻未能乘勝追擊，一舉收復整個北方，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曾祖陶侃** 在陶侃所處的那個時代，非但是平民不可能有出頭之時，而且也同樣是處在北方的士族輕視南方士族的那樣一種意識形態之中，這相對於陶侃這樣一類出身寒微的人士來說，顯然是很難躋身於士林階層的了。據《晉書》所載，陶侃是鄱陽人，其父親陶平是前三國時吳國的揚武將軍，後徙居廬江之尋陽。但這種記載究竟可靠與否，還很難說，因爲在陶侃微時，他雖然是在縣衙裏做了一個小官吏，但畢竟並不顯達，因此，在鄱陽孝廉范逵經過陶侃家時，陶侃的母親想盡千方百計來招待范逵，纔好不容易使陶侃找到了一個升遷的機會。對此，《世說新語》是這樣記載的：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

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爲半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遠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遠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遠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乃返。遠及洛，遂稱之於羊晷、顧榮諸人，大獲美譽。<sup>①</sup>

《晉書》卷六十六的《陶侃傳》所載與此略同，祇是描寫得更爲直接一些而已。當時，陶侃送范逵至百餘里以後，范逵說：「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於是，范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由是召陶侃爲督郵，領樅陽令，後來陶侃纔逐漸升遷至主簿。陶侃爲了能夠有機會升遷，他不惜討好張夔，《晉書》載：「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值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眾咸服其義。」<sup>②</sup>陶侃就是憑著他這樣的一種恭謙態度爲人，而逐步地躋身於士林、乃至最終成爲侯王的。

陶侃所走過的人生道路，畢竟是一條非常曲折而又坎坷的道路。他後來通過屢次的戰爭，多次建立了赫赫的戰功，這樣纔逐步地躋身於士族的高級行列。陶侃一生多次地建立了戰功，其中最大的有兩次：第一次是因爲關西流民入蜀，發生戰爭，巴蜀人數十萬家十餘萬人因避亂而流入荊、湘二州。流民由於遭到當地豪強的侵奪，被迫聚眾自衛，而荊州刺史王澄殺流民達八千餘人，湘州刺史荀眺也圖謀殺盡流民。這便致使流民奮起反抗，他們推舉杜弢爲首領，一下就攻陷了長沙。陶侃受命出擊杜弢，他經過與杜弢的多次作戰，終於在 315 年將杜弢的軍隊打敗，陶侃此次因戰功而被封爲柴桑侯，食邑四千戶。第二次是他平復蘇峻之亂所建立的戰功。晉成帝執掌政權時，外戚庾亮當權，他排斥王導，疑忌上游重鎮的荊州刺史陶侃，任意殺逐大臣，引起了各股貴族勢力的不安。327 年，野心家歷陽鎮（今安徽

<sup>①</sup> 參見《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169 頁～170 頁，岳麓書社 1989 年版。

<sup>②</sup> 參見《晉書》卷 66 之 1768 頁《陶侃傳》，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和縣)將蘇峻、壽春(安徽壽縣)鎮將祖約以殺庾亮為名義,率領其叛軍攻入建康(今江蘇南京)。幸虧陶侃與溫嶠起兵救援,遂於329年擊破祖約、蘇峻軍,使東晉王朝得以轉危為安。陶侃通過這次所建立的軍功,他「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百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sup>①</sup>顯然,陶侃的一生除了善於處理好他與上司的關係以外,他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披堅執銳、在鐵馬金戈中所建立的戰功而獲得封賞的。

陶侃的一生是銳意進取的,面對當時東晉王朝的貴族中所存在的頹靡風氣,他並不苟同,而是持反對的態度。《世說新語·政事第三》載他: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竹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sup>②</sup>

像陶侃具有這樣一種節儉謹慎的性格,顯然與當年貴族們那種豪奢腐朽的生活作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雖然建立了如此大的戰功,而在當時的貴族階層中,仍然有人對他抱以蔑視的態度。這一方面因為陶侃本來就出身寒微,另一方面還因為陶侃的籍貫是屬於少數民族。在《世說新語·容止篇》,記載了當時貴族對他這樣的辱罵: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公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sup>③</sup>

在這裏,陶侃雖然建立了不朽的戰功,他為平復東晉王朝的這場內亂立下了汗馬功勞,則本來應當受到人們的尊敬,但在陶侃的背

①參見《晉書》卷66之1775頁《陶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參見《世說新語·政事第三》36頁,岳麓書社1989年版。

③參見《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151頁,岳麓書社1989年版。

後，溫嶠卻將之辱罵為「溪狗」（對當時少數民族「溪族」的侮辱）。可見，在東晉王朝的那些貴族眼裏，是壓根兒就沒有看重過陶侃的。惟其如此，陶侃對於當時貴族的腐朽的生活作風也不屑一顧，他大膽地提出了與當時貴族們截然不同的人生尚好。《晉書·陶侃傳》載陶侃所常說的那段話，就足以見出他的這種人生尚好來：

（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撻，曰：「樗蒲者，牧豕（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sup>①</sup>

在兩晉時期，貴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說是頹廢的，他們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例如何曾、石崇生活的那般奢侈，在今人看來都會要咋舌。事實上，像那樣一種生活方式，不但容易消磨一個人的意志，而且也將對社會的發展帶來嚴重阻滯。面對當時貴族的奢靡生活方式，陶侃提出了與之截然相反的生活態度，那就是要愛惜每一寸光陰，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要力圖在非常有限的人生中作出不朽的事業來。他認為：祇有這樣的人生纔是充實的，纔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會與豬狗等畜生的生活一樣無任何區別。因此，他對於部下的酗酒、耽於樗蒲等遊戲是非常反感的，他毫不留情地將那些酒器與樗蒲等遊戲玩具全部扔進了長江。

另外一個方面，自曹魏以來就對兩漢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作了突破，而到了西晉時期，人們所崇尚的則是富有老莊色彩的玄學思想，貴族士人之間的談吐往往具有一種「玄邈」的特色。這在思想的解放這一方面看來，應當是屬於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傾向，但蘊藏在當年那些士大夫的清談中的內容畢竟是空虛的、毫無實際意義的，因而對於這種附著在老莊皮毛上面的玄風，也就沒有很值得提倡的必要了。陶侃對於這樣一種社會風尚頗為反感，他因此而提出了「君子當

<sup>①</sup>參見《晉書》卷 66 之 1774 頁《陶侃傳》，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的主張，他要求貴族們自己振作起來，去掉那些浮華的清談言辭，而去積極地從事一些富有現實意義的事業。顯然，他的這種見解的提出，對於糾正沈溺在玄風之中的兩晉社會意識形態的偏頗，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可惜陶侃的這種提法未能得到廣大貴族社會的認同，因而在東晉長期以來，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那種崇尚清談的玄學思想。但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陶侃的這種思想雖然對於東晉的社會意識形態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它對於陶氏的後代子孫來說，畢竟是至為珍貴的祖訓了，尤其是對於陶淵明的人生理想，則不無深遠的歷史影響。因此，我們在考察陶淵明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時，對於陶侃的這一祖訓是切不可忽視的。

無可否認，在陶淵明的詩文裏，蘊藏著一種飄逸的自然風度，充分地展示了一種永恒且又靜穆的美學氛圍，這種美學風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陶淵明對當時道家思想與傳統的老莊哲學思想的接受這一點上。但在陶淵明的詩文裏所標舉的「真」（或曰「自然」），畢竟與兩晉時期的那些士大夫所崇尚的玄學思想之間，還是有著很大一段距離的：那就是它剔除了那種片面地追求帶有矯飾特性的玄學思想的偏頗，而是著意於「真實」、著意於事物的「本來面目」（自然）。而其中尤不可忽視者乃是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對於傳統的人文理念，仍然存在著不少持有肯定態度的成分。他認為：「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sup>①</sup>，在他隱居的逸趣中，也不乏「詩書敦夙好」<sup>②</sup>的雅興；在《責子》中，他對「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sup>③</sup>這一現實，是不無悵悵的；在《感士不遇賦》裏，他正襟地提出了「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sup>④</sup>……凡此種種，不能不說明了在陶淵明的思想裏，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仍然是佔有一定的成分的，而這種思想成分的形成，又不得不追溯到他的先人陶侃那

---

<sup>①</sup>參見《陶淵明集》14頁《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參見《陶淵明集》9頁《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③</sup>參見《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④</sup>參見《陶淵明集》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裏。惟其如此，在陶淵明的富有飄逸特色的詩文裏，雖然不無富有老莊思想特色的幽玄風味，但它玄而不虛，倒是不乏「率真」的風骨，不乏對世間萬物的「自然」之理的深切體驗，不乏對樸質醇美的藝術風格的探求。這便使得陶淵明的詩文創作兀立於東晉的文壇，且達到了中國兩晉文學的頂峰，同時也代表了中國田園詩的極坐標。

**祖父陶茂** 陶淵明的祖父為陶茂，這是見諸《晉書》的，我們在上文中也曾提到了。在陶淵明那如同開列家譜似的《命子》詩中，其中的第六首就提到了其祖父陶茂：「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sup>①</sup>，可見，他對祖父陶茂的生平業績是十分讚賞的。

**父親陶逸** 至於陶淵明的父親的生平事跡，則流傳至今的歷史文獻太少了，因而我們一時無法稽考。但在陶淵明的《命子》詩之第六首，也有這樣的記載：「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愜喜。」<sup>②</sup>這就是說：我那已故的父親，他對於身外的名利看得非常澹泊，他具有一種沖虛的氣質，因而在仕途的沉浮中，他沒有任何憂喜存於雄次。據說，陶淵明的父親曾經作過安城太守，但他或仕或隱，並不常居職位。至於陶淵明父親的名諱，據李公煥註《陶集》中《孟府君傳》所引陶茂麟的《家譜》，謂其父名逸。誠然，陶逸故世很早，那時陶淵明纔八歲<sup>③</sup>，他肯定對其父親的印象不會很深，加之陶逸在仕途上並不是很顯達的人物，陶淵明為宗親諱，故在《命子》中只採用掠空幾語，而不似對他的曾祖父陶侃那樣窮極讚辭了。儘管在陶淵明的父親時，其仕途就不十分顯達了，但「瘦駱駝比馬大」，陶氏宗族承襲東晉開國功臣大司馬陶侃的祖蔭，仍然不失為當時的名門士族。陶淵明的家道中落，也畢竟是在他二十歲左右時的事情了，這從陶淵明的

---

①參見《陶淵明集》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參見《陶淵明集》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陶淵明在《祭從弟敬遠文》中謂「相及髻齷，並罹偏咎。」李公煥注曰：「髻與齷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齷。』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曰：「按顏延之之《誄》，有『母老家貧，棒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為失怙良是。則先生失怙可定在八歲時。」

「弱冠逢世阻」<sup>①</sup>與「弱年逢家乏」<sup>②</sup>等詩句中是可以知道的（「弱冠」即古之二十歲）。因為當年的大司馬陶侃曾經兩次得到東晉王朝的封賞：第一次是他征服杜弢時，被封為柴桑侯，食邑四千戶；第二次是他平復蘇峻之亂以後，改封長沙郡公，食邑三千戶。柴桑鄰近陶侃的原籍尋陽，而在他改封長沙之時，陶侃已經在柴桑食采邑達十五年之久了，其間不可能無別業莊園等財產存在，而這一部分財產很可能是陶茂等那些不見諸舊史的陶侃子嗣所繼承了，而隨陶侃遷至長沙的子嗣蓋即見諸舊史的其他九人了。《晉書》載陶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sup>③</sup>，他所創下的這筆家產，在絕對維護士族利益的東晉王朝裏是不應該有多大的變異的。即便是在陶淵明二十歲時的家道中落，也是不無客觀原因的：陶淵明的二十歲那年正值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當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江西一帶因遭受水災而爆發饑饉，因而致使陶淵明的家道中落。但「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sup>④</sup>，那種普通農莊規模在陶淵明四十二歲時（406年）尚且存在，可見陶淵明在二十歲時祇是出現了家道衰落，而斷不至於出現像他晚年的那種貧窘狀況。由此可知，陶侃給子孫們創下的那個家業，畢竟使他的後代有了一個生存的依據，也為陶淵明的從事詩文創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陶淵明的母黨** 關於陶淵明的家庭影響，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那就是他的母親孟氏這個家族。陶淵明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sup>⑤</sup>，也就是說，陶淵明的生母是孟嘉的第四個女兒。孟氏家族與陶氏家族之間，早就有婚姻往來，孟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

---

①參見《陶淵明集》64頁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參見《陶淵明集》95頁之《有會而作》，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參見《晉書》1779頁卷六十六《陶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④參見《陶淵明集》27頁之《歸園田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參見《陶淵明集》1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sup>①</sup>，這種親上加親的婚姻關係，成了陶氏士族與孟氏士族之間牢固的維繫紐帶。對於孟嘉，《晉書》將其傳記次於桓溫傳末，蓋以孟嘉為桓溫的參軍之故。據《晉書》所載，孟嘉的曾祖父就是三國時吳國的司空孟宗，孟宗是一個以孝行著稱於世的人物<sup>②</sup>。《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孫皓傳》中的裴松之《注》，對孟宗的事跡頗有記載。《裴注》云：

《吳錄》曰：「仁（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容，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啼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③

又曰：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哭，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sup>④</sup>

孟宗對母親的孝順一直被後世傳為美談，而孟宗哭竹得筍的事跡，也被元人郭居敬編入了《二十四孝》一書之中。孟氏家族與陶氏家族世代聯姻，因而孟氏宗族的這種傳統也就不可能不對陶氏家族、尤其是對陶淵明產生一定的影響。

**陶淵明與家人** 我們祇要檢閱陶集，就不難發現陶淵明對母親的

①參見《陶淵明集》1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晉書》卷九十八謂孟嘉是「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參見《晉書》2580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又陶淵明在《孟府君傳》中也說孟嘉之「曾祖父宗」，參見《陶淵明集》1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參見《三國志·吳書》1169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④參見《三國志·吳書》1169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孝順、對弟妹的友愛、對子女的仁慈來。據顏延之給陶淵明所作的《誄文》記載，陶淵明當年的出仕，也完全是爲了奉養慈母（「母老子幼，就養窮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其實，我們祇要略微檢閱一下陶淵明三十六歲時（400年）所作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就不難見出淵明的這種情懷來：那種「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sup>①</sup>的思親情結，致使他「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sup>②</sup>。但無奈「凱風負我心，戢柵守窮湖」<sup>③</sup>，陶淵明這次的探母因爲遇上風暴而困於彭蠡湖，此時他所思念的祇有「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sup>④</sup>。

陶淵明不但是那樣地孝敬他的養母，而且對他的弟妹也是非常地友好，他的從弟敬遠與程氏妹都是異母所生，但陶淵明待他們情同手足。當程氏妹亡故時，他毅然放棄了彭澤令的烏紗帽赴武昌奔喪，在陶集中，祭從弟敬遠與祭程氏妹這兩篇文章，則更是情動於中的至文，足見孝悌的傳統美德，在陶淵明的人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此外，陶淵明對於子女也是很富有情感的，儘管他的子女都不大喜歡紙筆，使淵明非常地失望，但他對子女們的責備卻極少，而祇是以「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sup>⑤</sup>來聊以自慰。

我們再來看看他初得長子陶儼時的那種心情，則更加可以見出他慈愛子女的情懷來：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以已焉哉！<sup>⑥</sup>

細讀這兩首詩，我們不難看出淵明對長子陶儼的愛之深、責之切，但

---

①參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之二，《陶淵明集》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參見《陶淵明集》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參見《陶淵明集》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參見《陶淵明集》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參見《責子》，《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⑥參見《命子》詩之九、十，《陶淵明集》6頁~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假若陶儼不能按照他的意志去成長，淵明也祇是用「亦已焉哉」來自我寬諒，而絕無苛求嚴責之意。再則，陶淵明對待他府上的用人，也不乏仁慈霽如之度。蕭統《陶淵明傳》載淵明爲他兒子請了一個傭工之後，還特意寫信囑咐他兒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sup>①</sup>。其字裏行間，充滿了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的那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②</sup>的情懷。淵明這種思想情懷的形成，既與對陶氏家族中傳統美德的繼承相關，但其中更與接受其母孟氏家族中的某些優良傳統的影響相關。因爲陶淵明早年喪父，主要依靠其母親孟氏將他撫養成人，因而他從母親那裏接受的教養，顯然要比從父親那裏獲得的慈訓多得多。

**陶淵明思想的成因** 再者，據陶淵明的《孟府君傳》所載，孟嘉在世時，庾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曾選孟嘉爲「勸學從事」<sup>③</sup>。孟嘉作爲陶淵明的外祖父，他崇尚儒業，這也不能不對陶淵明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上文中，我們曾經舉例說明過陶淵明對於儒家「六藝」的研習，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sup>④</sup>，其間自然也接受了孟嘉的某些思想的熏陶。

通讀陶集，我們還將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陶淵明流傳至今的傳記文字僅僅祇有兩篇，其中有一篇是採用富有《莊子》寓言特色的諧謔式筆調寫成的自傳性作品《五柳先生傳》，另一篇就是替他的外祖父孟嘉所作的傳記（即《孟府君傳》）。在《晉書》卷九十八中所隸的《孟嘉傳》，事實上就是從陶淵明的《孟府君傳》中抽取材料而編次出來的（因爲《晉書》的成書是在唐代，而《陶淵明集》的成書是出於梁朝的蕭統之手）。在孟嘉的傳記中，有兩個典型的事件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第一個事件是：

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

---

①參見《陶淵明集》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參見《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經註疏》2670頁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參見《陶淵明集》1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參見《飲酒》之十六，《陶淵明集》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廟，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sup>①</sup>

對於這一記載，陶集中的《孟府君傳》與此略同，然在孟嘉回敬孫盛的文字上則更加出色：「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sup>②</sup>。孟嘉在宴席上不因為風吹落帽子而失態，且對待別人的嘲笑能毫不遲疑地回敬，這些足以說明他為人的矜莊可敬。孟嘉具有這樣一種矜重的氣質，正是淵明所至為贊即歎之處，這無疑也對淵明那種「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sup>③</sup>的品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陶淵明《孟府君傳》與《晉書·孟嘉傳》中所同時記載的事件中，還有一件更為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事例，那就是孟嘉在飲酒這一日常生活習慣上，頗具特色。《孟府君傳》曰：

（孟嘉）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sup>④</sup>

在這裏，孟嘉與晉代的士大夫一樣，都有好飲酒的習慣，但孟嘉所不同於與之同時代的那些士族的地方，乃在於他飲酒「逾多不亂」。如前所說，兩晉的士族的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其間自然裹挾了諸多對晉代黑暗的社會的一種莫名的恐懼以及暫時的自我麻醉的因素。因此，阮籍飲酒佯狂，而其侄子阮咸的飲酒則更是近乎荒誕了，《晉書》對此頗有記載。

諸阮咸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用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

①參見《晉書》卷九十八 2581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參見《陶淵明集》10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③參見《五柳先生傳》，《陶淵明集》10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④參見《孟府君傳》，《陶淵明集》10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晉書·孟嘉傳》所載與此略同。

便共飲之。羣從兄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勿之許。<sup>①</sup>

像阮籍的飲酒，其意並不在於酒，《晉書》載他「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因而朝中「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sup>②</sup>。顯然，阮籍是在藉飲酒而達到全身遠禍的目的，這在西晉那個特定的社會裏，也是士大夫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但阮咸的豪飲，則顯然近乎醉生夢死了，他與阮籍的佯狂假醉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他不能得到阮籍的認可。司馬氏以殺戮的手段建立了他那個殘酷的政權，致使當時的風俗姪邪，是非顛倒，天下士人學的是老莊，談的是虛無，而其行爲卻如同禽獸，且在仕進上又以無恥苟得爲能。

晉代的統治者雖然行爲卑污，卻又要極力維護那種極其虛偽的禮法制度，於是引起了許多良知尚未泯滅的士人的不滿。《世說新語·任誕》載「阮籍喪母，在晉文王坐，進酒肉」，當時的何曾、文王譏諷他「喪禮」，但阮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sup>③</sup>。顯然，阮籍的這一舉措，對於當時那種虛偽矯飾的禮俗，無疑是一種挑戰。而到了嵇康寫信給山濤時，則更爲大膽地提出了他「非湯武而薄孔周」<sup>④</sup>的主張，這對封建禮法的挑戰也就顯得更加猛烈了。與阮籍同時代的劉伶，尤耽於飲酒，《世說新語》載：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禪衣，諸君何爲入我禪中？」<sup>⑤</sup>

像阮咸、劉伶這樣地縱酒無度，固然折射了西晉社會的腐朽與黑暗，但作爲他們個人的行爲來說，畢竟是不可取的，這與孟嘉飲酒的「逾多而不亂」相比，顯然是失之於放誕。在孟嘉這裏，他並非不飲酒，但他酣飲卻不失態，而是在品味那如酒的人生滋味，他那著意於「漸近自然」的人生尚好，卻不期與陶淵明有著驚人的相似。陶淵明在他那採用諧謔式筆調寫成的自傳作品《五柳先生傳》中，也說他「好飲

①參見《晉書》卷四十九之 1363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參見《晉書》卷四十九之 1360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③參見《世說新語》179 頁，岳麓書社 1989 年版。

④參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文選注》卷四十三 602 頁下，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⑤參見《世說新語》180 頁，岳麓書社 1989 年版。

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sup>①</sup>陶淵明不但嗜酒，而且也常常爲了致酒而犯愁，他的就任彭澤令，也在於「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sup>②</sup>；他還爲瞭解決釀酒的糧食來源而與其妻子翟氏爭執在公田裏種秫與種粳各佔的面積；在淵明的生活拮据時，其好友顏延之送給他二萬錢，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sup>③</sup>。這些足以說明陶淵明是嗜好飲酒的，且在淵明的詩文中，也留下了不少與飲酒有關的篇什。而淵明的「好飲酒」，卻正與孟嘉相似，他也祇是期在「自然」而已。蕭統《陶淵明傳》載淵明「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sup>④</sup>淵明之飲酒期在「自然」，期在品味人生的「真趣」，則與孟嘉的「漸近自然」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

在淵明這裏，沒有酣飲佯狂的矯揉造作，也沒有縱酒放誕的反常與變態，而其義旨全在於對人生這杯「酒」的真實義蘊的深刻體驗，這既是孟嘉飲酒的特色，也是淵明嗜酒的真實意旨所在。說到這裏，我不禁要對陶淵明爲何沒有留下他陶氏宗親的傳記作品，而在他的集子裏卻留下了一篇記載他外祖父的傳記這件事產生深思：《易大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sup>⑤</sup>，蓋如斯而已。由此，我們不難想象出在陶淵明所接受的家庭環境影響中，其母親孟氏與其外祖父孟嘉對他的影響，是何等地直接而又深遠呀！

我們考察了陶淵明的家世，則會發現他的諸多人生理念與尚好，是很得之於其家庭環境與教養的熏陶的。其間既有來自於陶氏家族的直接影響，又有得之於其母親及外祖父一系思想影響的因素存在。這些家庭環境對他的影響，使得陶淵明在崇尚人生率真的「自然」妙境的同時，又不排斥對儒家六藝經典中合理思想的接收；使他能在看透

①參見《陶淵明集》1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參見《歸去來兮辭序》，《陶淵明集》11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參見《宋書》卷五十三392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④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參見《周易·文言傳》，《十三經註疏》16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

人生、澹泊名利，從而求得人生的永恒自由與人格的自在獨立的同時，又能保持中華民族孝敬父母、友悌兄弟、慈愛子女的傳統美德。

## （二）陶淵明的青年期

**時代背景** 陶淵明所處的歷史年代正好是東晉王朝的後半葉，東晉王朝通過謝安等名臣的抑制桓溫集團的篡位陰謀以後，又擊敗了來自北方的苻堅的南侵的軍事勢力，曾一度使東晉王朝的政治出現了轉機。但由於晉孝武帝司馬曜昏庸無能，他重用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讓司馬道子這個酒徒羅織了一批奸臣以排斥謝安。太元十年（385年），謝安病死，東晉王朝的朝政全歸司馬道子，司馬道子委任其兒子司馬元顯當政，由是東晉帝室又出現了晉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的爭權奪利，東晉政權陷入了內亂之中。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京口（江蘇丹徒縣）鎮將王恭聯絡藩將殷仲堪、桓玄（桓溫的幼子）、庾楷等起兵反對晉室，後來王恭被殺，但藩將推舉江州刺史桓玄為盟主，從而形成了大族推翻晉室的中心力量。

朝政的腐敗、士族的爭權，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深重的災難，399年，終於爆發了以五斗目（五斗米教）道徒孫恩為首的農民起義。孫恩的暴動後來在晉將劉牢之、劉裕等人的鎮壓下消滅了，桓玄篡位的軍事勢力也被劉裕殲滅以後，但東晉的氣數從此也就完結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劉宋王朝。陶淵明的一生就是處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裏，他的一生也真可謂是飽經憂患、歷覽動亂了，他深味了那種人間的濃黑與悲涼。但可貴的是這人間的黑暗與腐敗，經過陶淵明以審美理念過濾以後，通過其詩文中所展示的卻是一種濃富悠閑、靜穆美學特色的藝術美。

陶淵明的青年期所保存下來的史料並不多，在陶集中，也很少收錄其青年期的作品，這對於我們考察他青年期的行狀，自然增添了不少的障礙。但我們至少還可以根據淵明所處的那個歷史年代，綜合其有關的史料與陶集中表現其青年期生活的作品，對陶淵明的青年期作一個粗線條的勾勒。

**生活環境** 據蕭統《陶淵明傳》與沈約《宋書·隱逸傳》所載，陶淵明卒於劉宋元嘉四年，時年六十三<sup>①</sup>，依此上推，則淵明出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從我們目前所發現的有關陶淵明的文獻來看，他的青年期應當是在柴桑郡尋陽一帶度過的。在東晉王朝所統轄的區域內，最富庶的是揚州與荊州，當時的這兩個州戶口「半天下」。和東晉王朝抗衡或造反的軍閥，如王敦、桓溫、殷仲堪、桓玄等人，他們往往佔據荊州這個地方，招兵買馬，積蓄力量，最終與王室抗爭。而陶淵明的家鄉尋陽郡，隸屬江州，處在荊州與揚州之間，其經濟相對落後，當時的尋陽郡戶口（居住人數）還不及會稽郡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江州這個地方卻歷來是兵家的必爭之地，這與尋陽一帶是軍事沖要之地的因素是很相關的。儘管尋陽在當時並不是經濟十分繁榮的地方，但陶淵明的家鄉處在彭蠡湖濱（鄱陽湖畔），柴桑（今江西九江）既是一個軍事的沖要之地，同時也是一個山水秀美的地方：「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sup>②</sup>，加之有廬山秀聳於長江之濱，更為此地增添了一道難得的風景線。

秀美的江南山水，對於陶淵明這種「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sup>③</sup>的田園詩人來說，固然是至為難得的創作條件與創作源泉。他完全可以涉足遨遊於這片優美的自然山水裏，「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sup>④</sup>，他在陶醉於自然山水之餘，也創作了精美的山水詩文。尋陽的山水既滋潤了淵明的創作靈感，也成全了他「躬耕自資」隱居的生活，更成就了他不朽的山水詩文創作。據說，陶淵明在尋陽的住宅一共有三處：一是上京（里）閑居，二是園田居（古田舍），三是南里

---

① 蕭統《陶淵明傳》說：「元嘉四年將復征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沈約《宋書·隱逸傳》中的《陶淵明傳》也說：「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② 參見王勃《滕王閣序》，《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之 813 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中 27 頁《歸園田居》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中 111 頁《歸去來兮辭》，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南村)<sup>①</sup>，這些地方確實是見諸《陶淵明集》中的詩文裏的。但由於記載陶淵明當年的具體歷史細節的史料不存，我們一時還無法確定陶淵明當年所居住過的這些地方是否全部都是他的產業。因為我們不能排除這樣幾種可能：其一，陶淵明的父親當年究竟給他留下了哪些遺產，那麼這三處住宅就未見得全部都是其祖業；其二，在陶淵明的父輩中是否還有同宗兄弟的遺產存在，而被陶淵明繼承了過來（例如其從弟敬遠就是堂兄弟，敬遠在陶淵明四十七歲時就死去了，而他們之間的情誼勝過親兄弟，加之敬遠的母親與陶淵明的母親孟氏之間又是姊妹關係，則敬遠的遺產肯定不會落到外人手裏）；其三，古人在遇到人生不順利的時候也難免不移居。可見，陶淵明在尋陽時先後在以上三個地方居住過，這應當是無可置疑的了；但未見得這三處地方的產業就全部是陶淵明的。那麼，我們也可以初步斷定：陶淵明的青年期基本上是在尋陽這一帶度過的，而且他的後期除了曾經出任過幾屆小官吏以外，絕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尋陽度過的。

**家庭人口異動** 東晉海西公太和三年（368年），陶淵明的程氏妹降生於世。其實，程氏妹是陶淵明的異母妹，淵明在他的《祭程氏妹文》中這樣說：「慈妣早世，時尚孤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sup>②</sup>。案：淵明的生母是在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年）去世的，是年淵明三十七歲，可見在他十二歲那年（「年二六」）所喪之妣應當是他的異母。我們在上文中曾經談到過：陶淵明無論對於其父母，還是對於他的弟妹，抑或是對於其子女乃至他人，無不是以一種仁義霽如之度以待之，更何況他與程氏妹之間是「爰從靡識，撫髻相成」<sup>③</sup>的。因此當義熙二年（406年），程氏妹喪於武昌時，淵明「情在駿奔，自免去職」<sup>④</sup>，他毅然辭掉了那個彭澤令之職務，去武昌奔喪；義熙三年（407年），

---

① 參見《陶淵明集》266頁中逯欽立先生對陶淵明生平的考證。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中113頁之《祭程氏妹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中110頁之《歸去來兮辭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淵明為程氏妹服喪已滿「再周」(淵明為程氏妹當服大功之喪,「大功」喪期為九月,淵明此時作祭文已有十八個月了,故曰「服制再周」),他揮毫寫下了那篇催人淚下的《祭程氏妹文》。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372年),陶淵明喪父。在《祭從弟敬遠文》中,淵明說:「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髻鬢,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sup>①</sup>可見,淵明在七八歲間,他的父親就故世了。一個家庭如果喪失了戶主,其家境自然是興旺不起來的,淵明在他的《與子儼等書》中所說的「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sup>②</sup>,便足以說明他喪父以後的家境並不景氣了。自然,淵明雖然「少而窮苦」,但他畢竟還是屬於可以躋身於仕途的士族,因而比起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庶民來,畢竟要好多了。到了晉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陶淵明的庶母卒,他的這位庶母就是程氏妹的生母。淵明與程氏妹是「撫髻相成」的,二人間感情至為融洽,因而淵明在《祭程氏妹文》中將那種「感惟崩號,興言泣血」<sup>③</sup>的痛楚的淋漓盡致的表達,就足以見出其一端來。太元六年(381年),是年淵明十七歲,其從弟敬遠出生於這一年。淵明與敬遠之間情誼甚厚,在敬遠逝世時,淵明不勝其慟,他揮毫寫作了《祭從弟敬遠文》,其文曰:「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歸后土」,又曰:「年甫過立,與世奄辭;長歸蒿裏,邈無還期」<sup>④</sup>。辛亥年為義熙七年(411年),這年陶淵明四十七歲,而敬遠則是英年早逝,他當時「年甫過立」(即剛好過而立之年),他大概是在三十一歲時死去的。可見敬遠的年齡比淵明要小十七歲左右,因此我們斷定敬遠是出生在這一年。

**家道中落** 大約在太元九年(384年),陶淵明二十歲左右時,其家境開始衰落了,在陶集中有「弱冠逢世阻」(參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鄺治中》)與「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之句。在淵明的《自祭文》

① 參見《陶淵明集》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中，則曰：「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sup>①</sup>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淵明此時的家境並不很好，這也成了他後來「投耒去學仕」<sup>②</sup>的原因。事實上，在太元八年（383年），謝石、謝玄等人雖然率軍在淝水擊敗了苻堅軍，抑制了北方軍事勢力的南侵，但此前此後，苻堅軍對南方的騷擾，均以江州一帶最爲頻繁。384年，苻堅軍入寇江州一帶，加之當年江州遭受了嚴重的水災，本來就是「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災年）」<sup>③</sup>，加之水災相乘，江州一帶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困苦不堪了。

**淝水之戰** 在陶淵明的青年期，還有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有必要在這裏交代一下。其一是太元八年（383年）的「淝水之戰」。前秦苻堅在兼併了後燕慕容氏之後，逐步鞏固了他在北方的軍事勢力，由是他力圖將其軍事勢力向南方擴張，試圖一舉佔領江南。在淝水之戰前夕，東晉王朝在謝安、王坦之等大臣的匡扶下，阻遏了桓溫的篡位陰謀，《資治通鑒·晉紀第二十五》載：「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sup>④</sup>桓溫死後，謝安作爲東晉王朝的重臣，他「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綱，不爲小察。時人比之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sup>⑤</sup>東晉王室內部此時也出現了短暫的和陸氣氛，加之天意也憐憫這個漢族政權，以故前秦苻堅在383年發動的這場南侵戰爭中大敗而歸。《資治通鑒·晉紀第二十七》曰：

（383年）冬十月……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敗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兵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

① 參見《陶淵明集》1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陶淵明在《飲酒》之第十九首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參見《陶淵明集》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王弼註《老子》第三十章，《二十二子》4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參見《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三之694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參見《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之700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步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而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sup>①</sup>

這段文字的記載，讀起來真叫人毛髮悚然。晉軍之所以能夠取勝，主要在於朝廷內部出現了短暫的團結安寧的局面。秦兵此次失敗之後，從此也失去了兼併南方的軍事勢力了，使得東晉王朝得以再苟延了三十多年。

**桑梓文化氛圍** 在淵明的青年時期，還有兩件發生在他家鄉不遠的兩件大事，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太元十四年（389年）左右，范寧為豫樟太守<sup>②</sup>，他在那裏「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

---

<sup>①</sup> 參見《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五之 704 頁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sup>②</sup>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載：范寧出為豫樟太守，時在孝武帝立皇太子之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之前。又據《孝武帝紀》，立太子在太元十二年（387年），王珣為尚書在太元十六年（391年），則范寧為豫樟太守當在太元十四年（389年）左右。又《晉書·范寧傳》曰：（范寧）在郡大設庠序，至者千餘人，課讀「五經」，又起學臺，資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范寧）以此抵罪。范寧之子範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宋書·範泰傳》載王忱為荊州刺史，以泰為天門太守。又《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四年六月，荊州刺史桓石虔卒」，「太元十七年十月，荊州刺史王忱卒」。可見，範泰為天門太守當在太元十四年前後，因而我們也可以推斷范寧的為豫樟太守，也應當在太元十四年前後。

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sup>①</sup>豫樟本來就具有崇修儒業的傳統，先前，范宣家於豫樟，他十歲能諷誦《詩》、《書》，尤善《三禮》，因家貧而「躬耕自養」。但「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樟太守，甯以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sup>②</sup>范寧繼范宣之後在豫樟大力提倡儒家的經學，這對於當時的崇尚老莊、風靡清談的社會風尚，毋寧是一種扭轉。豫樟即今之南昌，與陶淵明的家鄉尋陽頗相毗鄰，這種風氣對整個江州的影響尚且如此之大，則不可能不對陶淵明的家鄉、乃至他本人產生較大的影響。加之陶淵明的先人陶侃曾力排老莊而崇尚儒業，他非常反對當時士大夫的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主張「惜分陰」，以成就人生事業。更兼淵明的外祖父孟嘉倍受「崇修學校」的庾亮所器重，舉他為「勸學從事」，他的崇尚儒業的主張則對淵明帶來了更加直接的影響。陶淵明在《飲酒》詩之第十六首中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則無疑是受了這種文化氛圍的很大的影響。

在范寧大興儒學於豫樟的同時，也招致了一些見地與之不同的官吏的極力反對。《晉書·范寧傳》載：「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豫樟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sup>③</sup>其實，范寧與他父親范汪都是東晉很有氣節的名臣，范寧給當時朝廷所提出的休養生息的建議<sup>④</sup>，毋寧也體現了他對當時人民生活的深切關懷。至於王凝之對范寧如此大加誹謗，其間主要是因為

① 參見《晉書》卷七十五之 1988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九十一《儒林傳》2360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③ 參見《晉書》卷七十五之 1988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④ 《晉書·范寧傳》載范寧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參見《晉書》1985 頁～1986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著「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衝突。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晉書》卷八十載他工草、隸，歷仕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他的家族「世事張氏五斗目道，凝之彌篤」<sup>①</sup>，王凝之本人也由於信奉東漢張道陵的「五斗目道」，而最終被利用五斗目道起義的孫恩所殺。由於王凝之崇信道教，因而他勢必與崇尚儒業的范寧之間格格不入，這應當是他攻擊范寧的主要動機。王凝之在任江州刺史時，他還積極扶植了佛教的譯經事業，他曾經集中外僧眾八十人在尋陽翻譯佛經。在蕭梁時僧祐《出三藏記集》的卷十中，收有一篇《阿毘曇心序》，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以晉太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於重光。其年冬，於尋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胡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為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與提婆校正，以為定本。時眾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為檀越，並共勸佐而興立焉。<sup>②</sup>

《阿毘曇心序》的作者究竟是誰，今天已經無法稽考了，南山精舍這個譯經場所對後世也未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僅有慧遠的廬山精舍的譯經事業則對後世造成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在《出三藏記集》的卷十中，同樣收錄了慧遠法師的《阿毘曇心序》，其中有這樣的記載：「罽賓沙門提婆……會遇來遊，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實而重之，敬慎無違。」<sup>③</sup>看來，當年在譯經事業上真正有所貢獻而且對後世影響深遠者，在尋陽一帶也僅有廬山慧遠法師的這個譯場了，也許那個「南山」二字乃「廬山」二字的音訛（陶淵明詩中「悠然見南山」，「南山」所指便是廬山），亦未可知。且在歷史上，提婆的譯經也只在廬山的慧遠法師的道場，並無任何在尋陽「南山」譯經的歷史記載。

① 參見《晉書》卷八十之 2103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佛藏要籍選刊》第二冊 394 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佛藏要籍選刊》第二冊 394 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由於王凝之崇信「五斗米道」，他同時也支持佛經的翻譯事業，因而使得佛、道思想在江州一帶也成了一種廣為流傳的佔主要地位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也勢必會給青年期的陶淵明帶來一定的思想影響。在淵明的家族中，他的從弟敬遠就是信仰道教的，我們從陶淵明的《祭從弟敬遠文》中的「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村；晨採上藥，夕閑素琴」<sup>①</sup>等語，則可以發現敬遠不止是篤信道教，他而且還非常虔誠地修習辟穀服氣等法。但敬遠這樣做卻並未得到長壽，相反，他「年甫過立」<sup>②</sup>就與世長辭了。我們透過淵明為敬遠所寫的祭文，也不難看出他一方面難以割捨與敬遠之間的兄弟情誼，另一方面也可以見出陶淵明對於道家的那一套做法是並不贊同的，他因而在《祭文》中說：「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sup>③</sup>顯然，淵明對於敬遠因篤信道教而英年早逝，是不無歎惋之意的，因而他對於道家辟穀導引的那一套，自然也就不會很贊同了。

**作者青年期思想** 陶淵明的青年期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他在對各種文化的撿取中，最終還是選擇了以儒家六藝為主體的這一思想體系。他的這種選擇，其中自然不無其家族中傳統理念對他的影響，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影響是來自於其母族孟氏的崇儒重學的思想傾向。淵明之所以在他的母親孟氏去世時為他外祖父寫下了《孟府君傳》，其中自然有因為紀念他母親而愛屋及烏的因素存在，但其間也無可否認他對其外祖父孟嘉崇修儒業這一作法的認同。陶淵明「少時罕人事，游好在六經」，他主要接收了來自於孔孟一系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也必須指出：陶淵明的讀書是很有特色的，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他自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

① 參見《陶淵明集》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說敬遠「年甫過立，奄與世辭」（參見《陶淵明集》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也就是說敬遠剛好過了三十歲不久去世了。

③ 參見《陶淵明集》1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①，顏延之的《陶征士誄》也說他「學非稱師，文取指達」②。可見淵明的讀書完全是憑個人的興趣去讀，因而他不可能成爲像范宣、范寧那樣的儒學大師，但他的這種「欣然會意」的讀書方法，卻很有助於他將來的成爲一代文學大師。自然，在陶淵明的青年時期，那些來自於佛教、道教的思想，也不可能不給他帶來一絲的影響，但陶淵明在那些思想領域裏的所取畢竟不多，而往往不乏其排斥者。其次，在兩晉思想領域裏一直佔統治地位的玄學思想，以及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所形成的審美理念，同樣也對陶淵明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但淵明對於這些思想畢竟還很是有他自己的選擇的。至於陶淵明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以及他的審美理念的成熟，其間經歷了一個比較曲折的心路歷程，我們在後文中，還將會作詳細的討論。

---

① 參見《陶淵明集》1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李善《文選注》卷五十七之791頁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

## 二、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概述** 陶淵明從二十九歲的初次出仕，到四十一歲後的徹底歸隱，其間或仕或隱，前後達十二年有餘。仕途的坎坷顛簸、政治的黑暗與腐朽、時運的不齊及子嗣的無望：這一系列的人生際遇促成了淵明徹底歸隱思想的形成。在這一歷史時期內，淵明涉足了仕途，使他既能夠結識像顧賊曹、郭主簿、殷晉安、周續之、祖企、謝景夷、羊長史、丁柴桑、龐主簿、張常侍、王府軍、王弘、顏延之、劉柴桑等這樣一批中小官吏，從而瞭解到了上層社會的種種黑暗；與此同時，淵明在這一時期內雖然多次出仕，但他也多次歸隱，而且隱居的時間遠遠地超過了出仕的時間，在歸隱的時間內，他躬耕自資，遂與農民及下層的人民群眾之間產生了交往，使他對於民間的疾苦也有了一定的體會；此外流行於他家鄉尋陽一帶的佛道思想，也勢必會給淵明這位「游好在六經」的仕子的思想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這一時期內不止是淵明個人思想的形成階段，同時也是淵明的審美理念形成的時期，自然也是淵明的詩文創作藝術的成熟階段。

### （一）陶淵明的第一次出仕與歸隱

**第一次出仕與解職** 陶淵明的第一次出仕是在晉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是年淵明二十九歲。蕭統《陶淵明傳》及《晉書》、《宋書》等文獻中的淵明傳記均說淵明「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sup>①</sup>在陶淵明的《飲酒》組詩中的第十九首也說：「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年立，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之所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sup>②</sup>顯然，《飲酒》這一組詩是作於淵明初次出仕的第十二年（古代稱十二年為一紀）以後，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其中的「是時向年立」一句，見出淵明的第一次出

<sup>①</sup>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陶潛傳》264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56頁～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仕是在接近「而立之年」<sup>①</sup>的時候，很可能就是在他三十歲的前一年，因為這個「向」就是「接近」的意思，且對於淵明第一次出仕的時期是在 393 年的看法，學術界的意見也基本上是統一的。

據《宋書·百官志》所載，江州自晉成帝咸康中，始置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那麼，陶淵明的「不堪吏職」，似乎也有些不大好理解。逯欽立先生認為：「刺史王凝之乃一五斗目道徒，晉傳云：『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sup>②</sup>可見，陶確實不屑事於王凝之。」<sup>③</sup>今案：逯氏之說似乎還有幾個疑竇尚未解開。其一，《晉書》卷九十四載「潛歎曰」之後緊接著有「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sup>④</sup>云云，而蕭統所作的《陶淵明傳》則徑曰：「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sup>④</sup>，然則淵明的「不為五斗目而折腰」，應當是在他最後的歸隱時的事情了，而不會處在他的第一次歸隱之時。其二，王凝之確實做過江州刺史，或許淵明為州祭酒時他還在職，但他派遣的督郵未見得也是一個五斗目道徒。其三，縱然督郵也是一個「五斗目」道徒，但從淵明的語句「吾不能為五斗目折腰」（蕭統的傳記作「我豈能為五斗目，折腰向鄉里小兒」）的語法分析來看，這個「五斗目」似乎也應當是指俸祿，而不應當是指其宗教身份，且「五斗目」放在「為」字之後，這個「為」是一個表示目的的介詞，其語法意義也並不是表示目的指向的介詞。其四，「督郵」這個職務是漢代設置的，他是郡守的佐吏，專門督察所屬縣中官吏們的過錯，其中「郵」與「尤」諧音，「督郵」即「督察過錯」之意。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四記載各縣官吏設置曰：「秦置令、丞，後漢有郡主簿，亦名督郵」<sup>⑤</sup>，這一職務在隋代便廢除了。

---

① 《論語·為政》說：「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參見《論語譯註》13 頁，古籍出版社 1958 年北京版）後人遂以「而立」來表示三十歲。

② 參見中華書局 1979 年版《陶淵明集·附錄二》265 頁。

③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陶潛傳》2641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⑤ 參見《古今事物考》第一冊 81 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所刊行的

由此看來，淵明所任的職務為州祭酒，相當於現在的地區教育長官，他的職位要高於督郵，又何須「束帶見之」呢？顯然，淵明這裏的「束帶見之」也完全是在他後來作縣令的屬吏時的事情了，而絕不是在他第一次出仕作祭酒時的事情了。逯先生的考證似乎還有許多欠紮實之處，而有諸多主觀臆斷之嫌，似不可取。

那麼，淵明「不堪吏職」的原因究竟如何，這似乎還有待考證之處。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理解：淵明的初次出仕，對於官場的那一套並不習慣，且他素來率性磊落，其個性是不大願意受人約束的。因而他自然是看不慣官場的那種諂上欺下的作法的，這些對於「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sup>①</sup>的陶淵明來說，自然會是很不適應的，也無疑成了淵明自動「解職」的直接原因。在我們上面所舉的淵明的那首《飲酒》裏可以知道：他當年是「志意多所恥」的，因為官場的那一套作法與素來「游好在六經」的陶淵明的初衷之間，畢竟是存在著霄壤之別的，官場的那套腐敗作風，對於一個良知尚未泯滅的人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更何況淵明率性磊落，他自然更是無法再在那裏混下去了的，這應該是淵明第一次出仕不久就辭職歸來的原因所在。

**長子的降生** 淵明解職自歸後，居住在他家鄉尋陽的上京，開始了他「躬耕自資」的生活，這一時間長達六、七年之久。大約在淵明出仕前後，他的長子陶儼降生於人世了，陶儼應當是陶淵明的前妻所生。據學界考證，陶儼的出生就在太元十八年（393年），這也應當是學界所公認的了。如前所說，淵明不但是一位率真質直、待人仁義靄如的君子，他同時也是一個對待子女仁愛慈和的父親。淵明的《命子》詩應當是專門為陶儼所寫的，這個組詩的前面六首是專門敘述陶氏宗族的祖德的，後四首描寫了淵明年近三十得子時的欣喜與他對子嗣所寄予的重望。茲將後四首鈔錄如次：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

「叢書集成初編」。

① 參見《陶淵明集》11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sup>①</sup>

你看：淵明在進入中年之際，他是多麼地希望自己在人生事業與家業方面均能有一個興旺呀！「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那種「君子疾乎沒世而名不稱焉」的人生感慨，在這裏得到了充分地展現。因此，淵明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願望寄托在他的兒子陶儼身上，希望通過陶儼來實現他無愧於先人的願望。古人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當時，淵明尚未得子，他那時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淵明就是以這樣一種心情在期待，期待他那能夠成材的兒子早日降生人世。待到陶儼降生後，淵明為他占卜，適遇吉兆，淵明於是不勝欣喜，給他命名為「儼」，同時還給他取了一個「求思」的字，這充分說明了淵明希望陶儼能夠像孔子的嫡孫「子思」那樣，使陶氏的門庭得以光耀的心情。至於陶儼剛降生時，淵明那「遽而求火」的企盼心情，我們在上文中已經交代過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一語，淵明的那種待子之誠，簡直是溢於言表的了。

《命子》詩的最後一首頗引起人們的爭議，有人認為《命子》是作於陶儼出生後的七～八年之間（即義熙二年，西元406年左右），其理由是《命子》詩之第十首中有「日居月諸，漸免於孩」一句。「孩」在古代指未成童的幼年小孩，他們由此而將《命子》詩的寫作時間後推了七年左右。但如果一定要按這種考證方法去覈實詩歌的創作的話，將此詩下推七年尚欠妥當，因為第十首後面還有「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等句，頗與淵明《責子》詩中的「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同一況味。

① 參見《陶淵明集》6頁～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此時「阿舒（陶儼）已二八」<sup>①</sup>他已經是十六歲的小伙子了。如果按照淵明那樣一種樸茂篤厚的品性來推斷，《命子》詩斷不至於會寫在陶儼降生後的第七年，因為淵明的次子陶俟（阿宣）僅小陶儼兩歲左右，三子陶份與四子陶佚也僅僅比陶儼小三歲，第五子陶佟也比陶儼小七歲，他們兄弟五人都已經降生人世了。淵明此時的《命子》詩，斷不至於拋下其他四子不提而專門為他的長子陶儼所作。且淵明在後來的《與子儼等疏》一文中，開篇即曰：「告儼、俟、份、佚、佟」，其行文但有長幼之次序，而不遺棄任何一子之名字。因而《命子》一詩中的第十首中所涉及的陶儼的未來，很有兩種可能存在：其一是淵明在喜得長子之時，他滿懷希望地憧憬著長子逐漸成長的美好前途，這確實也是淵明所企盼已久的事情了。但又因為淵明率性天真、任運自然，故爾他並不刻意地苛求兒子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成長，由此纔有「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的自我寬諒之句。從《命子》這一組詩來看，這種可能是非常大的，且自古詩不落實，焉有不寫未來者！其二，或許淵明在寫成《命子》詩的前九首之後，日後檢索舊章，補題第十首。但這種可能性似乎很小，因為，按照淵明的個性，他「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sup>②</sup>，他的讀書與作詩往往是率性為之，是興到意到，也應當是不加文飾的，故爾日後改寫的可能性不會太大。再者，待到淵明日後改定時，他的其他四個兒子也相繼出生了，淵明也就不可能將他們擱置不提了。此外，若按組詩的格局，十首而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似乎也鮮有異日補綴的可能。若據實案之，淵明的這組《命子》詩很可能是作於他三十歲那年，這年，他的前妻亡故，因而在《命子》的第十首中也有「福不虛至，禍亦易來」的句子。自然，這裏面不無老子「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sup>③</sup>思想的影子存在，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所包含的淵明在得子而喪妻後的苦悶心情。

---

① 參見《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6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老子》第五十八章，《二十二子》7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喪妻之慟** 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淵明年三十，他在這一年喪妻，這在淵明後來所作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就有「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sup>①</sup>之句。《禮記·內則》說：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這裏的「始室」應當是指淵明自己的三十歲。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預注曰：「偏喪曰寡」<sup>②</sup>，可見，這裏的「喪其偏」即「偏喪」，即喪其前妻。我們再看《與子儼等疏》一文中，也有「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sup>③</sup>足見，陶儼與他後來的四個弟弟並非同母所生，其前妻也確實亡故於淵明的三十歲那年，至於淵明前妻的姓氏籍里，因無文獻記載，只得聊付闕如。

對於前妻的亡故，淵明肯定是不勝傷感的。陶集中有一篇《閑情賦》，歷來被學界認為是如同屈騷式的以「美人」喻「君主」的作品，因而有人斷定這篇作品是淵明初次出仕時的示志之作，也有人斷定這篇作品是淵明彭澤歸來後的怨憤之作。自然，這種見解的形成，也不無來由，因為，淵明在《閑情賦》的《自序》中曾這樣說：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sup>④</sup>

在淵明這裏，「閑」似乎具有「閑止」、「防閑」之意，蓋其本意是為防閑散佚之志，而歸於正道。但通篇之意，似乎有乖本旨。我們再來看看淵明在這裏所引用的張衡與蔡邕的賦吧：在《藝文類聚》卷十八「美婦人」中，對於他們二人的作品也略有收錄，茲錄如次。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

① 見《陶淵明集》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十三經註疏》1997頁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霞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眾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焯焯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①

在張衡與蔡邕的賦裏，似乎很難見出其諷諫之意來，倒是不乏纏綿悱惻之情。無怪乎蕭統說：「白璧微瑕者，惟《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sup>②</sup>今案：昭明太子的說法自是不無道理，淵明的《閑情賦》的具體內容與他所寫的《序》之間，實在是大相徑庭了。請看：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寡歡而愁殷？褰朱帷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影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弦。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僞。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

① 參見《藝文類聚》卷十八 231 頁～23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版。

② 參見中華書局 1979 年版《陶淵明集》10 頁《陶淵明集序》。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  
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之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  
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颺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襟袖以緬邈。  
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  
考所願而必違，徒契闊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  
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倘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  
竟寂寞而無見，獨猶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  
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變變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  
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  
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  
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於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  
惘不寐，眾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  
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  
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  
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  
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sup>①</sup>

在這裏，淵明所說的「閑正」、「諷諫」等成分實在很難發現，而那種兒女人情，拳拳深意，卻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在這篇賦中，淵明不但描寫佳人的艷妝與絕色，而且也表達了他「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譽」的仰慕而不可即的心情。其中「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兩句，雖然似有《離騷》中「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sup>②</sup>與「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sup>③</sup>等韻味，但我們卒讀後文，則純然男女情愛之事。至於後文中的「願在衣而爲領」、「願在裳而爲帶」、「願在髮而爲澤」、「願在眉而爲黛」、「願在莞而爲席」、「願在絲而爲履」、「願在晝而爲影」、「願在夜而爲燭」、「願在竹而爲扇」、「願在木而爲桐」等一系列的想象，均不乏民歌中那種一唱三歎的氣韻。雖然

① 參見《陶淵明集》154頁～15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② 參見《楚辭集注》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參見《楚辭集注》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閑情賦》通篇旨在表述男女之間的情愛，但其基調仍然是建立在「誦邵南之餘歌」這個主旋律上面的，它所表現的是一種具有「好色而不淫」的特色的情動於中、動中法度的健康情愛。具有這種風格的作品，在陶集中也僅此一篇，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了。如果要說這篇作品是後人竄入的，則可能性不大，因為，蕭統是陶集的第一個編纂者，他不但對於陶集中詩文非常瞭解，而且對於淵明創作的語言風格以及藝術特色都非常諳熟，在蕭統那時尚且不置疑，後人自然也無須去懷疑了。朱光潛先生在《詩論》第十三章中專論陶淵明，他認為：

淵明的偉大處就在於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現出來。趁便我們也可以略談一般人所聚訟的《閑情賦》。昭明太子認為這篇是「白璧微瑕」，在這篇賦裏淵明對於男女眷戀的情緒確是體會得細膩之極，給他的沖淡樸素風格渲染了一點異樣的鮮艷的色彩；但是也正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淵明是一個有血肉的人，富於人所應有的人情。<sup>①</sup>

朱先生畢竟不愧為詩歌理論家，他的見地確實合乎淵明這個人物的整體性格。因而筆者在這裏很認為這篇《閑情賦》就是作於他的前妻亡故不久之時，用以表達他對前妻的不勝眷戀之情，故爾其作品中不乏陳思王對「洛神」的那種情韻。祇要我們步著這條思路去閱讀《閑情賦》，則完全可以透過文字看到淵明在喪妻以後，他的那種「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的苦悶心情。同時，那種椒室依舊、佳人何處的幽愁，那種「阻山以帶河」，但可「寄弱志于歸波」的悵惘，也是觸目可得的。可見，淵明與前妻之間的情感是深厚的，他對於亡妻的眷戀也是深摯的。這與他後來在程氏妹、從弟敬遠等親人亡故時的悲慟一樣，是同樣地深情，它表現了淵明一貫的待人誠懇、富於人情的性格。僅僅祇是這篇賦，在主題思想的展示方面，要比《祭程氏妹文》與《祭從弟敬遠文》隱晦一些而已。

**關於《五柳先生傳》的創作** 在淵明的初次出仕期間，還有一篇在繫年方面存在分歧的作品，那就是《五柳先生傳》一文。《五柳先

<sup>①</sup> 參見《詩論》30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

生傳》是一篇很難得的奇文，《晉書》、《宋書》、《南史》及蕭統的《陶淵明傳》，均謂淵明「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除了蕭統的傳記以外，各本還引用了原文，並曰：「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sup>①</sup>，然後纔說淵明「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sup>②</sup>。因此，有的學者認爲《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出仕前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了異議。林雲銘在評註《古文析義》中認爲：《五柳先生傳》中的無懷氏、葛天氏是「暗喻不仕宋意」，應當屬於淵明後期的作品，其創作時間在晉宋易代之際。吳調侯、吳楚才的《古文觀止》卷七也認爲：「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sup>③</sup>他們的這兩種見解無疑都有一定的道理。

若實案之，《五柳先生傳》也確實是作於晉宋易代之際。比方文中「不慕榮利」一語，似乎應當是淵明自彭澤徹底歸隱時的自況；又「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等語，似乎亦是淵明後期生活的真實寫照。《晉書》等文獻載王弘欲結識淵明，「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相見，遂歡飲窮日。」<sup>④</sup>又「其親朋好友，或載酒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sup>⑤</sup>顏延之在做劉柳後軍功曹時，與淵明之間情甚篤厚，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sup>⑥</sup>。以上情況，都應當是發生在淵明彭澤辭歸之後，因此，這篇《五柳先生傳》很可能是作於宋替晉祚之時。又及：柳樹是南方湖泊與河流邊常見的樹木，但在北方也不乏此樹，《三輔皇圖》卷六說：「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古人的「灞橋折柳」，以「柳」與「留」諧音，名送實留也，淵明在這裏以「五柳」自稱，殆亦有保留晉祚之意。在陶集中《擬古》詩第

①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 2460 頁～2461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 2461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③ 參見《古文觀止》292 頁，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④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 2462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⑤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 2462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⑥ 參見蕭統《陶淵明傳》，《陶淵明集》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九亦曰：「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sup>①</sup>，那種國是日非、山河變遷的現實給這位東晉世家子弟所帶來的痛苦，自然是深重的，因而將《五柳先生傳》斷為淵明後期的作品，似乎更近情理。

**躬耕與續弦** 淵明初次出仕後的歸隱，其時間長達近七年之久。在此期間內，江州曾召淵明去做主簿（管理文書簿記的官吏），均被淵明辭退了<sup>②</sup>。淵明在這六、七年之間，堅持了「躬耕自資」，他真正地過上了老農、老圃式的田園生活。這對於一個不願意違心地在官場廝混下去的知識分子來說，物質生活條件的貧乏與人性的扭曲二者相比，似乎是人性的摧殘更為難以接受。淵明所不同於一般知識分子之處，乃在於他處在那個政治黑暗的時代裏，能夠毅然放棄官俸，走向田園，從事一般仕子所不願意做的農業勞動。至於各種傳記都說淵明因躬耕而「遂抱羸疾」，這「羸疾」究竟是何種疾病，我們一時無法瞭解，僅知道這是一種身體疲弱的症狀而已。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說：「年在中身，疾維疢疾」<sup>③</sup>，「疢」是指熱病，在這裏是指一般的疾病；「疢疾」就是今天的瘡疾。淵明具體在何時染上了這瘡疾，我們一時尚無法考證。但我們對淵明的那種寧可形苦而不願意使心苦的作法，應當是十分佩服的；他的那種「不以心為形役」的精神，通過其切實的行動以實施，似乎也可以由此而見其一斑。

大約在淵明的前妻亡故不久，他便續娶翟氏為妻。我們僅從其《責子》一詩中，就可以約略地知道翟氏的續弦，也許就在 394 年這一年。當時「阿舒（陶儼）已二八」，而「阿宣（陶俟）行志學」，其次子也已經年十四了，他也接近於「志學之年」（十五歲）了。從淵明兩個兒子的年齡差距。即可推斷翟氏的「于歸」陶家，必去太元十八年不遠。翟氏不愧為淵明的賢內助，她能安貧守道，對於淵明的「躬耕自資」固然是莫大的幫助。根據蕭統的《陶淵明傳》所載，「其妻翟氏亦能

① 參見《陶淵明集》7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在《晉書》卷九十四及蕭統的《陶淵明傳》均載「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③ 參見李善《文選注》卷五十七 792 頁下，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安勤苦，與其同志」<sup>①</sup>，《南史》卷七十五也說「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躬於前，妻鋤於後」<sup>②</sup>。有這樣一個賢內助的協助，淵明在躬耕種中自然可以戰勝疾病與其他各種困難，保全他個人的人格不受扭曲。

**晉室內亂** 在淵明的第一次出仕歸隱以後，東晉王朝逐漸地陷入了深深的內亂泥潭之中。太元八年（383年），東晉王朝在謝安的指揮下，於淝水大敗苻堅軍，鞏固了東晉王朝的統治地位，但此後東晉王朝接踵而來的卻不是欣欣向榮的氣象，而是內部無休止的權利之爭。385年，謝安病死，東晉王朝的朝政全歸了司馬道子，但司馬道子也如同兄長孝武帝司馬曜一樣，是一個整天酒醉昏迷的家伙，他委任其兒子司馬元顯當政。從此，東晉王室內便出現了司馬曜與司馬道子之間的爭權奪利、司馬道子與司馬元顯之間的爭權奪利，帝室內各大族之間也紛紛展開了權利鬥爭。《晉書》卷九《孝武帝紀》載司馬曜「幼稱聰悟」，「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為長夜之飲」，乃至暴死於貴人之手，而「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sup>③</sup>。在《晉書·司馬曜紀》中，房玄齡等人對於東晉王朝的實際上斷送在晉武帝手裏，是非常痛心的，故在其傳末評曰：

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斬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強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賓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積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

①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光碟版《二十五史》中《南史》616頁。

③ 參見《晉書》241頁～24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眾，帝號為「武」，不亦優哉！<sup>①</sup>

397年，晉安帝司馬德宗即位，身為太傅的會稽王司馬道子在表面上也歸政於晉安帝了。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七月，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人舉兵反晉<sup>②</sup>，東晉王朝的內亂已經達到了熾熱化的程度。儘管王恭在當年的九月被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擊殺，但在當年十月，殷仲堪等將領在尋陽為盟，推舉桓溫的兒子桓玄為盟主。到了399年十月，桓玄乘江浙間孫恩之亂而襲擊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等遇害，桓玄自領荊、江二州刺史，在那裏蓄積力量，形成了一股推翻東晉王朝的強大力量。

與此同時，由於司馬道子當政時，朝野上下貪污奢侈，致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早在道子時期，儒生范寧就對人民的困苦生活有過直接的表述。而到了東晉王朝行將覆滅之際，以桓玄為首的諸侯藩鎮佔據了建康以西的州郡，東晉王朝的政令祇能施行於會稽（浙江紹興）、臨海（浙江臨海）、永嘉（浙江溫州）、東陽（浙江金華）、新安（浙江淳安）、吳（江蘇吳縣）、吳興（江蘇吳興）、義興（江蘇宜興）這八個郡，苛刻繁重的賦稅與兵役全部集中在這八郡人民的身上，這也勢必會迫使那裏的人民鋌而走險。

**孫恩之亂** 隆安三年（399年），五斗目道徒孫恩乘民心騷亂之機，發動了起義。當年十一月，孫恩從海島率領徒眾百餘人攻破上虞縣，接著又攻破會稽郡，殺內史王凝之，一時徒眾驟增至數萬人。此時，其餘七郡也同時起義。攻殺東晉的官吏，以響應孫恩，不到十天工夫，孫恩就擁有了數十萬眾。孫恩的徒黨號稱「長生人」，他們事實上是一群奉行五斗目道的亡命無賴，他們所到之處屠殺擄掠，破壞不遺餘力。三吳地區（會稽、吳郡、吳縣）素來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住地，而士族所在地的民眾自然也倍受士族的剝削與壓迫，他們對於士族的仇恨自然是難以壓制的。愚蠢的野心家孫恩就利用民眾的這些積怨，縱使其徒眾殺人，他們連嬰孩也不放過。孫恩在與東晉大將劉牢之的戰

① 參見《晉書》242頁～243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0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鬥中，他凶殘地燒倉庫、毀房屋、塞水井、砍樹木、擄掠婦女財物，幾乎可以說是無惡不作了。東晉王朝就這樣在藩將的反叛與其統治區內民眾暴動的雙重打擊下，進入了風雨飄搖的狀況之中。

在這一動亂期間，陶淵明一直隱居在尋陽躬耕，直到隆安四年（400年）左右，他纔再度步入仕途。相對建康（南京）以東的人民來說，淵明的家鄉處建康以西，畢竟還沒有處在建康以東的那樣一種急劇的兵燹狀況之中。但政治風雲的變幻、時局的動蕩不安，對於淵明來說應當是身經目驗的；且那些建康以西的藩鎮爲了積蓄勢力，也未見得不將各種繁雜的賦稅強加在江州一帶人民的身上。在這一時期內，陶淵明可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這躁動的時局也勢必會促使淵明對世事作一些理性的思考，這對於他後來的詩文創作也未嘗不帶來一定的影響。與此同時，淵明此時一直保持了「躬耕自資」，農作的勞動也必然使他更加接近下層民眾，使他更加體會到人民的各種疾苦，因而對民眾的疾苦產生了深刻的同情。這些因素，無疑也會對於淵明後來的創作，也將產生較大的影響。

## （二）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與歸隱

**第二次出仕與告假** 如上所述，桓玄在隆安三年（399年）襲擊荊州，殺殷仲勣等將領，自領荊、江二州刺史以後，可以說建康（南京）以西的地域全在桓玄的控制之下了。大約在隆安四年（400年）左右，陶淵明出仕於桓玄手下，這從陶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是可以推斷出來的。淵明這次出仕與歸隱的原因都比較蒙混，大概他的出仕不會超過兩年（400年～401年），也許他在401年的赴假（銷假赴任）之後不久，其母孟氏卒，淵明此後便借守喪而歸隱了。

關於淵明的出仕桓玄部下的原因，這是歷來存有疑竇的問題。有人說：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經做過桓溫的長史，因而淵明對桓溫的抱負與功勳事業是應當熟悉的。因爲這個緣故，淵明對桓玄也產生了一定的幻想，所以他到桓玄的手下去作官，試想因此而實現他「大濟蒼

生」的理想<sup>①</sup>。這種說法似乎也有片面的道理，但仔細一推究，似乎還有許多漏洞難以解釋。在隆安四年，桓玄「屢上疏求討孫恩，詔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後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sup>②</sup>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還有捍衛東晉王朝的可能性。但此前的桓玄等人舉兵反晉，雖然打的旗號是討伐司馬道子與元顯等人，可就未見得他不帶有篡弒的野心。此後桓玄襲殺殷仲勣等人，在建康以西建立了他自己牢固的根據地，則更加明顯地展示了他與東晉王朝抗衡乃至篡弒的野心了。竊以為淵明隆安四年左右的出仕桓玄部下，其中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淵明曾對桓玄懷有幻想的成分，但其中似乎更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因素：桓玄在佔據建康以西的地土以後，淵明的家鄉尋陽正好就在桓玄的掌握之中了，當桓玄強迫淵明這位尋陽名士給他作屬下時，淵明似乎也無法推卸掉。既然荆、江二州都在桓玄的控制之中，而中國官吏的凶殘以極是連童稚也不會去懷疑的，西晉諸多的文人慘遭殺害的事實也夠令人發指的了，淵明處在此時也是無法拒絕來自於桓玄強加給他的桂冠的。

桓溫雖然是一個大野心家，但他當年還確實有收復中原、統一中國的雄心，而他的兒子桓玄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貪圖私利的家伙，淵明在他的手下作官，對於他假借勤王以窺探晉室的用心自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這種野心家的手下作官，如果不充當其心腹，則往往會遭到他的排斥與打擊，甚至還會有慘遭殺害的危險。但稟性正直不阿的陶淵明顯然是不會與桓玄同流合污的，因而淵明在桓玄手下當差前後一共不到兩年，但在這一期間內淵明確實是度日如年的。我們且來看看他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兩首吧！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耜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視南嶺，空歎將焉如。

<sup>①</sup> 參見廖仲安《陶淵明》12頁～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sup>②</sup> 參見《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258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sup>①</sup>

在隆安三年（400年），淵明因奉桓玄命使都，五月中乃從都還，因告假先回家省親（其母親在次年冬亡故，蓋其母此時重病），次年（401年）七月，他纔去桓玄那裏銷假赴職。這期間接近一年零二月的時間，淵明究竟是家居，還是在官場奔走，似欠明朗。而以上的兩首詩都是作於隆安三年五月，當時，淵明以迫切的心情期待歸家，誰知在規林這個地方（大約在鄱陽湖一帶）因遭風暴而羈於旅次。從詩中的描寫來看，淵明對於仕途的險惡感似乎是可以隱約見之的，例如第一首中的「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兩句，其實寫是指當時遭遇風暴的情景，而其虛寫卻暗喻了仕途的險惡。因而淵明在此時就十分動了歸隱之念，其中的「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視南嶺，空歎將焉如」，自然不無行子望家而不得歸的喟歎，在其中也不無身為役羈、不得自由（即想歸隱而無法實現）的痛苦心情。其第二首一開始就說「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那種「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sup>②</sup>的心情便躍然紙上了。而詩中「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的行旅阻滯之況味，何嘗又不與東晉王朝內憂外患相乘的時事酷似！這些無疑更加促使陶淵明歸隱之志的堅定，他「靜念園林好，人間（即官場）良可辭」，何況「當年（壯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祇要有機會，他就會放棄桓玄的這個官差，回到他企盼已久的田園。

淵明的這次自都還而告假省親，或許真是其母親孟氏抱病在身，因而他從庚子年五月的告假到辛丑歲七月的「赴假」，前後經過了一年多時間。儘管經過了比較長時間的省親，但淵明終歸還是要到桓玄那裏去赴任的，這對於他來說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這種矛盾複雜的心情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詩裏，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7頁～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詩經·唐風·鴇羽》，《十三經註疏》365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

###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門（一本作「茅」）下，庶以善自名。<sup>①</sup>

從詩中可以很明顯地見出：作者此次的啟程赴職是很不情願的，我們也不難想象出淵明的去做桓玄的屬下，居多的原因是出乎被迫。由於淵明的家鄉尋陽已經處在桓玄的掌握之中，以故淵明的出仕與否，也就不可能全憑本人的意願了。在這裏，淵明是多麼地眷戀他未出仕前的近三十年的自由生活：「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荊」。在未出仕以前，淵明可以聽憑他個人的愛好自由自在地瀏覽《詩》、《書》，在尋陽的田園中自然也沒有塵世間那種變幻莫測的風雲吹來（在陶淵明所處的那個年代，交通與通訊是相當落後的，絕對不似今天一樣可以瞭解到當天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大事），這種閒適的生活對於淵明來說，無疑是非常愜意的。因而，面對新的行役，而且又是不得不赴任的，就固然會使淵明的內心充滿了無限的痛苦。通過到桓玄門下的這次出仕，淵明深深地體會到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sup>②</sup>，因此，他打算「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在這裏，淵明提出了「養真」，他在稍後時所作的《飲酒》詩中也提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裏的「真」也恰好是淵明所追求的人生審美尚好，我們在下文中將會作比較詳細的討論。

我們在這裏透過「庶以善自名」一句，也不難看出淵明獨善其身的情懷。對於一個「詩書敦夙好」的仕子來說，應當是早就具備了「窮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8頁～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商歌：《淮南子·道應訓》：「甯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注曰：「甯威，衛人，聞桓公興霸，無以自達，將車自往。」意謂甯威聽說齊桓公興霸，他很想出仕而無從自薦，乃在車下商歌（商調的歌曲），桓公聞之慨然而悟，乃起用了他。這裏是說淵明他不意願像甯威那樣商歌自薦。耦耕：本指兩人並耕。《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長沮、桀溺是孔子時代的兩個隱者，淵明這裏引用其「耦耕」，意在隱居。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sup>①</sup>的思想涵養的，因此淵明寧可像長沮、桀溺一樣地耦耕，而不意願做法甯戚的商歌。但值得注意的是：「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數句，寫景清新自然，灼然江南秋夜的月色，自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後世李白的「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渡荊門送別》）與杜甫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等名句，似乎都可以從淵明上面的這些詩句裏見出些影子來。由此可見，陶淵明還是一位具備了詩歌創作才華且不可多得的詩人，他的詩歌創作對於後世的影響自然是非常深遠的。

**第二次歸隱** 隆安五年（401年）冬天，淵明的生母孟氏去世了。淵明在《祭程氏妹文》中曾經這樣寫道：「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sup>②</sup>可見陶淵明在七月的赴假未久，他的母親就在冬月（十一月）辭世了，當時，淵明的兄弟各自分居異地，但有程氏妹與他一起料理其母親孟氏的喪事。在這裏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祭程氏妹文》中先有「慈妣早世」之句，但那是指淵明的異母，即程氏妹的生母；而這次是喪其生母，故曰「重罹」。在那個多難之秋，家人離散的痛苦本來就夠使淵明揪心的了，而恰在此時，他的生母又離開了人世，那種人丁單薄的孤獨感自然會襲入淵明的腦海。以上這些是我們可想而知的，遺憾的是在陶集中卻沒有給我們留下這樣一類的作品，或許是淵明晚年的家境貧寒，使其遺稿多有散佚的緣故吧。但在陶集中還有一篇《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是淵明爲了紀念其外祖父孟嘉而作的，我們在上文中也作了討論。自然，這篇以「凱風寒泉之心，實鍾厥心」之故而寫成的作品，也應當是作於隆安五年，它是以纂述其外祖父行狀的方式來表達淵明對生母的深切悼念的。

也就在淵明喪母不久，晉安帝元興元年（402年），東晉王朝的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是年正月，司馬元顯爲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

① 參見《孟子·盡心上》，《十三經註疏》2765頁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劉牢之爲前鋒。二月，桓玄迎擊元顯，在姑孰（今安徽當塗縣）打敗了元顯軍。「三月辛巳，劉牢之降於桓玄。辛未，王師敗績於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錄尚書事……」<sup>①</sup>同年十二月，桓玄殺司馬道子，進一步控制住了東晉王朝。桓玄篡弑的野心至此已經昭然若揭了，淵明此時也正好可以乘「重孝在身」之機，擺脫來自桓玄官場上的羈絡。大概在隆安五年冬月以後，淵明便歸隱於他的家鄉尋陽園田居了，直到元興三年（404年），他才「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而出仕劉裕的鎮軍、建威參軍。

元興元年這年，淵明隱居於園田居，該年似乎沒有許多作品存於陶集。但陶集中收有《和郭主簿》二首，對於這兩首詩寫作年代，學界尚有不少分歧。有人認爲《和郭主簿》是作於義熙年四年（408年），清人陳沆在《詩比興箋》卷二中引述了其中的第二首，箋注曰：「此詩不得其年，而決知其爲義熙以後作也。歲寒後彫，情見乎詞。」<sup>②</sup>今案：《和郭主簿》之二中的「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sup>③</sup>等句，似乎具有陶淵明義熙年間從彭澤歸來後的氣韻。但陶集中也確實有一部分作品難以確定其創作年代，儘管《和郭主簿》之二具有淵明在義熙年間的創作風格，但其第一首中的「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兩句，似乎是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確定其年代的線索。淵明大約在二十九歲時得長子陶儼，到他四十四歲後作《責子》詩時，其長子陶儼已經十六歲了，而他最小的兒子陶佟也有九歲了，僅比陶儼小七歲。如果將此詩確定爲元興元年（402年）所作，此時淵明三十八歲，則陶儼爲九歲，而陶佟則剛好兩歲，他正好是「學語未成音」之時。由此可知，至少《和郭主簿》之一是作於元興元年的，今謹將全詩鈔錄如下。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吹我襟。息遊  
閒交業，臥起弄琴書。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

①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4頁～255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詩比興箋》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sup>①</sup>

從這首詩中可以清楚地見出：淵明在離開了仕宦羈縻的日子裏，他的身心真正獲得了自由，加之農家小康那種自足自樂的生活，使作者更加覺得怡情。你看：淵明那園田居的房舍綠蔭如屏，儘管盛夏時不乏暑熱，但在他那裏卻仍存儲有初夏時的清陰；陣陣南風吹來，忽爾回旋而去，不時地撩起作者的衣襟。淵明這時沒有公務纏身，他可以「寢興無時，惟適之安」，與此同時，他也可以謝絕交遊（因政局不定時，人心叵測，加之淵明穎悟絕倫，從之遊者也往往「語默自殊勢」「發言各不領」），陶醉在以琴書自娛的高雅生活之中。更兼當年淵明的園子裏種有新鮮的瓜蔬，倉庫中還積存有去年的舊穀，他並無衣食匱乏之虞，因而也自知滿足了。他便將秫穀舂熟作成美酒，待到酒釀熟了就自斟自飲；當時他最小的兒子在他身邊嬉戲，學著成人講話而並不流利。像這樣家豐人和的天倫之樂，沒有那種在仕宦中的違心舉止，沒有交遊應酬的那些虛假的客套，自然是人生中難得的至味。淵明陶醉在這快適的隱居生活中，聊且忘記了仕宦的榮華富貴，他常常引領遙望天邊悠然飄來的串串白雲，因此而產生對上古龐樸民風的至深向往。

**陶淵明與佛道教** 在元興元年還有一件發生在淵明家鄉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廬山慧遠法師與劉遺民等百二十三人在無量壽佛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梁代慧皎的《高僧傳》載：

彭城劉遺民、豫樟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繼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sup>②</sup>

在這裏面，周續之、劉遺民二人與陶淵明確有過交往，由於他們志趣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高僧傳》卷六214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相投，時人將他們三人叫做「尋陽三隱」。還有張萊民（即陶集中所說的張常侍，名張野），他與羊松齡、龐遵等人，也常常以酒要淵明飲。瞭解這些人的生平行狀，對於我們研究陶淵明的思想個性與藝術風格的形成，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當時還有文獻記載淵明也被慧遠法師所招，但他終究還是沒有加入這次齋社。對於慧遠法師的這次蓮社，後人曾為其中的十八人作了「高賢傳」，在南宋志磐的《佛祖統記》卷二十六中，就收錄了《十八高賢傳》，且附錄了其中不入社的三人傳記。其中對陶淵明有這樣的記載：「淵明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而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酒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sup>①</sup>其中未入蓮社者還有謝靈運、范寧二人。范寧以儒業為畢生事業，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他的不入蓮社是必然的事情；至於謝靈運的未入蓮社，據說是慧遠法師「以其心雜而止之」。但據湯用彤先生考證，廬山蓮社的史實尚存有疑竇，很難確定是確有其事。湯用彤先生認為：「《十八高賢傳》乃妄人雜取舊史，採摭無稽傳說而成」<sup>②</sup>，湯用彤先生對蓮社的來由、十八高賢說之產生與流傳，以及十八高賢中人士的各種史料都加以揀擇辨正，認為蓮社的事跡與史實並不符合。而陳寅恪先生則認為陶淵明與佛教絕對沒有關係，陳先生根據陶集中《形影神》三首作品，卻給淵明安上了一個「天師教徒」的身份<sup>③</sup>。陳先生的學識確實令後人景仰，但他在確定陶淵明是天師教徒這一斷語上，似乎仍然缺乏十分得力的證據。

---

① 參見《佛藏要籍選刊》第十二冊 141 頁下～142 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58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淡之關係》一文中說：「淵明之思想為承襲六朝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設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於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僊，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之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至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宗天師也。」

天師道的教主為東漢張道陵，到了晉代則衍生為「五斗目道」，太元十六年，五斗目道徒王凝之曾經在尋陽一帶的南山精舍搞了一個譯經活動，我們在上文中也作了討論。雖然五斗目道對淵明的家鄉曾經有過一定的影響，但佛道兩個宗教畢竟是不會那麼容易合作的，且在慧遠法師的《阿毘曇心序》中雖然也提到了提婆的譯經之事，但卻沒有隻字涉及到了王凝之。再通覽陶集，也沒有發現任何與五斗目道發生往來的材料。在孫恩造反稍後時，盧循純以五斗目道的方式反晉，410年，盧循與江州刺史何無忌之間發生了多次激戰，尋陽一帶成為了戰場，這自然會給那一帶的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使那裏的人民陷入深深的戰亂之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陶集中居然沒有一個字正面涉及了這場戰爭，僅從淵明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遙遙築溺心，千載乃相關」等詩句中，似乎可以隱約地發現他對這次戰亂的深深感慨。

陶淵明是否為天師道徒，或者是否為佛教徒，是直接關係到確定淵明思想傾向的，也是分析淵明藝術審美理想的關鍵點，因而我們對此不可不採取慎重的態度。我們首先不妨去考察一下淵明與慧遠法師之間的關係。在陶集中，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字涉及到了慧遠法師的，但陶淵明確實去過廬山，這應當是歷史的事實。在《十八高賢傳》中也說明了淵明沒有參加那次蓮社，但就未見得淵明與慧遠法師之間就根本沒有一點交往。湯用彤先生認為：「靖節與慧遠先後同時（按：在遠公立誓時，陶年三十九，遠年六十九）。但靖節詩有贈劉遺民、周續之篇什，而毫不及遠公，即匡山諸寺及僧人亦不齒及，則其與遠公過從，送出虎溪之故事，殊難信也。」<sup>①</sup>今案：是年淵明年三十九有訛，當為三十八，慧遠法師年六十九信然。湯用彤先生是注重考證的，他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否定淵明與慧遠法師之間的交往，自然是不無道理，但似乎還有些欠慎重。既然淵明與佛教的關係不多，那麼淵明又是不是天師道徒呢？這恐怕同樣難以成立。淵明確實作了《形影神》三首，據說是作於義熙九年（413年）左右，這三首詩就成了推翻

---

<sup>①</sup> 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6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淵明與慧遠法師交往，並確立他是天師道徒的唯一證據了。

大約在隆安三年（398年）前後，桓玄與慧遠法師之間曾圍繞佛教的教義作過反復的辯論。當時，桓玄首先作《罷道（指佛教）論》，慧遠法師作《明報應論》來答辯；桓玄繼而又作《沙門應敬王者論》再度提出反駁，慧遠法師便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加以回駁。其中《沙門不敬王者論》大約作於元興三年（403年），全論共五個部分，其中第五部分為《形盡神不滅論》。義熙八年（412年），慧遠法師在廬山刻石立佛影，大約在義熙九年作《萬佛影銘》。學界有人認為陶淵明的《形影神》三首之寫作，是為對慧遠法師的《佛影銘》思想進行批判的<sup>①</sup>，這種看法似乎還很有值得商榷之處。

在這裏，我們不妨先將遠公的《萬佛影銘》鈔出：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而冥。茫茫荒宇，靡勤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中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挹之以力；惠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綵虛凝，殆映宵霧；跡已像告，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仿佛鏡神儀，依稀若真遇。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斯修。庶茲塵軌，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sup>②</sup>

銘文後面注曰：「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公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云云。據說遠公還邀請謝靈運作《佛影銘》，其銘文收錄在《廣弘明集》卷十五中。我們從銘文中是不難看出，其中帶有濃厚的玄學色彩，難怪湯用彤先生認為「慧遠亦不脫兩晉佛學家

<sup>①</sup> 參見逯欽立註《陶淵明集》之《附錄一》21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sup>②</sup> 參見《廣弘明集》卷十五，《佛藏要籍選刊》第二冊595頁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之風習，於三玄更稱善長」<sup>①</sup>。遠公的銘文固然是不乏玄學色彩的，但他之所宗畢竟是在「般若」，故「廓矣大象」、「萬象一色」乃在於標舉般若之本體也。既然如此，慧遠法師為何又要設立一個有形的佛之影像呢？而且還要如此鄭重地勒銘於山呢？我們不妨看看他的《佛影銘序》吧：「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sup>②</sup>在這裏，慧遠法師為了培養眾生的信心，權設佛影，期以有相的外形導入那無相的「般若」之實體，因此，他站住法身無相的角度，將眾生所執著的形影之辨，破斥得乾乾淨淨。

那麼，在遠公看來，「神」該又何以詮釋呢？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慧遠法師專門論述了「形盡神不滅」的道理。但在慧遠法師看來，那個不滅的「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佛教講因果，認為業感緣起的道理是絲毫不爽的；另一方面，佛教也相信一切業果都是自己所造，因而立「自作自受」之說。也就是說，這個不滅的「神」在一期生命消亡之後，並不見得到了下一期生命中就會如上一期生命中那樣地無絲毫增減。對此，遠公認為：「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sup>③</sup>至此，我們可以將慧遠法師對於形影神三者的看法略微歸納一下：遠公站住法身「萬象一色」的角度上，並不主張將形與影絕然分開，在他後期（412年）權設佛影的作法，在慧皎的《高僧傳》裏似乎沒有提到，僧祐的《弘明集》也沒有收錄這篇文章，其間似乎還有一些歷史疑竇存在。但儘管慧遠法師權設了佛影，那也祇是一種方便的作法，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位老法師對於眾生的無礙的慈悲。而對於時人所說的「神」，大抵就是佛門中所

① 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參見《廣弘明集》卷十五，《佛藏要籍選刊》第二冊595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參見《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五》，《中國佛教思想研究資料選編》第一卷86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指的眾生與生俱來的業感，約略相當於唯識宗裏所說的「阿賴耶識」，它是伴隨眾生生命遷流所造下的善惡業的變化而變化的，其變化就如同火之傳於薪一樣。

我們在粗略地瞭解清楚了慧遠法師對於形、影、神三者的看法以後，再來考察一下陶淵明的《形影神》三首，即可見出他與遠公思想之間的徑庭來，同時也可以更加客觀地把握住淵明的宇宙觀。淵明在這三首詩的開頭冠有一個小序，其文曰：「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惑甚焉。故極寫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sup>①</sup>讀了這個小序，我們不難見出淵明這三篇作品的寫作，旨在解決世人「惜生」一事，故爾纔權設形影對話，然後以神的口吻來闡述造化自然之理。其中第一首《形贈影》曰：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少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sup>②</sup>

在這裏，淵明首先列出了山川的永恒性，接著說明草木雖然有枯榮變化而終歸不滅的原理，在於它們能得「常理」。但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卻不如它們，一期生命轉瞬就在這個世界裏消失了，為此他諷喻世人要順應自然，不必執著地追求「長生」。在詩中的「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兩句，頗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按照一般的常理來說，佛家是不講「長生」（「騰化術」即是為「長生」服務的）的，且佛家將成了僊的天界仍置於十法界的六凡界中。這個「騰化術」顯然就是指道家的那套修練長生的法術了，那麼，那種將淵明《形影神》強扯到與批判慧遠法師「佛影」一事上面來的作法，似乎就難以成立了。

我們再來看看淵明的《影答形》吧：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

① 參見《陶淵明集》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3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sup>①</sup>

在這裏，淵明認為「影」祇是有形的人體的一種外在聲譽，它雖然如影隨身，但畢竟是形滅影銷的。因而好名者希望立善名（含立德、立功、立言）以流芳百世；但「身沒名亦盡」；且欲立善還必須苦形，因此淵明認為「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詩中，淵明對於「存生」、「衛生」這些道家的修身術都是很反對的，他對於崑崙、華山的修僊學道也頗為蔑視，站住這個視覺來看，也無從將《形影神》強扯到批判《佛影銘》的事情上去了。

我們再看《神釋》一首：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形依附；結托既喜同（一本作「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sup>②</sup>

在這裏，淵明將神與形影之間的依存關係作了闡述，人之所以為三才（天、地、人）之一，乃因為有「神」的依存而成。緊接著，淵明以「神」的口吻向形與影解釋道：「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在淵明看來，「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sup>③</sup>，因而人生祇有順應自然，遵乎「天理」，委運去留，纔可能沒有任何對生命消亡的痛苦。惟其如此，淵明對於死亡看得特別透，他「不喜亦不懼」，以故他自作《挽歌》、自撰《祭文》，何其灑脫，殊無纖毫貪生怕死之念。他所崇尚的「自然」、或曰「大化」，事實上也是宇宙的一種本來規律而已，那是任何人都無法以主觀意志逆轉它的。細讀這首詩，淵明似乎尚未正面涉及到形盡之後神是否滅這個關鍵問題，他祇是以神的口吻說：「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① 參見《陶淵明集》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挽歌詩之一》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也就是說，人生中無須刻意地去養生與立善，而祇有將此有限的生命去順應「大化」的自然之常理，任運去留，纔算是看透了人生。

在淵明的《形影神》三首中，貫穿其中的主旨不外乎是順應自然，不刻意地去追求長生與建功立業。其中卻不乏對道家的長生、成僊成道的否定，也有對儒家揚名顯親的功利思想的批評，而在批判「立善」中，唯獨沒有直接與遠公的「因果報應」之說相抵觸的語句，那麼，後人又何以要根據淵明的這三首詩而武斷淵明對於慧遠法師的思想是鍼鋒相對的呢？這委實乎有些單憑主觀意願去做結論了。

若剋實而論，淵明的思想形成，確實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至於《形影神》究竟作於何時，並無確鑿的歷史證據可考，之所以有人認爲它是作於義熙八、九年（412年～413年）左右，也僅僅祇是爲了將淵明的這三首詩與遠公的《佛影銘》強扯到一起的緣故罷了。在筆者看來，淵明的《形影神》三首絕對是他後期的作品。因爲早期的淵明深受其家庭環境的影響，陶氏家族的祖榮、孟氏家族的崇儒與建功立業思想對淵明的影響，我們在前面都已經論述了。況且淵明早年確實也有過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願望，這在《命子》那一組詩裏是可以看得出來的。無奈淵明生不逢時，命途多舛，他曾幾度涉足官場，但仕途的顛簸卻使他大爲失望；他曾殷切地期望子嗣能有所長進，但無奈他「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這一切都使他非常失望。淵明面對如此不如意的人生，他一方面無力回天，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稟性不阿、不願意使自己的主觀意願遭到扭曲的人。故爾《形影神》三首均不離酒，從「得酒莫苟辭」、「酒云能消憂」、「日醉或能忘」等句中，是可以清楚地見出他是在儘量地逃避他所不願意接受而又必須接受的那個現實。與此同時，淵明的崇信自然，陳寅恪先生認爲他是「新自然說者」，對淵明似乎是有所窺破；但他斷定淵明是天師道徒，這實在是有些失之偏頗。

從上可知，淵明與慧遠法師之間並無任何直接的思想衝突，他的《形影神》三首確實也應當是他後期的作品，我們甚至還可以將之繫年於《挽歌》、《自祭文》那一個期間，也未見得不可以。試想：淵明

這樣一代才華橫溢的詩人，在他處在晚景淒涼時，獨居飲酒，構想形影互呈苦言，而以神的口吻來釋疑，那種自我慰藉的心境不是灼然可見了麼！

**陶淵明與蓮社關係** 對以上事實正本清源之後，我們還是回到淵明與劉遺民和遠公等人的關係上來作些討論，因為，這對於如實地把握住淵明的人生審美尚好，實在太重要了。淵明與劉遺民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在陶集中收錄了淵明寫給他的兩首詩。劉遺民與慧遠法師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他在《十八高賢傳》中也有傳記。據說劉遺民原名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劉遺民精通老莊諸子，事母以孝聞，但「自負其才，不預時俗」，他做過「參軍」、「柴桑令」等小官吏，待到劉裕陰謀篡晉時，他便力辭官職，隱居廬山，更名爲「遺民」了。在當時號稱爲「尋陽三隱」的三人中，確實也祇有他與陶淵明是真正徹底隱居了的。法琳在《辨正論》卷七中說劉遺民多病，他不以妻子掛懷，卜居廬山西林中。元康《肇論疏》說劉遺民做柴桑令的原因是「以爲入山之資」，他大約在桓玄篡位的那一年（403年十二月）就開始在廬山隱居了（事實上是棄妻子而「住山」），他住山前後達十二年而卒。史載淵明常往廬山，說不定淵明就是去見劉遺民。又，據湯用彤先生考證，劉遺民所行是禪事，而非淨土，事實上「遠公之佛學宗旨在於「般若」。溯其未出家時，本尤善《莊》《老》。及安公講《般若經》，豁然而悟。及後曾自講實相義……」<sup>①</sup>劉遺民與遠公之間都是偏重於禪修的，蓋後世好事者多以淨土附會其中。也正因爲劉遺民注重禪修，以故他與淵明之間存在著許多的投機之處，淵明畢竟是一個資質穎悟的人，他與遺民的人生理想之間必然會有許多的溝通之處。淵明在《酬劉柴桑》中說：「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sup>②</sup>，這裏面是不乏山居的禪悅情趣的。在淵明詩中的「欲辨已忘言」（《飲酒》）、「遠我遺世情」（《飲酒》）、「虛室絕塵想」（《歸園田居》）等語句，比起後世享有詩佛之稱的王維來說，又何嘗有一絲的遜色！這些充分說明了淵明在經過了人生坎坷際遇的摔打之後，他更

<sup>①</sup>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sup>②</sup>參見《陶淵明集》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加傾向於禪修（在淵明這裏祇是一種對自我心靈痛苦的解脫而已）了。無怪乎宋人葛立方認為：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摩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摩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邪？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sup>①</sup>

但淵明與劉遺民之間的禪修畢竟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因而他們之間在人生觀上是存在著一定的距離的。在淵明的人生觀中，儒家的人倫觀念仍然佔有很大的成分，因而他在《和劉柴桑》中，對於劉遺民的捨家住山，便以「直以親舊故，未忍言索居」<sup>②</sup>作了委婉的規勸。與劉遺民不同的是，淵明對待子女是那樣地慈和，對待他的弟妹是那樣的友愛，對待其父母是那樣地孝順，對待其朋友是那樣地篤厚。他所喜歡的是「弱子戲我側」（《和郭主簿》）、「命室攜弱童，良日登遠遊」（《酬劉柴桑》）的濃具天倫之樂的生活。這也就使得他雖然與劉遺民、遠公之間有一定的交往，但他最終卻不可能走入佛門，更不可能像劉遺民那樣地去住山修行了。

自然，我們要在思想上辨析陶淵明究竟是屬於哪一家，這似乎也是一件難事。淵明幾乎對於來自他身邊的各種思想都有所採摭，但他又似乎對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全部採取，他所走的是他自己的道路。對此，朱光潛先生是這樣說的：

淵明很可能沒有接受任何一家學說的影響，甚至不曾像一個思想家推證過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資與涵養逐漸地使這麼一種「魚躍鳶飛」的心境生長成熟，到後來觸物即發，純是一片天機。

<sup>①</sup> 參見《韻語陽秋》卷十二，《歷代詩話》下冊 575 頁，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和劉柴桑》3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瞭解淵明第一須瞭解他的這種理智滲透感情所生的智慧，這種物我默契的天機。這智慧、這天機，讓染著近代思想氣息的學者們拿去當作「思想」分析，總不免隔靴搔癢。<sup>①</sup>

惟其如此，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不帶任何宗教思想的詩人，他的審美理念也代表了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風味。雖然站住人生解脫的角度上，淵明一生的這種採取似乎有失；但若站住保持淳淨的中國審美理念的角度來看，淵明的審美意象似乎又成了具有「中國化」特色的標本。

**躬耕與詩歌創作** 元興二年（403年），東晉王朝的政局進一步變壞：二月，桓玄自稱大將軍；八月桓玄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桓玄遷安帝於永安宮，移太廟神主於琅邪國；十二月，桓玄正式篡位，稱楚，改元永始，貶安帝為平固王，遷之尋陽<sup>②</sup>。在這一年中，儘管也有一些反對桓玄篡位者，例如在九月起義兵的南陽太守庾仄，他很快就被桓玄擊敗了。如此多難之秋，淵明自然是不願意介入的，幸虧他此時正適喪期未盡，大可以隱居在家鄉尋陽，但他對天下的這些大亂是並非不知道的。祇是因為他的家鄉早就在桓玄的控制之下，淵明自然祇能從阮籍的「發言玄且遠，口不臧否人」處世哲學中汲取教訓，淵明也確實擔心有所失言，以故他在《飲酒》詩中也說：「君當恕醉人」。在陶集中，基本可以考訂為這一年的作品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勸農》、《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等，還有組詩《飲酒》，似乎也應當是這一年的作品。在以上作品中，《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與《勸農》都與淵明的躬耕生活直接相關；而從《和胡西曹示顧賊曹》及《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兩詩，則頗可以見出淵明當年家境日窘的狀況來。

我們曾經說過，陶淵明與一般士大夫的所不同之處，乃在於他敢於放下手裏的書卷，也情願脫掉自己的鞋履，下地去從事農業勞動。自然，農業勞動相對於身體來說，固然是疲勞的，且其收穫也遠不及

<sup>①</sup> 參見《詩論》29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

<sup>②</sup>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5頁～256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官俸之多，但爲了不使自己的良知泯滅，不讓自己的人格扭曲，淵明卻樂此不疲。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他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吧：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嘒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一本作「草」）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入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sup>①</sup>

如果說淵明在去年的夏天家尚殷實的話（事實上淵明也是不蓄餘財的），他當時「園蔬有新滋，舊穀猶儲今」，而到了元興二年，則已今非昔比了，淵明終於要下地勞動了，他必須力爭不誤農時，以期有一個好的收成。可以想見，淵明肯定是不大會經紀家務的人，同時他還不善於也不屑於到官場上去鑽營，自然他也不可能成爲一個好農民，惟其如此，其命運決定了他祇能當一個出色的詩人。「南畝」典出《詩經》<sup>②</sup>，後來成了農作的代名詞。對於農作，淵明在初次出仕時就從事過，不過他疇昔雖然耳聞過古田舍的農作，但畢竟沒有像現在這樣去實踐它，而到了403年，他家已經如同顏回一樣「屢空」（貧窮）了，因此他只得親自下地去勞動了。「鳥嘒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數句，無疑是對通往農田的道路景色的真切描寫，那山鳥清脆的鳴叫，那柔和的拂面春風，還有那掛著串串露珠的荒途野草，無一不是仲春的當陽之景。同時我們也可以從淵明耕種地的如此荒僻，聯想到淵明所耕的地或許還是新開墾的。其中「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二句，可以說是淵明第一首詩的志之所之者，他之所以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3頁～1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詩經·豳風·七月》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集傳》9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在春種繁忙時，農民往往在地裏勞動，午飯也不回家喫，故婦女往往要將飯做好送到田園裏去。由於南坡向陽，有利於農作物生長，古人田土多向南開闢，以故後來這個「南畝」也就成了農事的代名詞。

耕種於野，也並非是他不能涉足仕途，而是他不願意到桓玄的手下去為他的篡位陰謀賣命而已，因而他也不願意再在那險惡的官場廝混下去了。

第二首應當是作於暮春，因為此時淵明的田園裏「良苗亦懷新」了。淵明一開始就提出了「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可見，在淵明的理念中，儒家的思想仍然佔有主導地位，而僅僅祇是那個黑暗動蕩的歷史年代，使得淵明將儒家的思想理念以一種變態的方式來加以表達而已。在尋陽的暮春三月，自然是「江南草長，群鶯亂飛，雜花生樹」<sup>①</sup>了，那古田舍的平整田疇，那悠然吹來的和風，那茂盛生長著的莊稼在隨風起伏，遠望那一片碧油油的景色，就夠惹人憐愛的了。因此，淵明指望著該年能夠有一個好的收成，他也情願成為一個像長沮桀溺那樣的隱士。與此同時，淵明在耕種的過程中，也更加接近勞動人民了，他每天日落時與農民一起回來，而且還不時地用壺盛酒以犒勞他的鄰居們。淵明就這樣快然自足，「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了。

淵明的躬耕是情願的，因此，他「秉耒歡時務」，同時他還能「解顏勸農人」力耕，這種思想在《勸農》組詩中，表現得比較充分。《勸農》是由六首四言詩組成的，在其中，淵明雖然提出了「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等看法，其間似乎也很有某些老莊思想的色彩。但淵明主要的觀點是體現在他對農作勞動的尊重，因而他歷舉后稷、舜、禹等上古賢君，以他們都親自從事農業勞動的事實來勸導農民力耕。淵明甚至認為除了像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可以「四體不勤」、像董仲舒那樣的大儒可以「三年不窺園」以外，其餘的人都不能輕視農業勞動。因此，他善意地奉勸農人莫違農時，及時耕種，爭取獲得好的收成；如果貽誤農時，「宴安自逸」，那麼他們所得到的自然是「儋石不儲，飢寒交至」<sup>②</sup>的下場。《勸農》詩表現了淵明對農業勞動的重視，也體現了淵明通過直接的農業勞動，與農民之間建立

---

① 參見邱遲《與陳伯之書》，《文選》卷四十三 609 頁下，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勸農》1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了感情，這就是淵明與一般士大夫所不同的最根本點。由於淵明既涉足了官場，他便與上層社會有一定的交往；又因為他躬耕自資，故爾又與下層勞動人民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且在他的詩中還有不少描寫他與田父對酌的篇什。這就使得淵明的詩文不但具有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而且也更加貼近社會生活、貼近人民群眾了。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大概也是作於元興二年五月，詩中那些出色的景物描寫體現了淵明素來優美清新的藝術創作風格。在這首詩中似乎隱含了對人生短暫的感慨，與某些人生不得志的悵憾，例如「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sup>①</sup>數句，就不無「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sup>②</sup>的喟歎。再從「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兩句，也可以見出當年是一個歉收的年成，因而淵明也只得將「賒欠」略微遲緩了。淵明的《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是寫給敬遠以表互相慰藉之作。敬遠是淵明的堂弟，敬遠的母親與淵明的生母又是姊妹，他兩人的兄弟情誼自然是十分篤厚的。在淵明奔喪期間，雖然祇有程氏妹與他在一起，而在淵明居喪期間，敬遠始終是與淵明居住在一起的，且後來淵明從彭澤歸來之後，敬遠也一直沒有離開過。淵明在《祭從弟敬遠文》中說：「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真彼眾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sup>③</sup>故爾在義熙七年（411年）敬遠的去世，使淵明尤為感傷。透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我們不難見出淵明403年冬季的困窘來：當時淵明家的荊門日閉，寒冬的北風砭人肌骨，忽而又下了一場大雪，這對於本來就生活困窘的淵明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了。詩中的「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sup>④</sup>，將那種貧寒淒涼的氣氛勾勒得無遺了。惟其生活如此貧困，就愈

① 參見《陶淵明集》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加要具有「君子固窮」<sup>①</sup>的氣節了，因此淵明作此詩饋敬遠，用以表達「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之深意。

《飲酒》之創作 《飲酒》是由二十首五言詩構成的組詩，它是陶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詩的前面有一個小序：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指冬季之時令），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sup>②</sup>

從小序可知，《飲酒》並非是一日之作，而是一個時期內所积累的作品，然其寫作時間應當是在冬季。對於《飲酒》詩的寫作年代，學界確實存有一些分歧，但關鍵還是在於對其中第十九首的詮釋問題上。有人認為其中有「終死歸田裏」之句，則推斷這組詩作於淵明彭澤歸來以後，又以其中「亭亭復一紀」一句而將之再下推十二年：即從義熙元年（405年）推到義熙十二年（417年）。這種推斷固然有一定的道理，而沈約在《宋書》中也說淵明「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sup>③</sup>案：沈約說永初以來只記甲子倒是事實，但陶集中畢竟還有許多作品並未標明年月，《飲酒》一詩就是如此。但我們如果通覽《飲酒》二十首，則可以發現其中第十六首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sup>④</sup>幾句，似乎為我們解決《飲酒》詩的寫作年代提供了一個線索。淵明寫作《飲酒》詩時，其年齡大概就在三十九歲，因為「四十」為「不惑」，「向不惑」乃將近四十之意，正好為三十九歲。元興元年，淵明正好三十九歲，剛好與「向不惑」相脗合。又其中第十九首中有「亭亭復一紀」一句，淵明的初次出仕時為二十九歲，至元興元年的三十九歲，也進入了第十一個年頭，古人在數字上往往舉其成數，十年也

---

① 淵明在《與從弟敬遠詩》說：「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十三經註疏》251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固窮節」也就是指「固窮（安於貧窮）」的氣節。

② 參見《陶淵明集》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宋書》卷五十三392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光碟版《二十五史》。

④ 參見《陶淵明集》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可以稱為「一紀」(十二年)，何況虛數已經十一年了。基於以上情況，我們將《飲酒》組詩確定為元興元年所作，應該是不會有很大的不妥了。

《飲酒》作於元興二年的整個冬季裏，其中幾乎每一首作品都與酒相關，無怪乎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sup>①</sup>同時其寫作也與淵明的琴書及其他日常生活相關，故《陶淵明傳》載他「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sup>②</sup>蓋淵明在這一時期內，飲酒遇興會所致，輒題數句；或觀書有感，亦為題識，由是而積累成這個組詩。由於《飲酒》是陶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們準備對它作比較全面地介紹。

《飲酒》的第一首與第二首，似乎與淵明的讀書相關。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淵明的讀書大抵是憑興趣的，他「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因而他在讀書有感時是不可能不形諸文字的。也因為淵明的讀書具有這種特色，因而也注定了他祇能以他絕倫的穎悟成為一代大詩人，而決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學者。《飲酒》的第一首應當與讀《史記》直接相關，淵明對於《史記》應當是喜歡的，在陶集中還收有《讀史述九章》，其中九篇作品幾乎都與《史記》直接相關。在第一首裏，淵明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sup>③</sup>「邵生」即「召生」，《史記·蕭相國世家》載「召平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之『東陵瓜』，以召平為名也。」<sup>④</sup>召平在漢代為布衣，雖然所種的瓜味道鮮美，但與他當年作東陵侯時相比，已經是不同年而語了。面對人生這種衰榮不定的現實，淵明看得很自然，也看得很透，他認為這祇是如同四時的寒暑代謝而已，但他也認為祇有「達人」纔可能理會得到其中的妙趣。淵明的對人生的窮達看得那樣地清淡，乃

① 參見逯註《陶淵明集》10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3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上海同文書局光緒十年石印版線裝本30冊《史記》之十九冊。

在於他是在拋開了個人際遇的前提下，纔認為這種現象莫過於寒暑代謝而已。

也就是說淵明此時的心境已經超出了他所處在的東晉王朝那種具體歷史氛圍之中了，他以凌空觀照的氣度來俯瞰人間的哀樂，將窮達、苦樂、衰榮等一切都視為自然規律的變遷。因而他對自己當下困窘的境遇，自然就不會很在乎了，以故他「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sup>①</sup>。《飲酒》的第二首似乎體現了淵明對人生果報的將信將疑，他所提倡的仍然是孔子的「固窮節」。詩的開頭四句說：「積善云有報，夷齊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sup>②</sup>在這裏，淵明引用了伯夷、叔齊的歷史傳說，這一內容也出現在他的《讀史述》之第一首，可見淵明對《史記》中的《伯夷列傳》是非常欣賞的。

在整部《史記》中，也祇有《伯夷列傳》的史料最少且又出自於傳說，但司馬遷在述說了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及其在武王伐紂後隱居首陽山的簡要傳聞後，便來了一個巧婦無米之炊式的論贊。那段文字實在是精妙絕倫極了，像淵明這樣「欣然會意」的讀者，是絕對不會將之放過的。謹將原文鈔錄如下：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挈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糶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sup>③</sup>

司馬遷父子都是史官，依《太史公自序》與《漢書·藝文志》等記載，

① 參見《陶淵明集》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上海同文書局光緒十年石印版線裝本30冊《史記》之二十冊。

史家與道家的關係應當是非常密切的<sup>①</sup>，因此，司馬遷的立論一開始就引用了《老子》中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誠然，在太史公的論贊裏，不乏對天道不公的種種憤懣，其間蓋以漢武帝凶殘地對他處以腐刑相關。而在淵明這裏，則既對果報置以懷疑，但又不完全否定這一現象的存在，這也充分地說明了他與慧遠法師之間並無任何直接的思想衝突。但我們在這裏必須指出，淵明所說的果報，並不是遠公所說的那種「三世因果說」，而僅僅祇是儒家所認為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sup>②</sup>的那種「果報說」，這與佛家所說的「三世因果」之間畢竟有很大一段距離。接著，淵明引用盛行於東晉時的《列子·天瑞》中的傳說：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已經九十歲了，他非常貧困，用繩子當作腰帶，而他卻不以此為憂，尚鼓琴而歌。通過這個傳說，淵明進一步強調了要使後人為之立言，就必須具有「固窮」的君子氣節，這樣，他纔能守得住那份清貧，耐得住那種寂寞。可見，在淵明的思想中，儒家思想仍然是佔主導地位的，祇是因為他遇上了那樣一種變態的社會，以致使他的這種思想也祇能以變態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已。

第三首顯然是鍼對晉代士族虛偽的禮數而言的。詩的開頭四句說：「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身後名。」<sup>③</sup>我們在上文中就列舉了阮籍喪母而飲酒食肉的事跡，當時阮籍不管士族們如何地嘲笑，他還是照樣地飲酒喫肉，表現了他對當時虛偽的禮數的嘲諷。大概淵明也與阮籍所見相同，他在喪母時的飲酒是有詩為證的，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及了。他認為孔子之道降及東晉已經喪失近千年了，今人何必還去恪守古人的那種法度呢？況且，「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在有限的人生裏，過於扭曲人性去曲從那些瑣屑的法

---

① 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也說過「文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間」的話，《太史公自序》也記載了司馬談對道家的崇拜。這些說明了司馬遷對於道家是比較尊重的，也說明了史家與道家之間的淵源關係。

② 參見《周易·坤卦文言傳》，《十三經註疏》19頁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度，也只能使人們變成一事無成的碌碌庸人。

第四首詩是託物言志的作品。淵明出色地描寫了「失群鳥」尋找其歸宿的景象：它的叫聲「厲響思清遠」，它來去依依，儘管還在徘徊不定，但它矢志要棲息在孤高的松樹上。透過淵明對失群鳥的尋找孤松棲息與孤松的「獨不衰」的描寫，是不難見出詩人對於人生理想的執著追求的。淵明爲了成就他耿介的人生品格，他具有一種一往無前、矢志不移的精神，這便是詩中「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的意涵所在。

《飲酒》第五首是歷來被人們所稱頌的佳作，也確是中國詩壇上不可多得的名篇。謹將全詩鈔錄如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sup>①</sup>

在詩人筆下，給我們展示的是一幅恬淡而又肅穆的山居圖畫。試想：在那僻靜的山居，詩人採菊東籬之下，此時，蒼翠的廬山自然地映入詩人的眼簾。尤其是山間的暮色更加殊勝，山色隨著日落的餘暉而逐漸變化，那色調柔嫩得格外可人；而在向山中翩然回飛的鳥群，它們頡頏引歌，相攜歸巢。這一切景色是那樣地真切，它們不帶任何人爲的整飾，也沒有任何外力的矯飾，簡直是一幅純然本色的圖畫。誠然，這幅純然本色的山居圖畫，若非是在淵明眼裏，而要是換上了另外一個凡夫俗子，那就會立即失去它的本色美。因此，我們不由得想起了高賢傳中謂遠公器重淵明的才性而瞧不起謝靈運的心雜，雖然有人認爲是後人的杜撰，但其中也不乏片面的道理。淵明之所以在窮居草廬時還能獲得如此恬淡肅穆的山居圖畫，乃在於他能夠「心遠」，這也就是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原因所在了。所謂「心遠」，也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理調整到合符藝術審美的適度，從而使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的運動，由此而獲得一種美的心理享受。從康德提出「審美無利害論」以後，二十世紀初葉（1907年）英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國美學家愛德華·布洛（Edward Bullough）又在美學界提出了「心理距離說」，布洛以霧海航行為例證，說明了審美主體如果拋開了對個人潛在的危險的恐懼，以一種登山隊員不畏艱險的心態來看待眼前的逆境，那麼原本是異常的、甚至是凶險的審美對象，也將會呈現其美的特性來。但這些西方的美學分析，似乎還是存在著種種的缺陷，如果以中國禪學的審美理念來觀照，則自然會沒有美醜、順逆、榮辱、得失之別，萬象森羅，一切皆如，因而在世間也就無物不美了。而常人之所以存在著美與不美的分別，乃在於他們的心理始終存在著種種美醜、得失的觀念，如果將這些互相對立的觀念破斥乾淨，又何來美醜之分呢？奇怪的是淵明雖然並不信仰佛教，但在他的詩歌創作中不但給我們描繪了如此真氣逼人的濃富禪趣的圖畫，而且還提出了「心遠」這一心理調整方式。事實上他的這種心理距離的調適，也接近於禪修（思惟修）的形式了，而通過這種「心遠」修習所獲得的結果，自然也會縱使得身居鬧市者也會覺得「地自偏」了。我們由此也可以發現，淵明雖然沒有加入蓮社，但他在與劉遺民和遠公的交往中，畢竟耳濡目染了一些禪法，因而他也能獲得一些法喜的受用。自然，這也與淵明超拔的穎悟與絕倫的天資分不開，如果不是這樣的天才，他是絕不可能具有如此驚人的智慧的。其實，淵明的不加入蓮社，以及他的上廬山還以「許飲酒」作為條件，也是純粹地表現了他「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的稟性。他的這種富於本色的稟性，加上他極高的悟性與秉賦，也就成就了他極高的藝術修養。由於淵明能夠用「心遠」來觀照他身邊的一切事物，因而他那在常人眼裏看來非常寒酸的草廬也變得如此地閒適宜人、如此地恬淡幽美，就連他眼前的山色、翩然回飛的小鳥，也幾乎齊露法身，一齊顯現出了它們「美」的真諦來。而作為這個「美」的真諦，在淵明看來就是「真意」了，那是一種得意忘言的意象，是一種不可言說的恬淡而又肅穆的境界，它給人的是一種「欲辨已忘言」的美的享受。《飲酒》之五確實是陶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非常地深遠的，清人黃宗憲曾取其「結廬在人境」一句，而將自己的齋室命名為「人境廬」，我們自然也無須再去責怪宋人葛立方稱淵明為「第一達摩」了。

《飲酒》之六的主旨在於表達淵明歸隱的意願，卒章的「且當從黃綺」，便足以體現他的這種情懷了。黃綺是夏黃公與綺里季的合稱，他們與東園公、角里先生一起合稱「商山四皓」，是西漢留侯請來輔佐惠帝的四個隱士。顯然，在淵明這裏，對於他們的皓首出山是毫無可取的，且「四皓」也僅僅祇是留侯杜撰出來的高人，在淵明這裏祇是以「黃綺」當作歸隱的代名詞而已。在本詩中，淵明對於世間的榮辱毀譽可算是看得水滴石穿了，他認為「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同，雷同共毀譽」<sup>①</sup>在人類社會裏，祇要有是非觀念存在，毀譽也就伴隨而至了，而世間的是非之評判，又並無任何絕對的標準，由此人們對待毀譽大可視為雷同。事實上，自古而來，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現實可以說是代代有之的，即使是在夏、商、周三代那樣的盛世，也有這種現象出現。祇有在「達士」那裏，他們消泯了是非觀念，纔會會達到毀譽一如的境界。

《飲酒》之七也是尤為難得的佳品，茲錄全詩如下。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sup>②</sup>

我們在剖析本詩之前，首先必須解決一個學術界的成說，那就是關於「採菊」一事。在陶集中，「採菊」已經數見，如果按照傳統的說法，服食菊花可以延年，於是乎隱居修道者多飲用之，以故有的學者也認為淵明的「採菊」服食與延年相關。今案：是說頗值得商榷，菊花在道家那裏的服食用途我們姑且不論，而在淵明，則對於人生的久暫可以說是放得下的，他在《挽歌詩》中認為「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由此他的「採菊」恐怕與延年的關係並不密切。但菊花確實有清肝明目的藥用功效，適當的服食自然是有益於身體健康的，淵明的服食菊花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目的。而我們更應當看到：淵明作此詩的時候，已是冬令之時，除了菊花以外，恐怕不再會有別的花朵開放了。因而我們一讀「裊露掇其英」一句，便會很自然地理想起屈原《離騷》

① 參見《陶淵明集》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中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兩句，王逸注曰：「以香靜自潤澤也」<sup>①</sup>，大概淵明這裏的「採菊」也具有取其香潔以自況的意思。與第五首一樣，本詩勾勒了山居日暮的景色，其中「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兩句，與第五首所描繪的風景依稀相似，在這裏就不再贅述了。但在本詩中，作者著力描繪了一個山居隱士的生活與情懷：他是那樣悠然閒適地在他的草廬邊採下含露的菊花，用以助其舉杯時的酒興，「期在必醉」的詩人也喝得杯盡壺傾、醉意醺酩了。他就是以這樣一種甘居寂寞、能耐清寒的心態來保全自己的人格不受扭曲的，自然也祇有在這片遠離了統治者網羅的天地裏，詩人纔可以「嘯傲東軒下」，聊且獲得他生命裏的真實義趣了。在這裏，我們並不想再去重複已經闡述過了的那種審美意象，而單就「遠我遺世情」一句來略加評述。眾所周知，陶淵明沒有加入廬山的蓮社，他僅僅與劉遺民、慧遠法師有過交往，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也未見得就不從中獲得某些禪法的熏染，倘若不是如此，我們也就無從解釋「遠我遺世情」這個句子了。這裏的「遠我」應當是一種禪修的方法，而「遺世情」（遺棄世情）則是禪修所要達到的境界。清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認為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達到了「無我之境」<sup>②</sup>，也未嘗不是如此，但竊以為「遠我遺世情」則更是達到「無我之境」的途徑所在。人們尋常的種種痛苦，莫不由此「心」產生，而這個「心」之所以有痛苦觀念，也全在於有一個「我」字在作怪。如果人們放下了自己所執著的「我」，打破了人我之間的界限，則一切是非、得失、毀譽也就會如同釜底抽薪一樣頓時消失得乾乾淨淨，其心理痛苦也就無從產生了。近人馮玉祥將軍有一首自勉的對聯：「欲除煩惱須無我，久經磨爛好做人」，人要解脫，又何嘗不是如此！其實，淵明的「遠我」，在佛門中則曰「去我執」，不期這位資性極高的詩人，居然在他人生忘機感悟的那一剎那間所獲得的境界，卻與禪機達到了冥合的地步。晚清譚嗣同對陶詩是至為推崇的，他將自己的齋室命名為「遠遺堂」，就就是從淵明的此詩中取其意。

① 參見洪興祖《楚辭補註》23頁，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② 參見《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合刊本19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飲酒》之八藉歌頌青松而顯其志。詩的開頭四句說：「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sup>①</sup>我們一讀，就不免想起左思《詠史》中的「鬱鬱澗底松」<sup>②</sup>來了，但此詩最終還是得意於孔子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sup>③</sup>一句。詩人把酒提壺，涉步林中，撫青松之寒柯，舉目遐觀，浮想聯翩。他認為人生如同夢幻，因此又何必要被塵世的縲紲所羈縻呢？《飲酒》之九也頗具特色，它體現了淵明與農家父老之間的友好關係。詩的開頭六句是「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世乖。」<sup>④</sup>田父可以設酒與淵明共飲，說明了淵明與田父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再從淵明急急忙忙乃至顛倒衣裳而去開門，則更可以見出他沒有一絲士大夫的臭架子。後面的詩句採用對話的形式，將淵明矢志隱居的意願再度表達了出來。田父規勸淵明的「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這自然是從《楚辭·漁父》中取其典故<sup>⑤</sup>，意在勸淵明不必自苦（繼續茅簷下），希望他能夠與世同流合污以改變其困境（這自然不是田父的原話，而是經過淵明的藝術加工了的語言）。但淵明的回答卻在感謝田父之餘，進一步表達了他「違己詎非迷」的見解，他願意「且共歡此飲」，但他表示「吾駕不可回」<sup>⑥</sup>。

《飲酒》之十追述詩人早年被飢寒驅遣而從事宦遊的生活。從淵明處世之道的「傾身一營飽，少許便有餘」<sup>⑦</sup>可以見出，他是不蓄家財的，那種「鼯鼠飲河，不過滿腹」的財富觀，也自然會驅使他時隱時仕。同時，淵明也說明了他的出仕並非是爲了求名，因而一旦衣食

① 參見《陶淵明集》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文選》卷二十一載左思《詠史》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原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文選》296頁下，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③ 參見《論語·子罕》，《十三經註疏》2491頁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楚辭·漁父》載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因而規勸他說：「眾人皆濁，何不渥其泥而揚其波」。洪興祖補註曰：「渥，古沒切」，蓋與「汨」同。參見《楚辭補註》295頁～296頁，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⑥ 參見《陶淵明集》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⑦ 參見《陶淵明集》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稍許有餘，他就會「息駕回閑居」<sup>①</sup>了。

《飲酒》之十一似乎體現了淵明對留名身後的人生觀念的懷疑，由此也足以見出他並不是學界所稱的思想家，他只是一個率性以抒胸臆的詩人。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多次介紹了淵明詩作中對於「固窮節」的讚賞，而在此詩中，淵明對顏回的貧寒早夭、對榮啟期的至老終窮以留名身後的做法，似乎也有某些懷疑。在詩人看來，「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sup>②</sup>，他顯然是不相信人死後會有靈魂存在的，因而他認為「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sup>③</sup>。自然，對於那些養尊處優、怡養千金之體的生活方式，淵明更不敢苟同，何況那千金之軀在那人死去之後就化為烏有了呢！因此，淵明對於喪葬也看得很破，他認為「裸葬何足惡，人當解意表」<sup>④</sup>。

《飲酒》之十二大概與讀史書有所感悟相關。詩中列出了西漢張摯出仕後因不能取容當世而終身不仕的事跡，又例舉了東漢楊倫因與世不合而辭官講學於大澤、乃至從者千人的故事，表達了詩人對爾虞我詐的官場的厭惡與矢志歸隱的態度。

《飲酒》之十三的含義比較隱晦，蓋詩人既感傷時事而又不便直言，其間也表達了他對於世人無法瞭解他此時心境的悵惘。試想：主客二人居止一處，但他們的取捨卻各不相同，其中一人長醉，一人長醒，他們兩人相對而笑，但所說的話卻互不領會，這在人生中應當是一種莫大的痛苦。惟其如此，詩人捎話給那位酣醉的客人，叫他天黑以後還要秉燭夜飲——因為酒醉時畢竟要比清醒時幸福。

《飲酒》之十四真可謂得酒中之趣，姑鈔如次。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sup>⑤</sup>

① 參見《陶淵明集》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細讀此詩，那種老朋友相聚，因而提著酒在野外的松樹下班荊為席而暢飲的場面，幾乎是觸目可得的。值得注意的是本詩中的「故人」，也許就是其鄉里之父老，淵明隱居時常常與「二三鄰曲」相酌（這在《遊斜川》中有所記載）。在這裏，那種觥籌交錯的場面且不說，單從父老們漸漸地因酒醉而說胡話、連斟酒相敬也行次紊亂了的場面來看，那酒也真喝到興致最濃之處了。在那酣飲的氛圍中，大家連「我」的觀念也消失得乾乾淨淨了，自然也不知道世間還有何物為貴了。像這樣一種暫得忘機的沉味，在人生中也恐怕是至為難得的了，這也就是淵明從酒中所品得的至味。

《飲酒》之十五描寫了草廬的荒僻，抒發了詩人對人生短暫的感喟，表達了詩人任運窮達，從而保全其「素志」的意願。《飲酒》之十六回顧了詩人過去的人生經歷，描述了他當時困窘的生活。從詩人對東漢時張仲蔚的羨慕（因為他得到了知音劉翥的接濟），似乎可以見出淵明對於他當時的貧困而無人所知存有淡淡的慍懣。《飲酒》之十七寫得很隱晦，其間似乎有對時局不勝感念而又不可言者。詩中描寫幽蘭待暖風而生長開花，但薰風到來後卻又被那些猛長的蕭艾所淹沒了，這種託物言志的筆法中似乎隱含了《離騷》裏「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sup>①</sup>之意，但也不可能排除其中也隱含了當時奸佞充斥朝廷之意。我們再從「鳥盡廢良弓」一句，也可以見出當時仕途中如同淮陰侯韓信被囚時的可怕境況<sup>②</sup>。總之，此詩隱含了詩人對官場中種種可怕現象的冷靜的審視，同時也表達了他「任道或能通」的人生取向。

《飲酒》之十八同樣寫得很隱晦，詩中引用了揚雄家貧時受人之酒而誨人以學的故事，同時也引用了春秋時魯君伐齊而問柳下惠的歷史典故，而在詩人看來，「仁者用其心，何嘗失語默」<sup>③</sup>。也就是說要

① 參見《楚辭補註》66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

② 《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韓信被囚而貶淮陰侯時說：「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見上海同文書局石印線裝30冊本《史記》之25冊。

③ 參見《陶淵明集》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像揚雄那樣別人載醪而不卻，並借鑒柳下惠的不答人主問伐國，無妨飲酒便是。顯然，詩中隱含了許多作者不便說的心中塊壘，元興二年的政局險惡，由此也可見一斑了。《飲酒》之十九是我們所經常稱引的作品，詩人回顧了他從第一次出仕（「投耒去學仕」）至作此詩時的近十餘年的人生經歷，面對「世路廓悠悠」<sup>①</sup>的狀況，與那就連楊朱也會臨歧而哭的社會現實，淵明認為祇有「濁酒聊可恃」<sup>②</sup>。

《飲酒》之二十對「道喪向千載」以來的的歷史作了簡要的歸納：「羲農去我遠，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sup>③</sup>這簡直是對中國東晉以前的文化史作了一個簡要的概述：在孔子時期，伏羲、神農的上古淳風已不復存在了，於是孔子孜孜不倦地對三代文化加以整理，對三代文化的優良傳統極力提倡，這纔使得已經破敝的傳統文化得以彌縫。儘管孔子不遇於時（鳳鳥不至），但傳統文化（禮樂）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暫得一新，而到了暴秦之時，經過孔子所整理的六經又被化爲灰燼，致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現了一個大的斷層。漢興，文帝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但他苦心搜集秦火之後的遺書，加上孔安國等人踵而成之，西漢經學由是復興，使秦漢間的文化斷層得以修復。但到了東晉這個衰世中，六經卻無一被人看重，那些趨炎附勢的士族終日裹驅車巴結貴族，毫無廉恥，世風至此已頹敗至極<sup>④</sup>。面對這種頹敗的世風，淵明認為祇有飲酒，以一醉方休纔可以排遣苦悶；但他終究還是擔心這種批評會激怒貴族，於是以「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sup>⑤</sup>來收束。

通覽第二十首《飲酒》詩，我們不難見出：在淵明的思想裏，儒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③</sup> 參見《陶淵明集》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④</sup> 《晉書》卷八十三《王雅傳》載：「會稽王司馬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恥。」中華書局1974年版《晉書》2179頁。

<sup>⑤</sup> 參見《陶淵明集》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家思想始終佔主導地位的，事實上他當時是多麼地企盼世風轉淳，天下安寧呀！但無奈他的這一美好願望無法實現，因而他祇能借酒澆愁，聊以自我解脫，這就使得他崇奉的儒家思想祇能曲折地表現了出來。

通觀《飲酒》二十首，我們不難見出淵明此時的生活已趨於困窘，這也許是他不久又為「三徑之資」而出仕劉裕的原因。但淵明並沒有因為他個人的生活境遇日下而改變他自己的初衷，他堅守君子的「固窮節」，打算長久地隱居下去。事實上，他後來的出仕劉裕部下，也祇是很短暫的時間，且此後就永不出仕了。在《飲酒》詩中，淵明似乎對於傳統的儒家果報思想與留名身後的人生理念等存有局部的懷疑，他對於養身與厚葬也並不贊同，他後來在《自祭文》中還提倡「不樹不封」。他從不願意為了實現優裕的生活而改變自己的夙志，他更不願意依阿取容、扭曲自己的人格，他是一個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①</sup>的士大夫。另一方面，由於淵明是一個具備了絕倫的秉賦的士子，他對於來自身邊的各種思想均能兼採其長，因而我們也無法給他的思想作一個確切的定位。但淵明的為人卻是率真的、單純的，惟其具有率真、淳厚的品性，兼以超人的穎悟，使他得以成為了一代偉大的詩人。《飲酒》組詩中不少篇什是千古傳誦的絕唱，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心遠」與「遠我遺世情」的審美心理，幾乎成了千古的不刊之論。陶詩之所以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大抵是淵明以其過人的天資與超拔的智慧，從痛苦的人生中悟到了人類審美心理的這一特殊規律。

### （三）陶淵明的第三次出仕與歸隱

**劉裕的崛起** 在桓玄篡位稱帝的同時，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出身寒微的建武將軍劉裕在京口（今江蘇鎮江）集結力量，準備攻入建康。劉裕字德輿，小名寄奴。東晉初，劉家逃難，從彭城遷居京口，

---

<sup>①</sup> 參見《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經註疏》2710頁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

劉裕年幼家貧，不能讀書，以耕種爲業，兼做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他同時又是一個酷愛賭博的無賴，曾因爲賭博輸了錢，被京口大族刁逵擲在馬樁上索賭債。這種生活經歷使得劉裕既瞭解到了下層民衆的疾苦，而且也使他具備了冒險求利的膽識。直到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劉裕纔做了劉牢之部下的參府軍事，他在討伐孫恩的戰鬥中勇敢善戰，屢立戰功。

元興元年（402年）正月，司馬元顯舉兵伐桓玄，劉牢之降桓玄後不久而自縊。當時其部將何無忌問劉裕：「我將何之？」劉裕便叫他同回京口<sup>①</sup>。當桓玄在元興二年十二月篡位以後，劉裕便於元興三年（403年）正月在京口「托以游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準備進攻建康。對此，《宋書》是這樣記載的：

三年二月乙丑朔，乙卯，高祖托以游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從子韶、韶弟抵、隆、道濟、道濟從兄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藩、孟昶、昶族弟懷玉、河內向彌、管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喜、從弟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範清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眾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散，莫敢動，即斬修以徇。高祖（即劉裕）哭甚慟，厚加殯斂。孟昶勸弘其日出臘。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sup>②</sup>。

劉裕就憑著這樣一種冒險精神，假稱詔書，由二十七人做骨幹起了家，到他進攻建康時，「百姓願從者千餘人」<sup>③</sup>。他就帶著這一千七百餘人，在當年三月攻佔了建康，斬桓玄的部將吳甫之、皇甫敷，使得桓玄的軍隊潰逃，桓玄也只好挾持晉安帝西上。

① 參見《宋書》卷一第2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宋書》卷一第2頁～3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③ 參見《宋書》卷一第4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劉裕進入建康以後，他被文武官僚推舉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sup>①</sup>，遂統帥各路軍隊繼續討伐桓玄。劉裕剛進入建康時，因為「晉氏亂政，百司縱馳，桓玄欲釐整，而眾莫之從。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sup>②</sup>可見，劉裕的初入建康，仍然是想有所為的，但重要的是劉裕當時僅僅只掌握了東晉的部分軍事、政治權力，他的羽毛尚不豐滿，故爾祇能如此，但在他骨子裏所揣的仍然是狼子野心。他在用人方面，由於桓玄的心腹司徒王謐善於逢迎，在劉裕進入建康時主動推舉他作鎮軍將軍，因此劉裕就憑個人的感情將這個該殺的王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而對於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一家，劉裕為了報昔日之仇（即因賭博欠債而受辱一事情）而殺了他全家；還有王愉父子，大約在402年，會稽饑荒，「百姓散在江湖採樵，內史王愉悉召之還」<sup>③</sup>，對於這樣的好官吏，劉裕為了翦除異己，他居然「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等<sup>④</sup>。從劉裕的這些做法，是不難見出他骨子裏所包藏的仍然是禍胎的。

當年四月，劉裕遣輔國將軍何無忌、振軍將軍劉道規等與桓玄戰於湓口（在今天九江附近，離淵明的家鄉尋陽不遠），大破桓玄軍，桓玄便挾持晉安帝東下。「五月，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於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於南郡。壬午，都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於江陵。……戊寅奉神主於太廟。」<sup>⑤</sup>桓玄的篡位，從他稱帝到覆滅，前後不過半年，而劉裕從起兵的由二十七名骨幹起家到統領千軍萬馬，前後也不及半年。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大的政治變化，能說這一時期的風雲變幻不厲害麼！在這裏，我不免想起了劉裕的一件往事，足以證明他不但會作戰，而且還是一個野心家。當年他在劉牢之部下，而牢之是

① 參見《宋書》卷一第4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宋書》卷一第4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③ 參見《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259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④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6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⑤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6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在淝水之役中就著名了的大將，因而 402 年三月，牢之降桓玄之後，桓玄立即奪去其兵權，牢之因與劉裕商量何去何從。劉裕說：「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得新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sup>①</sup>劉牢之不久又因反叛桓玄失敗而自縊，劉裕若不讓牢之走上這條路，像他這樣的下級軍官何以出頭？惟其如此，在一年之後，劉裕振臂一呼，而躋身鎮軍將軍，實現了他的政治野心。

404 年閏五月，桓玄的故將桓振攻陷江陵，劉裕的部將劉毅、何無忌等退守尋陽，晉安帝又被桓振所俘獲。早在劉牢之討伐孫恩時，桓玄卻命盧循為永嘉太守，反使「寇暴不已」，原來盧循也是一個五斗目道徒，他自然會縱惡不止的。孫恩死後，盧循繼續騷擾天下，404 年十月，盧循進犯廣州，他前後騷擾達近十年之久。

**此期的詩歌創作** 淵明在 404 年不到半年的時間內，面對如此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此時，他雖隱居在家鄉尋陽的園田居，但未見得就不在靜觀這政治風雲變化。《停雲》、《時運》、《榮木》與《連雨獨飲》大抵就作於這一年的春夏之際（農曆二至四月）。《停雲》、《時運》、《榮木》三首都是組詩，分別由四首四言詩組成，每首組詩前面都冠有一個小序。

《停雲》應當是作於 404 年的仲春，其小序中「園列初榮（開花）」一句，正好是仲春的季節特徵。淵明在組詩前面加了一個小序，用以說明這個組詩的寫作目的：「停雲，思親友也。罇酒新醪，園列除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sup>②</sup>至於淵明當時所思的親友是誰，這顯然是一個無從考證的問題了。有人認為詩中有「伊阻」、「成江」、「八表同昏」等語，便認為陶淵明是在指責晉臣，說他們中居然沒有一個人去來匡扶晉室。今案：《停雲》之作，若按季節，當在農曆二月，公曆三月，此時，劉裕正在京口舉義兵，也就無從可談指責晉臣了，某些人總喜歡將詩人與政治家強扭到一起去，那樣做等於將詩人與政治家放在同一個尺度上來看待了。在《停雲》中，所表現的純粹是詩人獨

<sup>①</sup> 參見《宋書》卷一第 2 頁，山東出版總公司 1998 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19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處時的寂寞以及他對親友思念的摯情，此詩就這樣簡單，惟其這樣單純，則那思念親友的摯情也就純然出自五內，一片天真，頗使讀者為之感動。茲錄全詩如下：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sup>①</sup>

這哪裏與政治相關？純是人之常情。在仲春之月，正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日子，往日裏親友相聚，濁酒一杯，雖無佳餚，但款款親情，亦是人生難得的一種樂趣。仲春之月，春雨往往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正所謂「春無三日晴」，那種親友之間不能走訪，獨斟新醪（仲春與重陽是釀酒的佳節，吾祖父一年之間只釀酒兩次，一是農曆二月的「桃花酒」，二是農曆九月的「重陽酒」），那種因無人對酌而產生的苦悶心情不是躍然紙上了嗎！《停雲》一詩歷來被後人所青睞，乃是因為其內容純然出自對親友思念的一片摯情，而且其句式也全是四言，頗具中國《詩經》中「國風」的遺韻。而四章詩又反復詠歎，那種「搔首延佇」的焦灼期待、「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的企盼心情，以及「閒飲東窗」時「抱恨如何」之悵惘，哪一句不是發自肺腑？惟其反復唱歎，那種有約不來，春雨阻隔的悵憾，便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時運》一詩應當作於暮春。其小序曰：「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一本作『影』）獨游，欣慨交心。」<sup>②</sup>我們一讀這個小序，就會很自然地想起孔子當年與其弟子們的暮春之游，謹將《論語》的這段話鈔錄如次：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27頁～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之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sup>①</sup>

在《論語》中，獨有《侍坐章》與《季氏將伐顓臾章》的文義至為豐滿，而站在寫景抒情之工細者，也許僅此《侍坐章》為善了。從曾點答孔子的莫春之游來看，我們似乎從中看到了人生最得意最忘機的那樣美妙的一瞬。但值得注意的是曾點的暮春之游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共游之樂，而在淵明這裏，雖然良辰美景依舊，但是他祇能「獨游」，這無疑要使他的春游平添了許多悵憾。下面，我們謹將《時運》的全詩錄出。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乎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sup>②</sup>

寒暑更替，轉瞬又是暮春。在這和暖的日子裏，詩人著上春服，漫步東郊踏青。此時，青山經幾番春雨洗滌，顯得格外清脆柔嫩，但有薄薄的雲靄在山頂飄浮；廣袤的天宇裏也有輕薄的雲氣在漂流。暖風從南面輕輕地拂過游人的臉面，將新生的莊稼吹得輕輕地晃蕩。那一望無涯的平湖，是那樣地清澈明澄；那湖畔的遠景，令人欣慰，也令人神往。人們常說：人生祇要稱心就容易滿足了；此時舉觴助興，自然是會陶然可樂的。詩人遐觀湖畔的中流，便很自然地想起了春秋時曾點回答孔子的那種暮春之游的情景：當時學業已經完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他們一起在沂水裏游泳，然後到舞雩臺上吹吹春風，

<sup>①</sup> 參見《論語譯註》127頁，古籍出版社（北京）1958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29頁～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一路上踏著歌歸來。詩人是多麼地向往古代那種淳美的生活，乃至日夜企盼，可惜時代變遷了，那種淳美的古風已不復可尋了。每天早晚，詩人起居在草廬裏。那草廬邊栽種的芍藥已經生長成行列了，不久也將吐露出那絢紅的奇葩；草廬旁的樹木成林，翠竹蔭天蔽地……詩人將素琴架在床上彈奏，聊有半壺濁酒相酌，實在也是人生難得的樂趣了。可惜黃帝堯舜時的古風已不可實現了，這對於詩人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憾事。

《榮木》應當作於元興三年的初夏。詩中的小序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sup>①</sup>從詩序來看，淵明此詩的寫作，的確有些觸景生情，那種「日月忽其不淹兮，恐年歲之不吾與」<sup>②</sup>的情感是觸目可得的。這年，淵明正好四十歲，古人曰：「四十而不惑」，他在人生已經走完了大半里程的時候，回首平生：幼年聞道，至今一事無成，焉能不感傷！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不可能使淵明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他是決不情願在那個污濁的官場中廝混下去的，但又由於家境的困窘，迫使他不得已出仕（事實上，他在不久後就做了劉裕的參軍），面對這種種心靈的衝突與心智的分裂，他焉能不百端交集、感慨萬千呢？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能夠成爲一代偉大文學家者，其命運無不是坎坷多艱的，從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見《太史公自序》）、杜甫的「文章憎命達」（《天末懷李白》）、歐陽修的「窮而後工」（《梅聖俞詩集序》）等論述來看，古今信然如此，由來尚矣。命運若不如此發落這些人，恐怕他們也不可能成爲文學家了。《榮木》同樣是由四首四言詩組成，第一首是詩人面對茂盛的木槿，看到其花朝開而夕謝，詩人便由此而引發了無限的聯想，他不勝感慨「人生若寄，憔悴有時」<sup>③</sup>。第二首在繼續詠嘆木槿朝開夕謝的基礎上，詩人由此而自勉曰：「貞脆由人，禍福無門」（謂貞堅與懦弱在於自身，禍福也是自己所造的）<sup>④</sup>，而祇有「道」纔可以

① 參見《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離騷》，《楚辭補註》14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依從，祇有「善」纔可以履踐。第三首乃詩人回首自己的人生歷程，從而對其一生志業的無成表示了深深的內疚。第四首稱引孔子的遺訓：「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sup>①</sup>，並由此而策勵自己奮起前進——「千里雖遙，孰敢不至」<sup>②</sup>。也許，淵明此後不久的出仕劉裕，便是受了這種思想的支配，至於其傳記中的「三徑之資說」，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也未見得完全如此。因為，淵明是一個詩人，他是一個品性單純而又悟性極高的詩人<sup>③</sup>，而絕不是那種老謀深算的商人。儘管東晉時士大夫的出仕往往與尋求歸隱的生活資源有關，但未見得淵明的出仕也是全然如此。

《連雨獨飲》一詩應當也是作於元興三年，我們從詩中的「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sup>④</sup>兩句，就可以推斷是作於此年。本詩是淵明鍼對故老贈酒而作，在淵明看來，宇宙的自然規律是不可逆轉的，長生之道是不可信的，因為像赤松子、王子喬那些傳說中的僊人，至今畢竟無人發現其蹤跡了，又何必去相信成僊成道的那一套騙人的說法呢！但淵明認為飲酒可以使人暫時地忘我忘情（試觴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這倒不假，他由此而主張聽任自然規律，聽任自然之道而忘情物我，且詩人素來就認為如此，至此已經四十年未曾改變。人們的外在形骸日久天長自然會消失，但作為人的精神，尤其是某種閃光的思想，它應當是長存世間的。《連雨獨飲》與我們在上文中所介紹的某些內涵存在相似的地方，尤其是不相信神僊道術，乃是淵明一貫的思想主張。至於此詩究竟作於元興三年的哪一個季節，則恐怕難以確定。但此詩大抵應當作於淵明未出仕之前，加上「連雨」這個氣候特點，似乎也應當與春季相關，宜與《停雲》視為互相表裏。

**出仕劉裕及此期創作** 《停雲》、《時運》、《榮木》三首分別作於元興三年的仲春、暮春與初夏，那麼，淵明的出任劉裕的鎮軍將軍究

① 參見《論語·子罕》，《十三經註疏》2491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蕭統在《陶淵明傳》裏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參見《陶淵明集》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這應當是與淵明的性格相符合的。

④ 參見《陶淵明集》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竟又在哪一個季節呢？若據該年的史實，當年四月（公曆五月），劉裕的部將何無忌等曾率領軍隊在淵明的家鄉湓口大破桓玄軍，此時天下多事，劉裕新起，也正是用人之時，加上劉裕初入建康時整肅綱紀，確實還像有所作為的樣子，淵明也難免不對劉裕產生某些幻想，因而他出任了劉裕的參軍。這是淵明的第三次出仕，在這一次出仕時他先後做了鎮軍參軍、建威參軍與彭澤令，但在第二年（義熙元年）八月做彭澤令之前，似乎還應當有一段時間在賦閑。總計他這次的出仕前後時間，也許最多在一年左右，且彭澤歸來之後，淵明就終身不仕了。

在陶集中，收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應當是描寫他的第三次出仕的，茲錄如下。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一本作「婉」）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sup>①</sup>

通讀此詩，我們對於淵明的第三次出仕前的情懷及其出仕的動機，自然會十分清楚了。淵明的青年時期寄情於仕宦之外，以琴書為樂，他的生活雖然困窘，但他能安貧樂道。而淵明此次的出仕鎮軍參軍，絕不全是為了「三徑之資」，倘若如此，他就不會「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了。通過「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兩句，可見他的出仕雖然不無委曲之意，而淵明之所以覺得「委曲」，也全在於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sup>②</sup>的本性所決定的。他不似那些在政壇上老奸巨滑的職業官僚，他不會逢迎、更不願意扭曲自己的人格去從事，因而一旦進入了仕途，他就不免感到種種的不自在，種種的難以適應，這對於他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對此，我們毋寧可以說上帝是專門派淵明到這個人世來作詩的，而絕不是派他到這個世間來作官的。在唐代的李白也是如此，三年的供奉翰林就把他給做苦了，也把他做跑了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歸園田居》之一，《陶淵明集》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 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

(他三年後就辭官而歸了)。在此詩中，我們見淵明剛好出仕就在打算如何歸隱(他是「暫與園田疏」)，就可以逆知他此番出仕必不久長。何況他的當官差還要奔波千里行役，此去的曲阿(今江蘇丹陽縣)，就離淵明的家鄉尋陽有千里之遙，異鄉的行役自然易於觸發詩人的鄉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兩句，就將詩人對於大自然中的飛鳥與游魚的自由生活的羨慕之情流露了出來，也自然可以使我們去聯想到那官場的種種束縛人們身心的不愉快來。由於淵明是那樣地酷愛自由，他的這個初衷又始終不會改變，因而他的出仕也祇是暫且聽任自然而屈從，而他終歸是要返回舊廬的。

細讀此詩，我們似乎還可以發現其中隱約地流露了淵明此番出仕的某種不得已的緣由。他的出仕是苟且委曲相從的，因而他非但身在魏闕，心存江湖，而且哪怕他暫且的作官，也祇是一種消極的應付(聊且憑化遠)，而他實際上是在時時伺機辭官歸隱。顯然，元興三年發生在淵明家鄉尋陽的那場討伐桓玄的戰爭，自然會破壞淵明草廬裏的恬適生活，他的出仕雖然含有對劉裕存在幻想的因素，但也應當還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其中。試想：淵明在隆安四年(400年)左右曾經作過桓玄的官，此時劉裕興義軍討伐桓玄的篡位，淵明若是不出仕，豈不說明了他還在心念桓玄的舊恩麼！惟其如此，這不大心甘情願的官差，淵明也祇能消極地去應付了，他因此也在時時伺機辭歸。這大概就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的寫作意圖所在，也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的主旨所在。

義熙元年(405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於馬頭；桓振以帝(晉安帝)屯於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桓楷於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規舟。」<sup>①</sup>於是，晉安帝下詔，極力表彰劉裕等人的「忠武英斷」，大赦天下，將405年改元為「義熙」。這年三月，晉安帝到達江陵，「百官詣闕請罪」；四月，劉裕在被加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軍事的官職下，領兵去鎮守京口(鎮江)這個冲要之地；是

<sup>①</sup>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7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後，桓玄餘黨逐漸地被剿滅，天下又出現了短暫的相對安寧。

在義熙元年，淵明改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至於淵明具體是何時從劉裕的部下改任劉敬宣的部下的，則尚無歷史的記載，仍須進行考證。按照《宋書》的說法，在元興三年（404年），劉敬宣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淵明因為這裏離家比較近，因而就便做了建威將軍的參軍。但淵明的這個建威參軍，確實也只做到了義熙元年的三月左右，他直到該年仲秋的出任彭澤令，其間足有五個月的時間是在家賦閑的。陶集中《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詩，就是作於劉敬宣「自表解職」之時，而淵明的奉表使都，或許也就是為劉敬宣去送這個「解職表」，敬宣既去，淵明也就自然罷歸了。茲將《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詩鈔錄如下：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sup>①</sup>

錢溪就是今天安徽池州的梅根港，淵明早在桓玄部下作官與做鎮軍參軍時，就曾從這裏經過過，祇是沒有登岸一遊而已。對於這裏的山川形勝，淵明每次所獲，都祇是從船艙裏掠目所見的那樣一種景色。他此番奉使從都還，因為能夠有機會登岸一遊，自然也是不勝怡情悅性的。詩人懷著積久的願望，捨舟登岸，在這裏勾留了一些日子。他每天早晚欣賞這一帶的山川，總覺得這些年來雖然政治風雲變化莫測，但這裏卻總是事事如昔，毫無任何改變似的。那春天的牛毛絲雨不止是洗滌了高處林木的污垢，而且也霧溉了新春的樹木；而春鳥們則拍擊著矯勁的翅膀，敏捷地在雲際高飛。《周易》說：「雲行雨施，品物流行」<sup>②</sup>，在這裏不但風雨得宜，萬物咸亨，而且古朴的正義民風也尚無半點改變。而詩人作為一介使者，只不過是在勉強完成這個官差而已，這對於淵明來說，雖然身不由己，行動受到了制約，而他疇昔所抱的那高潔的情操，是絕不會有絲毫的改變的。哪怕是在白天，詩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周易·乾卦象傳》，《十三經註疏》14頁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

人也在夢想回到他的園田居，他哪裏耐得住與他故廬這麼久的分別呢！他的最終意願是早日乘舟歸隱，甘守清貧的生活，自然也祇有在嚴霜之下纔可以見出松柏的高操來。

《歸去來兮辭》——與官場的決裂書 淵明在 405 年三月使都歸來之後，應當是隱居在園田居的。至於淵明何以看不慣也無法習慣官場中的生活，則顯然與他酷愛自由、聽任自然的本懷有關。自然，其間也不無仕途險惡的因素，詩中的「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兩句，就非常明顯地道出了他對官差的種種怨恨，自然也昭示了其中的不自由與官場人際間的凶險性。淵明歸隱後不久，在當年作《歸去來兮辭》，在這篇作品中，淵明告訴了我們：他做彭澤令這個小官的起迄時間是「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sup>①</sup>，那麼，我們假定淵明是在義熙元年四月歸隱的話，則到他出仕彭澤令，其間仍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園田居。

但令人費解的是淵明從 404 年到 405 年的出仕，前後雖然有些斷續，但也將近一年，他為何家境一下子就那樣快地窮困了呢？雖然這與淵明不會經紀家財有關，或者還與他為官清廉有關，但也斷不至於貧窮得那麼快呀？也許是淵明的官俸不多而又家口甚多，他在當年十一月又被迫出仕彭澤令了。對此，淵明在《歸去來兮辭》的《序言》裏說：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穉盈室，緡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11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sup>①</sup>

如果按照淵明這裏的交代，則他自建威參軍使都歸來，還有一個「見用於小邑」的枝節，僅僅因為當時「風波未靜」，淵明「心憚遠役」的緣故，所以未去赴任。至於推薦者，在淵明的介紹中，有「家叔以余貧苦」之句，這個「家叔」顯然就是淵明在《孟府君傳》中所說的「淵明從父太常夔」<sup>②</sup>了。淵明是那樣地厭惡官場，但他卻又不得已要去作官，其原因乃在於淵明家當時「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穉盈室，餼無儲粟」的緣故。今案：義熙元年，淵明年四十一，其長子陶儼年十二，陶俟十歲，陶份與陶佚九歲，陶佟七歲，至於家裏的女兒及其他家人丁就遑論了。像淵明這樣對家人和藹至親的人，面對一家老小的嗷嗷待哺，縱使作官再有違心的煎熬，他也斷不至於使家人餓死的，且根據淵明這個序言的介紹，他的出仕彭澤令純然是因為家境的困窘。其實，還有一句「於時風波未靜」，似乎也給我們提供了某些線索，由於當年三月，討伐桓玄的戰爭曾多次發生在淵明的家鄉尋陽，這自然會給那里人民的生命財產會帶來嚴重的損失，給那裏的農業生產也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破壞，甚至還會致使當地產生饑荒。查《晉書·安帝紀》，義熙元年五月，有益州刺史司馬軌謀反，還有桓玄的部下桓亮、苻宏、刁預在湘州為寇<sup>③</sup>，至於局部的戰爭，也就無法具體去統計了，這能說當時天下太平了嗎？由於政局未穩，加之兵之後必然帶來饑荒，因而使得淵明儘管出仕了也難免家境貧窘。也由於淵明待家人是那樣地親善，他自然擔心到很遠的外地任官職會無法照顧到家人了。

如果說家境困窘是淵明此次出仕的直接原因，那麼「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也許也成了淵明再度出仕的次要原因了。從《五柳先生傳》可以知道，淵明「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他也許為了滿足這一生活嗜好，只得委曲從事了。在蕭統的《陶淵明傳》及

---

① 參見《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110頁～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晉書》卷十25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宋書》、《晉書》等記載中，還附會有這樣一個故事：那就是淵明到任彭澤之後，「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足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sup>①</sup>這個故事是所有陶傳必載的了，但祇要我們稍與《歸去來兮辭序》一對照，就會發現其破綻來：淵明的到任彭澤分明是在仲秋之月（即農曆八月），此時正當秋收；淵明辭去彭澤令，時在十一月（即農曆十二月），時當冬令，何來的「種秫」與「種秬」之爭？關於淵明的「性嗜酒」，那是淵明在自傳性文字《五柳先生傳》裏已經有了記載的，而好事者杜撰這個故事出來，也確實沒有考慮到時間上面的漏洞，故不堪我們多破。

誠然，淵明縱然再度出仕了彭澤，但他仍然覺得是很違心的。如我們上文所說，淵明的性格與品性似乎都不適合於作官，尤其是不適合在東晉末葉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裏作官。淵明也深知自己不是一塊作官的料，他很坦白地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因而他在官場裏便不無「飢凍雖切，違己交病」的發自內心的隱慟。而他當時之所以沒有立即辭官的原因，也僅僅在於「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他是在指望來年能夠從公田裏收穫一次，略有「餅儲」，就可以棄官歸家了。致使淵明這次彭澤令只做了八十天的直接原因是程氏妹的猝然去世，程氏妹與淵明之間的兄妹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作了介紹，他們兄妹之間可以說是情同手足的。加之淵明的個性是非常重感情的，他想起了程氏妹此時的家境，他還能在彭澤的縣衙裏坐得下去嗎？你看：「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sup>②</sup>祇要想起這個情景，淵明就不可能不摘下彭澤令的烏紗帽，而急忙跑到武昌去奔喪，以料理程氏妹的後事。由於個人的稟性所決定，加以家族中突發性事件的影響，使淵明這次的彭澤令僅僅做了八十天，而且他此後便終身不再出仕了。

淵明此次從彭澤辭歸，料理程氏妹的喪事確實是其直接的原因。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載他赴任彭澤時，「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

①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祭程氏妹文》，《陶淵明集》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給其子」<sup>①</sup>，在《歸去來兮辭序》中也說「猶望一稔」，是程氏妹的突然去世這個偶然的因素，加速了淵明結束他的仕宦生涯。淵明此次辭歸，寫下了著名的《歸去來兮辭》，這篇作品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茲將通篇鈔錄如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能（一本無「能」字）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sup>②</sup>

如果說淵明的自彭澤歸來，是意味著他對官場已經徹底地看破，也意味著他從此與官場永遠脫離的話，則《歸去來兮辭》一文也就意味著淵明在文學創作上，其審美理想與藝術風格都已經完全成熟了。《歸去來兮辭》是一種近乎騷體的文學樣式，其正文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了詩人迫切歸來的心情及對田園生活的愜意，第二部分描寫歸來以後的生活方式及田園之樂，第三部分是對通篇的總結，表達了淵明不慕富貴、不求僊道、任運自然的人生理想。

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陶淵明的性格與資質只適合於做詩，而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絕不適合於作官。在中國的官場上廝混，就必須具備那種弄虛作假、諛上欺下的品性，一句話，就是要利用一切虛偽的手段來掩飾自己，要能做出一切違背道德良心的事情，這樣纔可以混得下去。官場之此道，由來尚矣，且似乎在而今的專制制度裏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但作詩則不然，它要求詩人去掉一切功力觀念，去掉一切矯飾的偽裝，用一顆無垢染的淳淨的心來觀照世間的一切事物，這樣，世間萬物的本自具備的「美」的靈氣纔會顯現出來。也就因為淵明「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具備了詩人的才氣，因而他勢必也自然而然地具備了與官場相抵觸的情緒，同時也注定了他祇有棄官歸隱的唯一人生選擇。惟其如此，淵明一開篇就道出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何以要歸隱呢？那就是因為「心為形役」，即人的主體理念、主體精神卻成了人這個軀殼（客體）的奴隸，而主體的人格也在被動地給這個軀殼當差。因此，淵明悟到了他以往的出仕確實是在違心地從事，而且也無法挽回了，但那將來的日子還是可以迎頭趕上的。在這裏，淵明引用了《論語·微子》中的典故<sup>①</sup>，顯然，淵明對接輿的觀點是贊同的，這篇作品事實上也是他與政壇最終徹底分手的「宣言書」。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淵明過去總是想有所作為，他也許還具有建功立業以光耀陶氏宗族的思想，而在他現在看來，那些思想顯然是非常錯誤的，因此他認定了棄官歸隱的這條道路，從而使他那被軀殼奴役的心靈得到徹底自由。此時，詩人回到自己田園的心情是何等地迫切呀！你看：他在連夜趕路（宵逝），任那輕舟迅疾地在水上飄行，任夜風吹拂他的衣裳，他快到家門時天還沒有亮，於是便問路於行人。「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數句，便將淵明歸來後的歡欣與愜意之感作了生動的勾勒。詩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廬，他舉起酒杯自酌，靜觀那庭院裏大樹上的枝柯而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有時倚靠在南窗邊吟詩抒懷，以寄托他那高傲的情志；他有時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狹窄的居室，也覺得

---

<sup>①</sup> 《論語·微子》說：「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參見《論語譯註》200頁，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非常地相安。詩人常在自己的園子裏散步，乃至日久而成趣；草廬雖然設有衡門，卻常常是關閉的，這也說明了詩人此後決意不再與世務交往了。詩人也可以常常拄杖在野外遛達、歇息，他時時舉目遠望這塊自由的天地：那白雲從山洞裏悠然地飄了出來，雲朵在任運東西，多麼自由自在；而那些舉翮高翔的飛鳥，也因為勞倦而往回飛了。這簡直是一幅清新美妙的圖畫，也正因為其「無心」，故爾滲透在這幅圖畫中的審美理念則是空靈的、不可湊泊的，那是一種如鹽溶水的妙趣<sup>①</sup>，是一種剔透玲瓏的美妙境界。

在第二部分裏，詩人首先提出的就是謝絕交遊。因為，在這近十三年中，淵明雖然不是一直在官場上，但他或隱或仕，多少結識了一些官場上的人物，而此時淵明已經決意隱居，他自然應當謝絕這些人的交往。事實上，在淵明彭澤歸來不久，東晉王朝就準備將淵明「徵著作郎」<sup>②</sup>，祇是淵明沒有赴任而已。這就是說，淵明已經厭棄官場以極，他打算徹底地擺脫這個污濁的處所，長期回到他所喜歡的田園這片自由的天地之中。他喜歡與親友在一起聊天，靜聽那些款款情真的話語；他喜歡在自己的屋子裏彈琴讀書，以排遣世間的鬱悶。倘若當地的農人告訴他春種的季節到了，他就準備到西疇去從事農業勞動；若在農閑時，詩人常常到深邃的山壑裏去遊覽，他為此而不惜翻越崎嶇的山丘。此時，樹木正欣欣向榮地生長，泉水也在涓涓地流淌，詩人贊歎萬物的遇時，也在感歎他自身的行將年邁。

第三部分是對通篇的總結。詩人認為：有限的人生（即有形的軀殼）寄托在這宇宙間畢竟沒有多久，何不放下追求功名事業之心，聽任自然（大化）規律而隨緣去留，而要終日遑遑不停地去追求什麼呢？在詩人看來，人生的富貴並非是他的意願，道家所宣揚的那種僂鄉也是不可期待的。足見，詩人此時已經不似青年期那樣地滿懷抱負，想

---

① 明人王驥德在《曲律·論用事》中說：「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用事，失之枯寂。……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參見《中國古代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冊 161 頁，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2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幹一番事業了；同時他也不像當時因社會的動蕩而跑去求僊求道的那些人，他就這樣實在地、任運地對待自己的人生。可以想見，在東晉末葉那個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下，必將致使社會風氣日下，當時士人的趨鶩名利、恬不知恥的狀況，我們在上文中提到了。但宦海沉浮，亂紛紛你方唱罷他登場，不少宦海中的失落者難免不終日惶恐不安；加之人生短暫，那些宦海失落的士子到神僊道法中去尋找寄托，這也應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們在上文中提到了王凝之，他就是一個五斗目道徒，還有劉遺民，他此時早已隱居廬山了，至於與淵明過從的周續之、張野等人，他們雖然沒有遁入神僊道法之中而參與了蓮社，這自然是他們的高明之處。面對隱退的士子的種種趨向，淵明選擇了他自己的道路，那就是走聽任自然、委運去留之路。因為淵明的性格決定了他必須走這條路：他喜歡聽親友款款的情話，他喜歡在虛室中彈琴看書，他喜歡到田園裏漫步，他喜歡到深山裏休閒……他有時面對良辰美景，寧可一人盡情地去品味；若果遇上了農忙，他寧肯放下拄杖去地裏除草中耕；他有時登上東面的湖畔高地，在那裏放聲歌唱；他有時面對清澈的流泉，禁不住要縱情賦詩。他就這樣隨心所欲地駕馭著這個大化之舟，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對於天數所賜給他的命運樂以處之，認為沒有什麼是值得懷疑的。這就是淵明的生活方式，也是淵明的人生價值取向，更是淵明的審美理想的指向。淵明沒有在宗教信仰的驅遣下對人生的終極目標抱以執著地追求，他也不像那些蒼蠅趨臭的仕子們那樣在官場上傾軋，他根本就沒有給自己的人生確定一個特定的目標，而祇是一切聽任自然、隨心所欲，從而不使他自己的這一審美理想與人生價值取向有所改變。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淵明並沒有走上深山修習禪定的道路，他也沒有對任何宗教產生信仰，而他的詩文創作卻不期進入了禪機的化境。在這裏，我想重申，此篇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等景物描寫，何嘗又不是濃富禪趣的妙筆呢！這主要是在於淵明的「無心」，他無心仕宦、無心功利、也無心於生命的久暫，而這種「無心」之境界又與禪家的「無我」之境是那樣地冥合，故爾異曲同工。顯然，這裏的「無心」，與《飲

酒》中的「心遠」、「遠我」等境界，也應當是無二無別、相得益彰的。清人吳調侯、吳楚材在《古文觀止》卷七中評論曰：「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東晉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之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sup>①</sup>若說淵明的「深於道」，這個「道」只可能是他個人的創造與專利，在任何宗教經典中恐怕都是找不到的，那就是任運自然、隨心所欲。

淵明從太元十八年的出仕，到義熙元年十一月的歸隱，前後共歷時十二、三年。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儘管淵明出仕的時間絕不比歸隱的時間長，但他畢竟對於仕途、對於官場、對於東晉末葉那個風雨飄搖的政壇，都有了深刻的瞭解。淵明的徹底結束仕宦生涯，可以視為他人生的第二個里程碑，這一時期不但是淵明清楚地認識政壇的階段，同時也是淵明的人生理想、審美尚好與藝術創作風格形成的階段。此期創作中的組詩《飲酒》與他徹底歸隱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也可以說是淵明一生創作中的兩塊豐碑，也是東晉一代、抑或是中國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

<sup>①</sup> 參見《古文觀止》下冊 290 頁，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 三、陶淵明的歸隱期

如果說陶淵明在出仕時，其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話，則他自彭澤歸來以後，其思想成分中就頗為吸納了老莊等思想，加上他隱居的逸致，進一步將他清新淡遠的審美情趣推向了極致。據學界的考證，淵明在隱居期間，一共三次遷居：淵明自義熙二年（406年）歸隱後就隱居在園田居（也許就在上京），至義熙七年（411年）纔移居南里（南村），而在義熙十三年（417年）復遷居到了上京，此後淵明直至終老未曾遷居了<sup>①</sup>。我們根據淵明的居處情況，姑且將淵明的隱居生活分為前期（406年~410年）、中期（411年~416年）與後期（417年~420年）來介紹，這樣似乎要層次清楚一些。

#### （一）陶淵明隱居生活的前期

《歸園田居》與《飛鳥》 義熙二年（406年），淵明是年四十二，這是他從彭澤歸隱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裏，車騎將軍劉裕被封為豫樟郡公、劉毅南被封為南平郡公、何無忌被封為安城郡公，劉裕原來的部將幾乎都有封賞，他們牢牢地控制了東晉王朝的政權<sup>②</sup>。淵明既已決意隱居，他自然也不會過多的去過問這些政治了，在這一年裏，淵明在他向往以久的園田居躬耕，創作了著名的《歸園田居》五首，同時還寫下了四言組詩《歸鳥》。《歸園田居》由五首五言組詩組成。我們從第一首中的「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sup>③</sup>推算：淵明二十九歲出仕，至他四十一歲那年冬天辭歸，其間已經是有十二年、十三個年頭了，而他寫作此詩時，卻只好是在第十三年。因為這個組詩寫得太精美了，我們擬逐一作出簡介。《歸園田居》之一全詩如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

① 參見《陶淵明集》中《移居》、《還舊居》等詩。

②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5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但各本作「一去三十年」，王瑤先生從宋吳仁傑《年譜》考訂校改。

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sup>①</sup>

本詩的開頭四句，述寫了詩人不習慣仕宦卻又偏偏要在仕途上勾留十三年的苦悶。在這裏，「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兩句，頗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陶淵明不適合於作官是出於他的秉性，到這裏已經找到了其內在的證據。其實，陶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也說明了他「少而貧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sup>②</sup>的性格特點，這也無疑成了這一論斷的另一個有力的佐證。由於淵明的品性高潔，他不宜在污濁的官場裏廝混，故爾官場在詩人眼裏被看成是「塵網」，他同時也認為自己的出仕是人生中的一大錯誤。官場的污濁與黑暗，與他故園（園田居）的清淳與優美，二者之間自然形成了鮮美的對照，也倍增了詩人對故園的眷戀之情。

在這裏，詩人巧妙地採用了類比的手法，以「羈鳥」與「池魚」的思舊來襯托詩人思念故園的那片摯情。與其在官場那個鉤心鬥角的處所裏過得極其痛苦，還不如堅守素志回到田園，從事開荒耕種痛快得多。接著詩人交代了他故園的大體規模與景致：「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在當年顯然不是大戶人家了；但「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畢竟依稀農家村舍，樸質清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兩句，寫景狀物，體貼細膩，宛然一幅恬適的村居圖畫，唐人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兩句，無疑是從淵明此詩中得到了某種啟發而吟成的。我們再看「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四句，它與上面的兩句組成了一幅完美的藝術畫卷：那種老子所至為讚賞的「民至老死不相往來」<sup>③</sup>的龐樸的上古社會模式，

① 參見《陶淵明集》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王弼註《老子》第八十章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參見《二十二子》8頁下～9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似乎通過淵明的這一描寫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且淵明所理想的這種社會模式，在《桃花源詩序》裏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sup>①</sup>的描寫中，也足以與此交相輝映了，可見淵明對於這種社會模式的追求是一貫的。淵明所喜歡的生活環境是一種具有「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的特質的環境。同時，「好靜」也是淵明的秉性，他還曾對他的兒子們說自己「少學琴書，偶愛閒靜」<sup>②</sup>，惟其「好靜」，則自然可以靜觀身邊的景物，那些在常人那裏並不起眼的景致，往往經詩人的大筆一點化，便生機勃勃、大有破壁而飛的氣象了。再則，「靜觀」之與「老莊」，之與東晉時期所逐漸形成的禪觀，自然也應當是耦合的。「虛室」二字是陶詩中常用的詞彙，其實，「虛室」除了少有閑雜人員涉足的外部條件以外，還必須取決於審美主體心情的恬適，也祇有主體以虛靜的心態來觀照其居室，纔會產生「人」與「物」（在禪家叫做「我」與「法」）俱空的境界。如果將淵明園田居的這種環境與他往日所在的遑遑傾軋的官場生活一加比照，則對於「好靜」、酷愛自由的淵明來說，他從官場的歸隱自然是如同逃脫了樊籠的「羈鳥」，他此時已經回歸到了本來屬於他的那片自由的天地裏。

《歸園田居》之二與之三主要描寫了淵明躬耕的生活，茲一併鈔錄如次。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一本作「墟裏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以長，我土日以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一本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③

這兩首詩都與淵明的躬耕生活直接相關，它體現了淵明的所不同一般文人之處：那就是淵明的耕種絕不是裝模作樣的干祿方式，而是要通過躬耕作爲解決他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手段。其中第二首的前四句，描

① 參見《陶淵明集》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與子儼等疏》，《陶淵明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27頁～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寫了詩人草廬的恬靜，由於「窮巷寡輪鞅」，因而詩人也大可以「白日掩荆扉」了。而「虛室絕塵想」一句，其中妙趣幽深，似宜細心體味：本來就是「虛室」，自然沒有任何外來的干擾了，惟其如此，也更加適合於割斷室中人對塵世的妄想了。第四句以後便是描寫歸隱以後的社會交往了，從「披草共來往」與「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來看，淵明所交往的對象，自然不外乎是鄰近的農人了。在淵明這裏，斷絕一切與官場的交往，也不涉及任何政治是非，僅僅祇是尋常的農民家話，自然不無逃避現實的一面；但若站在貼近生活、貼近自然的角度的角度看，這無疑也是至為紮實的工夫了。也正因為如此，淵明此時似乎也具備了老農老圃式的情感：他在期望著地裏桑麻的茁壯成長，並在規畫著墾殖面積的擴展，他所擔心的也絕不是官場上的名利陟降，而僅僅限於使他的農作物如何免遭自然災害，如何獲得一個好收成。唐人孟襄陽也曾隱居，他在《過故人莊》中的「開軒面場圃，把舊話桑麻」兩句，似乎也濡染了陶淵明詩中的這種氣息。若與淵明的這兩首詩相比，孟詩雖佳，但他對於桑麻等農作畢竟缺少親身的經歷，而僅僅祇是藉桑麻以助高雅之興；而在淵明這裏，他有付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因而他也在衷心地期待著收穫。也正因為主體的勞動傾注於客體農作物之上，故爾客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尤為親近、尤為和諧了。

第三首全是對耕種勞動的描寫，像這種詩，在後代詩人那裏似乎是很難以找到的。誠然，淵明是詩人，他的墾荒種地也自然不如老農，因而在他所耕種的地裏出現了「草盛豆苗稀」的情況，這也應當是事實，而並非如同楊惲「蕪穢不治」<sup>①</sup>式地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淵明為瞭解決人生的第一需要，他披星戴月，勤奮地耕作，力圖獲得一個好收成。詩中的「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兩句，確實是農家生活的真實寫照。筆者疇昔務農，晨興耕作、或夜作歸來，田間（或山間）小道上野草很茂盛，那草葉上面掛著的露珠在月光下顯得晶瑩可愛，

---

<sup>①</sup> 楊惲在《報孫會宗書》中載田家歲時伏臘，飲酒作歌，其歌中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之句。參見《文選》卷四十一 528 頁下，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但褲腿（在淵明為「裳」）卻常被露水滲濕，不勝寒涼。蕭統《陶淵明傳》說淵明歸隱後躬耕自資，「遂抱羸疾」，顏延之雖然是淵明晚年的朋友，他在《陶征士誄》中也說淵明「年在中身，疾維疢疾」，「疢疾」就是瘡疾，而「羸疾」則要寬泛一些，大抵後來淵明的上廬山乘「乘輿」（相當於今天的「滑竿」），殆其中也不無風濕等疾病纏身的因素。而這些在淵明看來，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事，他祇要求「願無違」便於心足矣。這也就是說，人生在生理上面的痛苦相對於心理方面的痛苦來說，似乎祇有心理的痛苦纔是真正的痛苦。加之淵明素來就是一個注重主體人格、注重人的本體尊嚴的詩人，因而他的歸田躬耕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理智性的選擇。

第四首描寫了淵明攜子侄輩出游丘隴間，見到昔日村居變成廢墟的情景，由是不勝感慨而作此詩。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sup>①</sup>

這是一首純然採用白描手法寫成的敘事詩，詩人大概由於農忙而很久沒有到林野中去遊覽了，他這纔發心攜子侄輩一同到山林中散步。但他此番的所見，卻遇上了一個變成了廢墟的村居：在這裏有昔日耕種的土地、有汲水的井與炊爨的灶、還有繞宅的桑竹等林木，儼然一處村居，而今主人安在？通過詢問樵夫纔知道，這戶人家已經舉家歿亡了！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不難想見東晉末葉發生在潯陽一帶的戰爭，給那裏的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像這樣舉家亡歿的情景，難道還不夠令人觸目驚心的了嗎？儘管淵明的詩中用筆委婉隱晦，但我們仍然不難發現出這樣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對此，詩人不免感慨萬端：信如人言，三十年的時間可以使朝市的面貌改變！而世間的風雲變幻莫測、人生的無常，便更加容易觸發起詩人的深思了：但陶淵明對於無常的人生只是認為是「幻化」而成，即並非真實的存在；而他並沒有去追

---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溯「幻化」的本原（或緣起性空、或業感緣起），而僅僅祇是感慨世間人生虛無、世間萬事皆空。從這首詩來看，我們不能說淵明沒有接觸老莊思想、尤其是接受佛教禪宗思想的某些影響，而他卻始終沒有對任何宗教產生信仰，他祇是對當下的現象產生感慨罷了。也許這樣的資質，就是詩人的資質，它所需要的是對當下的那一剎那具有直覺的反映，將當下的那一剎那的感覺如是地抒寫出來。這種和盤托出式的思維方式是詩人特定的思維模式，而不是哲學家或思想家的思維模式，惟其如此，淵明適合於做詩人同時也具備了一代詩人的非凡才智，而他確實也不可能成為哲學家或思想家，因而那種採用哲學家或思想家的思維模式來考察淵明詩文的做法委實乎不可取。

第五首的寫作時間似乎與第四首相近，它描寫了詩人在農閒時因「崎嶇經丘」而產生感慨後而連夜豪飲的情景。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sup>①</sup>

詩人大抵在此番遊丘隴歸來之後，自然也會對人生的短暫與無常產生深深的感慨，因而這晚的與近鄰對飲至天明，也正好是詩人對人生苦短、須秉燭夜遊的理念的實施。在詩中，「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兩句，雖然不無影射《孟子》與《楚辭·漁父》之意<sup>②</sup>，但淵明畢竟是放懷政治的，因為他已經決意隱居了。淵明面對那個動蕩不安的政局與無常的人生，只得姑且及時行樂，酣飲達旦了。詩文中的「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灼然農家生活氣息，疇昔吾奉命務農時，因家貧無以致照明煤油，只好採用竹片、麻梗代替燈具照明，當時自是清苦，而現在反思，倒是不乏樸拙的淳美。「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28頁～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楚辭·漁父》載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因而規勸他，但屈原沒有採納。漁父便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參見《楚辭補註》298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又《孟子·離婁上》也載有《滄浪歌》，並稱引孔子的話說：「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參見《十三經註疏》2719頁下，中華書局190年版）

旭」兩句，將歡飲達旦的場面掠空交代，我們自然也不難想見詩人當時與鄰人對飲的酣暢情景了。

《歸園田居》五首，無論是寫景狀物，抑或是敘述人情方面，都委曲盡意，實在堪稱是隱逸詩篇中的壓卷之作了。對此，清人沉德潛在《說詩碎語》中也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①朱光潛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作了發揮，他認為：

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祇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中各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忘於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與氣韻。這種物我回響的交流，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映增輝。所以無論是微雲孤鳥，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手到成文，觸目成趣。淵明人品高妙就在他有這樣深廣的同情；他沒有由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風氣由陶、謝開始，後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揚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在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涵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②

對於朱先生的評價，筆者是非常贊同的。在這裏，我想歸納地來說明一下，淵明的寫景狀物之所以逼真如畫、敘述人事之所以委曲盡情，

---

① 參見《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2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參見《詩論》29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

首先在於淵明是一個具備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才智的詩人。在這一點上，西方的美學家常有「天才」之說，至康德提出「由天才來給藝術確定標準」以後，其理論可謂臻於完善了。而在中國三國時期的曹丕，他同樣也不否認藝術創作需要才氣，他在《典論·論文》中認為文氣是「不可力強而致」的，它是「雖在父兄，不能移以子弟」<sup>①</sup>的。朱先生所說的「深厚的人格涵養」、「豐富的精神生活」，蓋也與這一因素直接相關。其次，淵明素來就具備了一種清新淡遠的審美情趣，其間雖幾經宦海沉浮，但反而將他的這一審美情趣陶冶得更加爐火純青了。正因為淵明既具有深妙莫測的藝術才華，又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功力，因而後世學陶詩者，往往達不到他的那種境界。此外，諸多詩人寫景狀物、描摹人情皆不及淵明者，還在於他們缺少淵明那樣一種切實的生活體驗。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說宦海的顛簸，又有幾人能像淵明那樣到田園裏去踏實地耕耘呢？後世詩人之所以描寫田園景物或田園生活終似隔了一層，乃在於他們對於田園生活畢竟很陌生，他們即便是偶爾到了田園，也莫過是臨時的採風或成爲一時興趣所致的看客。而淵明則不然，他踏踏實實地在田園裏耕種，因而他具有深厚的生活體驗，同時也使他那極高的藝術創作才性，在貼近大自然的懷抱中萌發了新蘗、綻開了奇葩。

相傳《歸鳥》這個組詩也是作於義熙二年，全詩由四首四言詩組成，每首起句冠以「翼翼歸鳥」大有《十五國風》之遺韻。淵明的這個組詩是託物言志的作品，組詩雖然在吟詠歸鳥，其實何嘗又不是詩人展開自己的翅膀在那片廣袤而又自由的心靈天地裏遨遊呢！其中第一首描寫了歸鳥舉翮縱情翱翔的情景，那種「遠之八表，近憩雲岑」<sup>②</sup>的氣概，實在令人遠矚高瞻。這歸林之鳥在高翔的過程中，也在尋找它的志同道合者，它在爲此而「翩翩求心」、「顧儔相鳴」<sup>③</sup>。第二首描寫歸鳥在找到了它的歸宿之後的那種怡然自樂的情景。你看：那

---

① 參見《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 158 頁～15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29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29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任運飛翔的歸鳥找到了它的故林後便舊情依依，遇到天上飄來的白雲就欣喜地頡頏相鳴，儘管蒼穹是那樣地高遠無際，但它們的情性卻恰悅到了極點。第三首描寫歸鳥在林中徘徊，它們並非要到天宇中去尋找什麼新路，而祇是在尋找自己的舊巢。儘管山林中已經沒有昔日的舊侶了，但與那些新同伴的鳴叫之聲依然互相協調。況且那山間日暮的雲氣格外清爽，於是歸鳥也樂得其懷。第四首描寫歸鳥的高邈情志，它們「遊不曠林，宿則高標」<sup>①</sup>。也正因為如此，獵人的矰繳（以絲繫矢的射具）也就無從施展其長了。

通觀歸鳥組詩，其間雖對歸鳥高邈的情志作了出色的描寫，但又何嘗不象徵著詩人自己正在舉翮翱翔於他的田園那塊自由的天地裏呢？像這樣地詠物體貼細膩，委曲盡情之作，大有紹《國風》中「周」、「召」之餘緒，開東晉以降的詠物詩篇之先河的氣概。

義熙三年（407年），東晉王朝在劉裕軍事集團的支撐下繼續維持下來了，據《晉書·安帝紀》所載，這年五月，發生了洪水<sup>②</sup>，至於具體發生在哪個地域，就不可得知了。

**哀祭程氏妹** 這年，淵明四十三歲。他在田園躬耕之餘，忽然想起了他那亡故一年半了的程氏妹來了。我們曾經說過，淵明是一個注重感情的人，他的這種詩人氣質，也自然會使他對自己亡故的親人不能忘懷。在陶集中，一共收錄了三篇祭文，除了一篇是《自祭文》以外，其餘兩篇是祭祀他的弟妹的。若平心而論，這三篇祭文的篇幅雖然都不長，但它們何嘗又不是出自於五內的一片摯情的自然流露呢？後世韓昌黎雖以善作祭文著稱，韓文固然不乏磅礴的氣勢、奇崛的章法，但與淵明的這三篇短製相比，畢竟少了文學中的那樣一種不可或缺的情感（《祭十二郎文》除外）。

《祭程氏妹文》作於義熙三年五月，當時正值淵明為程氏妹服喪的兩個週期（共十八個月）。茲將全文鈔錄如次：

① 參見《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十25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暑往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饋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效。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裏。嗚呼哀哉！<sup>①</sup>

通讀全文，我們必然會與作者同時揮淚，因為這篇作品中所表達的哀慟之情，感染力實在太深了。在淵明歸園田居一年後的春忙之餘，大抵人生處在閑暇時，則往往易於觸發對往事的回憶。程氏妹此時也整整亡故了一年半，淵明在閑來回憶起她，自然是不勝感傷的，同時也會覺得沒有給她寫一篇祭文（也許當時淵明忙於程氏妹的喪事，加之他彭澤歸來的心情也許不佳，故爾未立即作文），也會覺得似乎對她還欠了一點什麼似的。淵明便在這痛定之際，回想往事，昔日情景，翩翩浮現，似歷歷在目，於是他揮毫寫下了這篇膾炙人口的佳作。

對於逝者的哀慟之深，自然莫過對於逝者行狀的久久不能忘懷，這不僅是淵明這篇祭文寫作的直接動因，而且也是這篇祭文中感人至深的內容所在。在文中，淵明如數家常似的敘述了他與程氏妹之間從小到大生長在一起的往事，也痛訴了程氏妹亡故以後其家境的悲涼。試想：兄妹兩人，從小就在一塊長大，家中甘苦，自然會有共同的體驗。而淵明對程氏妹的操行，則更是瞭如指掌，她那「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效」的品性，實在令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會喜歡。但老天偏偏要奪走人間的可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12頁～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愛與可貴，使程氏妹中年（死時三十八歲）就去世了，將那無盡的悲哀留給後死的詩人淵明來承擔。對於程氏妹「于歸」的生活，淵明雖然不甚瞭解，但在隆安五年（401年）淵明喪母時（事實上也是程氏妹死的前四年），程氏妹奔喪回來後相處的那段時間所留給淵明的印象，則更使淵明難以忘卻。那種兄妹和衷共濟以料理淵明母親孟氏的喪事的往事，何嘗會使淵明有須臾的遺忘呢！末了是淵明赴武昌程氏妹家奔喪所見的情景，從「書疏猶存，遺孤滿眼」的景狀來看，程氏妹不但具備了賢婦的令德，而且還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的女性。她一走便拋下了全家，當時「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箠箠遊魂，誰主誰祀？」在祭文中，淵明就是抓住他對程氏妹最難忘懷的三個人生片斷來敘述的，雖然最後的那個場景中程氏妹早已離開人世了，但無寧更是淵明難以忘懷的一個人生記憶。惟其如此，淵明在卒章的收束之處，乃與程氏妹約定：「相見蒿裏」。

衡量一篇文學作品的分量，評價其藝術造詣的高低，絕不能取決於其篇幅的長短（今人按字數計算報酬的方法並不可取），而必須取決於其作品是否具有感人的藝術魅力。在《祭程氏妹文》中，淵明用簡潔的筆調，為我們敘述了以上三個動人的場面，字字包含哀情，語語催人淚下，讀罷掩卷，仍有哀音繞梁之餘韻。我們能說這樣的文字不美嗎？自然，韓文公能寫出長篇祭文，但在他諸多的祭文作品中，除了《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誌銘》等少數的作品外，其餘作品也難免不有應酬之嫌。而像淵明這樣字字泣血、語語動人的文字，恐怕縱使是文風奇崛的韓昌黎也會不可炙手的。文學本來就是一種精神產品，它只對具有審美要求者纔具有價值，而這個價值本身又不是可以採用計酬方式來衡量的，它是一種無價值的價值。自然文學作品一旦進入了市場經濟，受價值規律的支配，那就會失去文學所應該具有的屬性，這就是韓愈的祭文不及淵明的內在原因了。

**責子與失火** 義熙四年（408年），東晉王朝仍在劉氏軍事集團的

控制下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是年，劉裕的部將孟昶被加尚書左僕射<sup>①</sup>。這年，淵明在躬耕之餘，寫下了《責子》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sup>②</sup>

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淵明的《命子》詩，透過那篇由十首四言詩構成的組詩，我們不難見出淵明青年時期對陶氏家族的榮耀感與他對子嗣的厚望來。而今，時過十六年了，淵明的五個男兒也相繼長大了，但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是愛好讀書的，這未免不使淵明為之感傷。

如果說淵明從彭澤歸來，是意味著他對官場、對東晉末葉的那個統治集團失望的話，那麼，淵明在《責子》詩中所體現出來的就是他對後代沒有出息的感歎了。但淵明畢竟是一個慈和的父親，且他又具有任運隨緣的個性，因此他面對這種現實，不但沒有對兒子求全責備，反而以一種自我調侃的方式「且進杯中物」了。

但不幸的事情還在後頭，義熙四年的夏天，淵明的草廬被焚，乃至「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了。對於淵明草廬的這次遭受火災，所焚的住宅究竟在何處，學界有一些異議。逯欽立先生認為淵明所焚的應該是園田居的草廬，逯先生言之鑿鑿，但也似有牽強<sup>③</sup>；而王瑤先生則認為淵明此次所焚是上京閑居的住宅，以《還舊居》中「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為證，良有道理<sup>④</sup>。其實，二家的分歧，乃在

①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0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逯欽立註解《陶淵明集》266頁～267頁、82頁注[1]，中華書局1979年版。今案：逯氏治學，頗無規矩，他往往為了標新立異而任意篡改詩文之原字，例如他解釋「閑居三十載」，對「三十」無法解釋，就擅自改為「三二」；又解釋「六載去還歸」，則曰「六年中身在仕途，來去不定也」（均見中華書局1979年版《陶淵明集》266頁）。如此治學，頗要貽誤後人，今人取捨，不可不察也。

④ 參見王瑤註解《陶淵明集》31頁及58頁的註解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王先生之說，往往前後相符，自然可取。然園田居在何地域，王先生在陶集《歸園田居》中並沒有註疏清楚，可見，園田居與上京並非二處，何陶淵明評傳

於園田居與上京是否在兩處地方這一關鍵點上面。今案：淵明草廬所焚時他在園田居，因為，淵明從彭澤歸來就一直住在園田居，至此三年沒有任何文獻記載淵明遷居的事；而淵明在來年寫給劉遺民的詩中也有「茅茨已就治」之句，也就是說火燒後的草廬雖然已經新葺，但還沒有剪齊屋檐（茅屋在新葺後，一般要在一年左右纔修剪屋檐）。再看《歸園田居》之二中「窮巷寡輪鞅」一句，正好與《遇火》詩中的「草廬寄窮巷」一句遙相呼應，兩個「窮巷」也正好互相印證，足以說明淵明當時是住在園田居的。而王瑤先生在註釋《歸園田居》一詩時，對於園田居具體該在何地域，是否與上京就是一處地方，這些都無交代，筆者看來，也許園田居就是處在上京那個地域，它與上京也就並不是兩個地方了。

對於這次的草廬的被燒，淵明作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奄去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sup>①</sup>

通觀全詩，淵明的草廬是在仲夏風急的氣候下燒掉的。祇要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草屋的著火是難以撲滅的，而在這樣的氣候下著火，風助火力，因而就「一室無遺宇」了，詩人舉家也只得遷至船上暫避風雨。待到草廬火後再葺時，詩人在秋夜仰望長空：「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多麼漫長的初秋之夜呀！此時也應當近七月的望日（十五日）了。這場火災給淵明的打擊實在是慘重的，從「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兩句，可以看出詩人在災後的餘悸尚未消除。此時，詩人回顧他的大半個人生：他從幼年就抱有孤高耿介之懷，至今已四十個春秋了，儘管他的身軀隨著日月在遷化，但他那廓然清澗

---

苦鬧出如此多的麻煩。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的靈府（內心世界）卻是恬然閒適的，況且詩人也將永遠堅持這一操守。

人生處在困厄時，總不免要想起美好的人類社會模式，在此，子思子的那種道不拾遺、餘糧棲諸畝首的「東戶季子」時代，也就成了詩人憧憬的對象。但那畢竟是很遙遠的時代了，今人也不可能遇上那樣的社會了，故爾詩人以「且遂灌我園」來面對現實，任運過時。

讀完此詩，我們自然會為淵明的不幸遭遇而歎惋。在人生際遇上，淵明確實是不幸的，但若不是因為他的人生如此地不幸，也許淵明在文學創作方面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成就了。記得宋人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有一段這樣的論述：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崖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sup>①</sup>。官場的顛簸、子嗣的無望、草廬的被燒，這一切都讓淵明給撞上了！淵明之成為詩人，信然！

**與隱士的唱和** 義熙五年（409年），東晉王朝中劉裕軍事集團向北發動了征討南燕的戰爭。據《宋書》所載，這年二月，南燕慕容德大肆搶掠淮北等地區，因而導致了這場征討南燕戰爭的發生<sup>②</sup>，且劉裕在早年似乎也略有收復北方失地的想法。但劉裕考慮的主要還是牢牢地掌握軍隊，控制東晉的局勢；這年，東晉王朝還加何無忌為鎮南將軍。同時，在這年正月，潯陽一帶發生了地震<sup>③</sup>，這勢必對淵明的家鄉會造成一定的災難。

這年，淵明園田居的草廬已經修復，經過一場大火以後的陶家，

---

① 參見《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二《居士集》295頁，中國書店1986年版。

② 參見《宋書》卷一《武帝紀》6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③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0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其家境自然不會如昔日寬裕了。淵明在這一年與劉遺民之間頗有交往，陶集中載有淵明與劉遺民唱和的兩首詩，可惜劉遺民的當年的詩作已經無法找到了，不然我們對於他們兩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將會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劉遺民、周續之與陶淵明三人素有「潯陽三隱」之稱，這在蕭統的《陶淵明傳》、沈約的《宋書》以及其他史籍中皆如此說。其中周續之的傳記在《宋書》、《南史》中有記載，且在《佛祖統紀》卷二十六中的《十八高賢傳》也有記載；而劉遺民的行狀則散見於法琳《辨正論》、元康《肇論疏》等文獻中，後來纔收入《十八高賢傳》中。對於劉遺民的事跡，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有所介紹，他從元興二年（402年）隱居廬山，至今已經近六年了。元康《肇論疏》載劉遺民始「拭祿尋陽柴桑，以爲入山之資。未旋幾時，桓玄東下格稱（在402年），永始逆篡始，劉便命孥考室林藪。義熙，公侯咸辟命，皆遜辭以免。九年，太尉劉公知其野志沖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禮，遂其放心。居山十二年卒。有說云：入山以後，自謂是國家遺棄之民，故改名遺民也。」<sup>①</sup>劉遺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與慧遠法師之間的交往也很深，而且自己的禪修工夫也比較專。

至於周續之，他既然作爲「三隱」之一，且對於他後來改變初衷，出仕於劉裕門下講《禮》一事，淵明曾作詩對他調侃，在他們之間未見得志同道合，但畢竟還是曾有交往，故爾在此一併加以介紹。《宋書·隱逸傳》謂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其先人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sup>②</sup>今案：續之卒於景平元年（423年），時年四十七，

<sup>①</sup> 參見《大正藏》第四十五冊181頁下，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sup>②</sup> 參見《宋書》卷五十三《隱逸傳》389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則其生年太元二年（377年），比淵明少十二歲。在「三隱」中，其中真正隱居了的祇有陶淵明與劉遺民，而周續之卻被劉裕延請至安樂寺講《禮》，為期一月後歸山，但他晚年仍然為劉裕講學，劉裕為他「開館東閣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因為他「素患風痺，不復勘講，乃移病鍾山」<sup>①</sup>。周續之雖然被列入隱逸傳中，其實他的一生比較複雜，並不像陶、劉那樣純粹的隱者，因而，「三隱」之中，也僅有他們兩人纔是真正的隱者。

淵明與劉遺民唱和的詩作有兩首，頗可以體現淵明的人生理想。其中，《和劉柴桑》一詩的內容如下：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應復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sup>②</sup>

此詩當作於春天。淵明的往來廬山，顯然與劉遺民之間交往的回數要多，且作為隱居，他們兩人的志趣應當是基本上相同的。然而劉遺民的隱居在乎「空山修定」，而陶淵明的隱居則近乎桃源老農，他們兩個的人生理想在同一方向上前進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分鑣各歧路的現象。也許因為他們兩人在人生理想的大方向上面是一致的，對於劉遺民的相約，淵明自然是欣然而往了，且他與劉遺民之間也不會像淵明與殷晉安之間那樣「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sup>③</sup>了。我們在上文中也曾提示了，淵明對於劉遺民的居山是並不贊同的，因為他不忍心與親友分離，他也離不開即將耕種成熟地了的新墾地（《說文》：「畬，三歲治田也。」即經過三年耕種的新地），他自然更難以戒除其嗜酒的生活習慣。他與劉遺民的志趣所同者在於「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疎」、「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而淵明所向往的並不是劉遺民所追求的那

---

① 參見《宋書》卷五十三《隱逸傳》389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陶淵明集》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與殷晉安別》，《陶淵明集》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種人生解脫，而是「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的「羲皇上人」式的社會模式。細讀此詩，陶、劉二人在志趣相近之中的分歧之處便昭然若揭了。此外，我們透過詩中的「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兩句，也不難見出東晉末葉民生凋敝的社會現狀，自然，淵明對此也是頗有微辭的了。

《酬劉柴桑》應當是作於這年的秋天。全詩內容如下：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  
鬱北牖（一本作「塘」），嘉穉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  
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sup>①</sup>

這儼然是淵明的人生情趣的寫照。淵明「好靜」，所以，他甘於「窮居」，他乃至對於四時的變遷也無心去過問了，大有「山中無甲子」的況味。其中「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雖引用了《淮南子·說山訓》中「一葉知秋」的語義，但在淵明的筆下，畢竟是詩人的氣韻，其中著「慨然」二字，境界盡出矣！這也就是說，隱居是淵明與遺民的共同志趣；但在淵明這裏，他喜歡的是田園而不是山居，他主張及時行樂而不主張自苦於清規，他更喜歡在良辰美景之時攜全家登山遠遊。我們曾在上文中討論過，淵明的一生不可能作官；他也不可能成為思想家或哲學家；他同時還不可能成為宗教實踐家；且又因為他「好讀書，不求甚解」，他也不可能成為專門的學問家；而其磊落率真的秉性也不可能使他成為財富的聚斂者；他的待人慈善（例如他去彭澤時送一力給其子時，尚且囑咐其子善待之）、心無機巧，還使他不可能成為莊園主……。而淵明，以他絕倫的穎悟與極高的藝術才性，卻足可以使他成為一代大詩人，這也是其他類型的人物所望塵莫及的。

在義熙五年，淵明還作有《己酉歲九月九日》一詩。重九之日，天高氣爽，草木凋零，萬象蕭索，這種情景在歐陽修的《秋聲賦》裏，已經作了淋漓盡致的描繪。而淵明在此詩的前八句中，將重九暮秋的蕭疏景象作了描寫：那種天高氣爽的氣候，那種蟬鳴消失、群雁南飛的情景，自然是易於觸發詩人對人生的感唱的。其中「萬化尋相異，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人生豈不勞」<sup>①</sup>兩句，便是對此時此景的感慨；而那種「濁酒且自陶」、「聊以永今朝」<sup>②</sup>的生活方式，乃是淵明排遣歲暮人生感傷的唯一途徑。值得提出的是淵明此詩寫景是不無佳句的，例如「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sup>③</sup>兩句，無疑是妙手偶得的一幅暮秋圖，其中「澄餘滓」（連一絲塵滓也被滌除無遺）三字，著一「澄」字，妙意高遠；而「杳然」二字，則更使蒼穹顯現其高遠無際，使那秋天肅清的氣候宛然目前。這些看似尋常的句子，若不是具有深厚藝術功力的大家手筆，顯然是不能等閒拈出的。

**躬耕之獲** 義熙六年（410年）是東晉王朝的多事之秋。在這年三月，劉裕剛好平復後燕慕容氏對南方的騷擾以後，廣州刺史盧循接著又造起反來了。盧循率兵輾轉進攻江州，當時的江州刺史何無忌慘敗於盧循之手，無忌本人也因遇害而死。當年五月，尋陽一帶發生風災，東晉王朝派劉毅去抵禦盧循的進攻，兩軍在尋陽江上的落桑洲發生激戰，致使晉軍大敗，尚書孟昶也因此而自殺。經過數月的激戰後，至七月，盧循軍纔開始潰敗，於是退回潯陽。當年十二月，劉裕在豫樟（南昌）擊敗盧循軍<sup>④</sup>，「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sup>⑤</sup>。在東晉王朝與盧循的鏖戰之際，後秦姚興也乘虛而入，騷擾江陵一帶，晉將劉道規將之擊退。

義熙六年爆發在潯陽一帶的惡戰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淵明對此自然也不會無動於衷的，奇怪的是在陶集中居然沒有一篇直接描寫這場戰爭的作品。況且，「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的慘象，早在這場惡戰爆發之前，就在淵明的家鄉出現了，而經過此番兵燹之後，

---

① 參見《陶淵明集》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1頁～2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又見於《宋書》卷一《武帝紀》7頁～10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⑤ 參見《宋書》卷一《武帝紀》10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潯陽故里的蕭條自然是更不堪言了。也許，戰爭的恐懼、戰亂所造成的人心惶惶，使詩人更加遠離現實了，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確乎更可見出淵明對於長沮、桀溺耦躬生活的履踐。爲了使我們能更清晰地瞭解淵明此時的內心世界，我們姑將此詩全文錄出。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一本作「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sup>①</sup>

在本詩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此時淵明的思想中，仍然以孔孟思想佔主導地位，只是有某些局部的蛻化而已。「衣食固其端」，本來是出自孔孟的思想之中的<sup>②</sup>，淵明從這一思想出發，提出了但求生活安定的期望。其實，在求「自安」的過程中，何嘗又不隱含了詩人對當時社會「不安」的惶惑？祇是因爲淵明採用淡遠的筆調以出之，使我們習而不察而已。「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數句，是對農作的具體描寫，也是對淵明躬耕生活的真實寫照。其中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寫出了農作的勞苦；而「田家豈不苦」一句，則更體現了淵明推己及人，從而表現出了對於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若無切身的體驗，像這等詩句是絕對不能寫出來的。我們再來看「遙遙沮溺心」一句，其中自然不無深意。《論語·微子》載長沮、桀溺耦

---

① 參見《陶淵明集》34頁～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子貢又問在這兩者中可以先捨棄何者，孔子說：「去兵。」因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參見《十三經註疏》2503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又《孟子·梁惠王上》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參見《十三經註疏》2666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又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爲能。」（同上2761頁中）從孔子與孟子的思想中，可以見出他們對於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是非常重視的，因爲這樣做是有助於社會的安定的。

而耕，孔子從那裏經過，便派子路去問津。子路與他們兩個展開了交談，最後桀溺反問子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說完便耦躬而不輟<sup>①</sup>。顯然，孔子對於長沮與桀溺的思想是並不贊同的，但淵明在這裏對於長沮、桀溺的辟世應當是良有體會的，他之所以不辭勞苦地躬耕在地裏，事實上也是在擔心「異患干」（即遇上兵燹），他希望發生在他草廬附近的戰火，不要蔓延到他草廬中來了。爲此，他緘口於是非之場，埋頭於躬耕之業，且「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了，這也無疑是在孔孟思想基礎的蛻化表現，抑或曰從孔子如入世思想轉化爲出世思想了。

本詩詩人寫得比較隱晦，但其中不無淵明對「滔滔者皆是也」的世態無可奈何的隱懣，也不乏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他自然也希望他的草廬中恬靜的生活環境不至於遭到破壞。在此，我們通讀此詩，也不難逆料到此次兵燹，雖然對於淵明的家鄉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但對於淵明個人來說，他的草廬在兩年前雖然被燒，而在這次的兵燹中居然獲得了幸免。

## （二）陶淵明隱居生活的中期

義熙七年（411年）正月，劉裕「振旅於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旋改授太尉<sup>②</sup>。四月，盧循逃往交州，刺史杜慧度殲滅盧循並斬之<sup>③</sup>。由孫恩發動的以五斗目道爲旗號而發難的這場暴亂，至盧循便愈演愈烈，其前後長達近十二年之久，至此總算徹底平復了。

**詩人的移居** 是年，淵明年四十七。在這一年，淵明移居南村（南里）。南村在潯陽九江之負廓，淵明由原來的園田居（園田居應當是在潯陽上京這個地方，至於潯陽應當爲郡級地名，而上京殆潯陽的下一級的地名，而南村與上京則均爲鄉村一級的地名，至於園田居蓋爲淵明給自己的居室所命

<sup>①</sup> 參見《十三經註疏》2529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

<sup>②</sup>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0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sup>③</sup>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之名。因而淵明在潯陽的三處地方住過的說法似乎並不可靠，仍須有得力的證據纔可以成立)遷至這裏居住，前後共住了六年之久。如上所述，淵明的園田居雖然偏僻，但對於他躲過發生在他家鄉的多次戰亂卻很有利。按照淵明的說法，他此次移居南村的緣由是因為聽說那裏有很多「素心人」(即本心樸素的人，一說為心地澹泊的人)，其實，更多的原因應當是淵明在那裏能夠找到幾個思想情操與文化品位略高一點的人，他與這些人朝夕相處，自然趣味良多。

此次遷居，淵明作有《移居》二首，茲錄如次。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有歸，暇閒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sup>①</sup>

淵明畢竟是具有非常高文化素養的人，他義熙元年從彭澤歸來以後，便在園田居那個偏僻的地方居住。淵明在那裏遭受了火災，還有發生在他身邊的兵燹，他皆備嘗之。其間，他儘管與劉遺民等人有過交往，但遺民畢竟已經隱居廬山，他們之間是無法朝夕相見的。在一個窮巷住久了，搬遷到一個能夠找到知音的地方，忙時各自去下地耕種，閑時便相與作詩唱和，嚶鳴求友，那自然是比較愜意的。南村的住宅雖然狹小，但大廈千間，夜眠七尺，淵明認為「取足蔽牀席」就足矣。而關鍵在於那裏有「素心人」朝夕與共，談評古史，其間固然有無窮的樂趣。尤其是在淵明那個年代，他的詩文作品不似今天一樣，可以隨便見諸報刊，我們今天寫作儘管閉門從事，縱然無人相識，也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傳播出去，從而達到與社會交流的目的。在淵明那時，詩人作詩，並非懷有別的目的，而僅僅祇是一種高雅的精神活動，但這種精神產品一旦脫離了讀者，也就失去了其實存的審美價值。因此，詩人之樂居南村，乃在於他的「奇文」可以與人共同欣賞，他對

---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35頁～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於古書上的疑義也可以找到互相討論的對象。在這裏，我們不免想起了《論語·學而》中的那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話來了。宋人邢昺疏曰：「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來，與己講習，不亦樂乎！」<sup>①</sup>從淵明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兩句，即可見出孔子那時的龐樸學風來。

淵明居住南村，不僅是因為那裏的文化氛圍要比園田居好，而且還因為與那裏的「素心人」相處，可以互相暢懷飲酒賦詩，這對於激發詩人的創作熱情、促使詩歌創作的靈感爆發，自然是很有益處的。古人之所以辦詩社，其間的主要原因，恐怕也不外乎此。試想：那種鄰里之間互相登高賦詩之樂，還有那種過門就熱情地打招呼的風氣，一旦有酒便共同暢懷酣飲，亦自有一段樂趣在其中。而且祇要他們之間互相想念，哪怕在夜間也可以任情披衣相訪，而且互相談笑沒有厭倦之時，那是何地盡情！何等酣暢淋漓！自然，若在農忙之時，也就各自務農，努力耕種，從而使自己的衣食有一個可靠的保障。究竟淵明遷居到那裏所遇的「素心人」是哪些人，這就很難說了。淵明在來年有一首贈別殷景仁的詩，也許他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人了；但殷景仁當年在作南府長史掾，他顯然無須親自下地勞動了，那種「農務各有歸」、「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的日子，顯然不會出現在殷景仁那裏。至於這個人究竟是誰，也只好等待以後出現新的材料時加以訂正了。

**哀祭從弟** 義熙七年八月，淵明的從弟敬遠逝世了，這對於淵明來說，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打擊。我們在元興二年淵明致敬遠的詩中已經提過，他與淵明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從兄弟，而且在淵明歸隱躬耕後，敬遠一直在協助淵明耕種，二人情誼如同手足。且淵明的五個兒子都不愛好讀書，而敬遠卻「好是文藝」，他的去世自然是淵明家族的一個損失。還有一個行狀不明的從弟仲德，大概是在敬遠逝世後不久死去的，他也如同敬遠一樣而華年早逝，留下幼子與年輕的妻子受苦。面對陶氏家族人丁單薄的境況，淵明自然會是不勝感傷的。

---

<sup>①</sup> 參見《十三經註疏》2457頁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

我們曾經說過，淵明的三篇祭文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今謹將《祭從弟敬遠文》鈔錄如下。

歲在辛丑，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

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高朋，好是文藝。

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裏，邈無還期。

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髻鬣，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真彼眾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

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sup>①</sup>

這篇祭文語言精煉，而字字飽和熱淚，句句發自五內，讀罷令人潸然淚下。全文大致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交代緣起，表達淵明痛失愛弟的沉痛心情。第二部分簡介了敬遠的為人。敬遠為人孝悌，胸懷澹泊，具有臨財能廉、謙讓朋友的美德，這實在是令每個活著的人為之敬佩的，也是令每個活著的人為之難過的。且在陶氏家族中，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14頁～1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敬遠「樂勝高朋，好是文藝」，也是一個難得的文化人才。在簡介了敬遠的人品以後，淵明便對敬遠的死因作了委婉的介紹。其實，敬遠死時「年甫過立」（剛剛滿三十歲，大概是三十一歲），他這個年齡還不應該是被死神召喚的時期。但因為敬遠信奉道教，乃至住山修道，採藥山間，辟穀服氣，誰知這一號稱長生之道反而成了促使敬遠短命之由，這是淵明不得不為之疾惡者。出於對敬遠的尊重，淵明對於敬遠修道雖然頗有微辭，但在分寸方面卻把握非常得體，其間「爰感奇心」一句，分明是暗示著敬遠的修道是被道家誘惑去的；而「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幾句，無疑是對神僊道術的虛偽性的揭露。其實，淵明非但不信奉道教，他就是對於好友劉遺民的居山，也是採用微言相勸的（即「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這一思想應當是統攝於淵明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整個道統之中的。第四部分寫淵明與敬遠的親緣關係及其共同相處的那些歲月。敬遠不但與淵明是堂兄弟，而且兩個人的母親又是姊妹關係，這種特殊的血緣關係使得他倆的情誼非同尋常了。加之敬遠從小與淵明在一起長大，往日的「同房之歡」之情景，至今猶宛爾目前；更何況過去那種「冬無緇褐，夏渴瓢簞」的清苦生活，他兄弟倆當時也「相將以道，相開以顏」地度過來了。在那種清貧的日子裏培養起來的感情，自然不會容易淡忘，那是人生中至為珍貴的東西，也將成為人生中的一種永久記憶。對於淵明這種注重感情的人來說，他對於敬遠的中年喪身，自然會有如喪己身的沉痛。更何況敬遠善解人意，在淵明幾次出仕辭歸的那種困難時期裏，他不顧世俗的非議，毅然地幫助淵明，與淵明一同度過難關。

「士窮見節義」，這種患難之交，還不足以見出敬遠的崇高人品麼！當時敬遠與淵明一起耕種，那種兄弟倆在人生的艱難歲月裏，通過「相啣以氣，相濡以沫」的方式凝聚起來的情感，何嘗容易割捨！第五部分表達了淵明痛失敬遠的哀慟，同時也對敬遠的家室抱以深切的同情與關懷。當敬遠辭世時，他家「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面對一個尚不會說話的小侄子，面對年華正茂的弟媳，能不使濃富親友之情的淵明痛不失聲嗎？為此，淵明潛淚寫成了這篇祭文，以表述他作為堂兄的一番厚情，同時也作為後死者的一種聊以慰

藉。

通讀這篇數百字的祭文，其中並無多少俗套的格式用語，也沒有多少裝飾的詞句，而是一種純然樸質的真情在傾訴，故爾字字催人淚下，句句感人肺腑。孔子曾經說過：「繪事後素」（《論語·八佾》），在文學作品中，華麗的詞句的裝飾，往往會掩蓋作者真實感情的流露；倒是那種一腔摯情傾瀉的文字，則其遣詞造句皆出天然，自然成文，此等文字往往不可刪削移易，卻又妙合真趣。《祭從弟敬遠文》之所以成爲了一篇膾炙人口的佳作，乃在於作者以一片摯情來駕馭語言文字，因而字字皆寓情感，處處靈氣湧現。

義熙八年（412年），劉裕加強了他對東晉王朝政權的控制，這年九月，劉裕迫使劉毅自殺，並乘機殺害了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劉毅是劉裕的從弟，且又是京口發難的二十七人之一，這年九月，劉裕攻陷江陵，迫使他自殺了。對於這場清除異己的殘殺，沈約的《宋書》是這樣記載的：

毅（劉毅）與公（劉裕）俱舉大義，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業足以相抗。雖權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左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十月，鎮惡克江陵，毅與黨與皆伏誅。<sup>①</sup>

如果說沈約的記載還對劉裕有一定的掩飾的話，則唐人所作的《晉書》應該是比較接近於史實了。《晉書》卷十曰：

（九月）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竄宄。賴寧輔玄鑒，撫機挫銳，凶黨即戮，社稷乂安。……」己丑，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sup>②</sup>

<sup>①</sup>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0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sup>②</sup> 參見《晉書·安帝紀》263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這分明是一場劉裕爲了鞏固他對東晉朝政的控制所產生的內部殘殺，從他的「矯詔」，也足以見出當時的晉安帝也祇是徒有虛名了。面對這樣一種政治局勢，凡是有一點政治遠見的人，都不會苟且去趨附的。

**告別殷景仁** 在這一年，淵明居住在南村，但南村中那位曾一度與淵明「信宿酬清話」<sup>①</sup>的殷晉安，他開始告別與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生活，改做了劉裕的參軍。在殷晉安即將移家東下時，淵明作《與殷晉安別》一詩相贈。此詩前面有一個小序，曰：「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sup>②</sup>這就是說，淵明義熙七年遷居南村時，殷景仁（名鐵，字景仁）只做了南府長史掾，故爾家居潯陽，得與淵明作了短暫的鄰居；而他此番作了劉裕的參軍，因而舉家將要東遷了。

南府是由晉安分出的南郡，當時殷晉安在那裏掌書記之職；義熙七年，劉裕改授太尉，牢固地控制了軍隊，也正是他網羅人才的時候，故殷晉安在義熙八年（大約在這年春天）被啟用爲參軍。《宋書·殷景仁傳》也載他初爲劉裕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參軍，而劉毅是在八月被殺的，大概殷在劉裕討劉毅之前就改做太尉參軍了。如此看來，殷的爲人似乎也有一些欠地道的地方，他與淵明之間自然也會有一定的思想距離。

儘管如此，淵明不但作詩贈別。而且在詩中不忘存念舊情，以款款善言待之。此詩回憶了詩人與殷景仁短暫的鄰里間開心的日子，「信宿（連續兩個晚上）酬清話，益復知爲親」，那種昔日交談情誼款洽的氣氛，自可於晝夜不疲的情景中見出來的。而面對殷景仁的即將啟程赴劉裕的官職，淵明自然不無惜別之情，但詩人也爲殷的去就頗不贊同，因而兩人之間出現了「語默自殊勢」的局面，因而淵明便「亦知當乖分」了。儘管淵明與殷在思想境界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乃至造成他們終究分手的結果，但淵明在詩中仍不乏款款慰藉之語。其中「未

① 參見《陶淵明集》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sup>①</sup>數句，將詩人與景仁昔日之情誼表現出來了，他同時也希望殷在往後若從潯陽經過時不要忘記了來看望故人。而其中的「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兩句，自然也體現了他倆不可彌縫的思想差距。遷居南村，本來圖與「素心人」朝夕相處，誰知這個「素」也易於染污。這人、這世態炎涼，自然會撩起詩人無限的感慨，這層意思自然也是這首贈別詩的弦外之音了。

義熙九年（413年），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並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sup>②</sup>。

**堅守素心** 大約在這一期間內（在此期間前後幾年），淵明被劉裕所控制的東晉王朝徵爲著作郎，但淵明辭不赴命，這在蕭統的《陶淵明傳》及《宋書》、《晉書》等文獻中均有記載。今案：在元康《肇論疏》中，載義熙九年，「太尉劉公知其（遺民）野志沖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禮」，則劉裕的開始關注「潯陽三隱」，大抵在此年。而《宋書·隱逸傳》也謂周續之在劉毅鎮姑孰時，曾被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周皆不就。案：劉毅在義熙八年遇害，此事當在義熙八年之前，故我們將淵明的被徵著作郎暫繫此年。誠然，淵明在義熙元年之前辭去劉裕的參軍，後來又辭彭澤令，他此時斷不至於再出仕劉裕門下了。又依《晉書》卷九十四，淵明「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sup>③</sup>

**酬唱素心人** 在陶集中，淵明與羊長史、張常侍、龐主簿等人的應酬之作，也是此後數年的作品。大抵在陶淵明遷居南村時所遇的「素心人」中間，也許就包含了這些層面的文化人。在陶集中收有一篇《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的詩，戴主簿這個人的行狀已經不可考了，但根據

① 參見《陶淵明集》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3頁～264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③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詩中「星紀奄將中」一句，可以初步確定是這年的作品了<sup>①</sup>。《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開頭部分描寫了日月的容易流逝與夏日的景色，對於這個部分我們在這裏姑且略去，而對於其後半部分，似乎可以稍作一些評介。其中「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sup>②</sup>四句，可謂詩人已將人之死生之規律看破，它表達了詩人以「平常心」（居常）來對待生死的態度。但對於其中「曲肱豈傷沖」一句，卻很值得我們仔細品味了：「曲肱」一語出自《論語·述而》，其原文為：「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sup>③</sup>這就是說，淵明對於孔子的人生理念與價值取向基本上是認同的，惟其如此，他具有崇高的人格與偉岸的氣質。

但另一方面，一個「沖」字，分明是出自於《老子》之第四章，其原文為：「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sup>④</sup>老子的「大道沖虛」的思想，在陶淵明這裏似乎也被兼收並蓄了，這就形成了具有淵明個性的人生理念。因此，淵明認為：「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窟隆；即事如己高，何必升華嵩」<sup>⑤</sup>。也正因為在淵明身上具有孔孟的思想，這就使得他具有崇高的人格與耿介的氣節；又因為淵明兼收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使得他又不乏任運逍遙的氣度。他就是這樣灑脫地對待生死，他所希求的是人生活著的時候能夠肆志（不受拘束）而行，不唯唯諾諾、蠅營狗苟；但他對於道家所羨慕的華山、嵩山等僊境（求僊成道的那一套），是始終不採取的。這就是淵明的性格與氣質，也體現了淵明的為人與為文。正因為他如此磊落率真，因而在他筆下的詩文不著一絲的塵滓俗氣，即便是他那率爾為之的文字，往往也真趣盎然。

---

① 據《晉書·天文志》記載，「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而義熙九年正好是桓柳年，故可以確定此詩為該年之作。

② 參見《陶淵明集》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十三經註疏》2482頁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④ 參見《二十二子》1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止酒》的創作 淵明的《形、影、神》三首，相傳也是這一年的作品，因為我們在上文中已經作了介紹，故爾此處姑且從略。但相傳作於該年的《止酒》詩，倒是很值得一提，謹將全詩鈔錄如下。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暎；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sup>①</sup>

這首詩平白如話，大抵在淵明當時「儷采百字之耦，爭價一句之奇」<sup>②</sup>的文學氛圍裏，他的這首詩祇能算是「打油詩」了。但從全詩的氣勢上面來看，它顯然是一種文不加點、一氣呵成的佳作。且在《止酒》的前半部分裏，還似乎具有一種舉觴相勸以助興的情韻，後世李太白的《將進酒》或許纔有這樣一種氣勢與情韻。自然，我們通過此詩可以看出，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所說的「性嗜酒」，完全可與本詩相互參驗，其「嗜酒」應當是一點不假的。另外，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焉」，這也不假。在陶集中，確實有不少作品與酒直接相關，有人將陶集中一百四十二篇作品作了一次統計，其中與飲酒內容直接相關者凡五十六篇，其數量也不少了。如何看待淵明的「嗜酒」，這也是一個很有探討意義的問題。在這裏，我們並不否認陶淵明的嗜酒，但在此詩中卻分明說明了詩人決意戒酒，而且還是「今朝真止矣」、「將止扶桑暎」了，可見，淵明對於自己的「嗜酒」也並非沒有理性的態度與冷靜的考慮。那麼他後來何以又飲酒不止了呢？這中間一是因爲社會的污濁，非飲酒無以排遣煩悶；二是因爲淵明的嗜酒可以說是人盡皆知的，未嘗沒有朋友邀他飲酒，而淵明素來性格率爾，自然很快就又嗜酒了；三是大凡人之嗜好，往往須要有很大的毅力纔可以去掉，而淵明的人生態度又是「居常待其盡」的，他對一切都任運隨緣，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文心雕龍·明詩》，《文心雕龍校證》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自然就不會用毅力去克制自己飲酒了。要之，淵明在生活習慣上面曾經在「飲酒」與「止酒」之間產生過衝突，但衝突的結果自然祇是聽其自然了。

義熙十年（414年），在劉裕控制下的東晉王朝實行了「息民簡役」的政策，與此同時，劉裕對待當時的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也布下了殺機<sup>①</sup>。

《雜詩》的寫作 淵明這年五十歲，他仍然居住在南村。若實而論，南村應當處在靠近潯陽城鎮的地域，而園田居（或上京）也許是靠近農村的偏僻地域。陶淵明當年雖然並不富有，顏延之在《誄文》中也說他「爵同下士，祿等上農」<sup>②</sup>，但他畢竟還是一個東晉的士族子弟，故爾到靠近潯陽的地域尋找一處住所也應當是可能的事，祇是在靠近潯陽城鎮的這個住所狹小一些而已，而他家人口多，居住不便，而他疇昔在上京（或園田居）的住所雖然偏僻但要寬敞一些而已。陶集中的《雜詩》這個組詩，學界多認為是414年的作品<sup>③</sup>。今查《雜詩》之六，其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sup>④</sup>之句，故暫將之歸入該年的作品之中。

其實，《雜詩》顯然不是一個時期的作品，為方便故，今謹擇其前面八首加以介紹。第一首與第三首之涵義相近，因此合到一起來介紹。《雜詩》之一旨在說明人生居無常處之理，它從空間角度說明了人生在居住方面的不隨人的主觀意願而轉移的客觀規律，從而提出「四海皆兄弟，何必骨肉親」<sup>⑤</sup>的思想主張。也因為如此，詩人提倡及時行樂，他認為「歲月不待人」。而第三首則側重於表現歲月不淹，韶華易逝這個思想主題。從「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兩句，是不

---

①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1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文選》卷五十七792頁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③ 參見王瑤先生註解《陶淵明集》43頁之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難看出詩人對世事無常、人生短暫的感喟的。兩首詩同是表現人生無常這個主題，而第一首是側重空間而說，第三首是側重時間而說的。其中第一首中的「此已非常身」一句，與第三首中的「盛衰不會量」之間，似乎也存在互相照應的關係。

第二首與第五首之間也存在某些相通之處。第二首是寫詩人寒夜獨酌的情景，其中「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sup>①</sup>兩句，實在是對一種無可奈何的寂寞的抒懷，這兩句詩的境界，似乎經過唐人李太白之吟詠便演化為「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了。而此詩中的「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sup>②</sup>，就很明顯地帶有人生已暮，志業未成的感傷。這與詩人在《命子》詩中的對祖先的榮耀以及對子嗣的厚望的那種感情是遙相呼應的，且在其五中的「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sup>③</sup>一語，則更含有面對祖先陶侃的不勝羞赧之意。這種思想在《雜詩》之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④</sup>數句，便將詩人年輕時胸懷大志、而今壯志未酬的情懷和盤托出了。後世評論陶集者也往往取此處詩句與《讀山海經》中的「刑天舞幹戚，猛志故常在」<sup>⑤</sup>扭合到一起，用以證明陶淵明的一生並未忘懷世情。固然，這種說法也有片面的道理，淵明對於世情既有無法忘懷的一面，同時也有不得已必須忘懷的一面，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切不可偏執一端。在其五首的後半部分，詩人描寫了歲月的流逝，致使他「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的情景，而人生事業無成，面對惜寸陰乃至惜分陰的祖訓，他的感喟增劇，甚至感到莫大的慚慙。

《雜詩》之四比較能代表淵明人生理想的主旋律部分，茲將全詩鈔出。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

① 參見《陶淵明集》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  
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sup>①</sup>

如果說淵明在面對祖先時易於產生一種人生易老、志業無成的感喟的話，那也祇能代表他在面對先人時的那段情懷，而作為身處東晉末葉那個特定的時代、不願意違心處穢的詩人本身來說，其人生理念與個人尚好應在此詩之意了。朱光潛先生站在詩學的角度來評論陶淵明，蓋也是偏重於這一角度而生發出去的。但「人」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聚合體，我們不能說在淵明的思想中沒有積極進取的一面，同時更不能否認東晉那個時代不允許人們具有進取心的現實，加以淵明率爾磊落的性格、孤高耿介的情操，勢必使他祇能選擇本詩中所描寫的這種生活方式了。在這裏，淵明希望人生能忘卻蒼老，他希望能與親友們長久地共同住在一起，也希望子孫們能夠共聚一堂、飽享天倫之樂，他還希望杯中能常常有酒、並以飲酒彈琴來打發歲月，他酷愛自由、不願意接受官場的拘束，他喜歡衣冠自如的快適，他喜歡起居無時、維適之安的適意生活……這些既是淵明歸隱的主要動機，也是他後來再不赴任作官的重要原因。與第一、三首詩相似，詩人認為人生百年之後一切皆歸於空無，因此又何必為了爭得眼前的那些虛名而終日將自己苦苦地折騰呢！

第六首與第一、三首的主題比較接近，也表達了詩人面對人生短暫而主張及時行樂的思想。其中「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sup>②</sup>兩句，表達了淵明不僅不打算為子孫留下遺產，而且也不打算為自己死後留下喪葬金的想法，這與他在《自祭文》中所主張的「不樹不封」的薄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也意味著淵明的薄葬思想在這時就已經顯露了端倪。第七首與第六首的主題相近，詩人年已半百，玄鬢早白，容顏已頹，故使他深深地體會到「家為逆旅社」<sup>③</sup>了。詩中的這種情趣，似乎與《自祭文》的主題比較接近，可見《雜詩》並非一時之作了。第八首描寫了淵明當時家境的貧窘，他連「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① 參見《陶淵明集》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①的最低生活水準也無法實現了。詩人面對此境雖然不勝感傷，但他並不怨天尤人，他認為「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因此祇能「且為陶一觴」<sup>②</sup>了。這就很明顯了，就如我們上文所說的，詩人不會理財、他也不會持家（《晉書》亦說他「不營生業」），因而他必然會如此貧窘。但我們無寧也可以這樣說：惟其不會理財，他纔不會將自己的心思完全用於「柴米油鹽」上面，這反而使他轉入了藝術創作之中，使得他成爲了一代偉大的詩人。

義熙十一年（415年），荊州刺史司馬休、雍州刺史魯宗之剛好出現了地方割據的苗頭，劉裕便率領軍隊征討之。三月，劉裕在江津戰敗了司馬休；五月，司馬休與魯宗之投奔了姚泓。這年四月，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被劉裕害死，整個東晉境內的全部權力基本上集中到劉裕手裏了，他的取代司馬氏的東晉王朝也是指日可待的了。

**與顏延之之交** 在這一年，淵明的好友顏延之出任了劉柳的後軍功曹，得以與淵明交往，他們兩人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且淵明死後的《誄文》也是顏延之所作。顏延之在潯陽，對淵明的經濟資助也是比較大的，這便使得這位老詩人在晚景蒼涼時能夠勉強度日。沈約在《宋書》中爲顏延之作傳，謂他「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書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sup>③</sup>顏延之的這些性格與生活習慣，頗與淵明相近，這便是他到潯陽後與陶淵明趣味相投的原因所在。據《宋書》劉柳的傳記所載，他的出任江州刺史是在義熙十一年至義熙十二年之間，在《晉書·安帝紀》中也說劉柳在義熙十二年新除尚書令、都鄉亭侯後，便於該年六月卒<sup>④</sup>，然則顏延之的出任他的後軍功曹，應該在義熙十一年纔合適，故爾他的結識淵明也應當是在這年。又，據顏延之爲淵明所作

---

① 參見《陶淵明集》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宋書》卷四十三《顏延之傳》263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④ 參見《晉書》265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的《誄文》，其中有「年在中身，疾維疢疾」之句，「中身」即五十歲之意，取人生百歲之半也。而淵明在該年正好五十一歲，與其《誄文》所說正好相切合，足以證明他們的交往是在這年。

顏延之對淵明的經濟幫助是很大的，據蕭統的《陶淵明傳》所載，顏延之「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sup>①</sup>據史傳記載，顏延之的出任始安太守是在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那時正是淵明晚年生活中極為困難的階段，顏延之對他的經濟幫助也無疑是雪地送炭了。

義熙十二年（416年）正月，後秦姚興派大將魯軌騷擾襄陽，被雍州刺史趙倫擊退。三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sup>②</sup>，《宋書》所載劉裕當年尚有定關、洛之意，而這年「羌主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關中大亂」<sup>③</sup>，這個有利的時期，促使劉裕得以實現他的原來的那個計劃。在這年八月，劉裕與琅邪王德文率領軍隊討伐姚泓，十月，姚泓以洛陽歸降。這樣，劉裕便一舉收復了北方的滑臺、許昌、洛陽等地。對於劉裕在416年至417年之間的收復了不少北方失地，辛棄疾在他的詞裏是這樣說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sup>④</sup>可惜劉裕的子孫們不如前人，未能完成這個統一北方的大業。

**下澗田舍穫稻** 義熙十二年也是淵明居住南村的最後一年，來年他又遷居到上京去了。在陶集中，《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一詩，應當是這年的作品。「下澗田」就是指地處低窪的水田，因潯陽地處鄱陽湖，這種田就是靠近湖濱的水田，過去將之稱作湖田，它祇

---

①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晉書》卷十曰劉裕的加中外大都督是在當年二月，而《宋書》卷二則曰在當年的在三月，蓋二者相去不遠也。

③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3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④ 參見《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六5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有在沒有洪澇災害的時候纔會有收穫，民間有「湖田米糧洲，十種九不收」的諺語，因而連過去的官方也不會去過問湖田的稅收。我們從詩中的「揚楫越平湖」一句，也可以知道淵明此次是在那湖田裏獲得收成的，這種難得的收穫，對於生活困窘的淵明來說，自然是不勝喜悅的。茲錄全詩如下：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隄。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東帶候雞鳴；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棲。<sup>①</sup>

本詩的前面四句概寫了詩人躬耕的勞苦，表達了詩人寧肯在體力上勞累也不願意「負所懷」的情志。在多年歉收的情況下，該年終於獲得了秋收，對此，詩人自然是喜形於色的，因為那種「飢者歡初飽」的企盼眼看就要實現了。接著，詩人描寫了他迫不及待地去收割湖田裏的糧食的情景：詩人沒有等到雞鳴就整裝束帶準備出發，他蕩舟穿越平湖，泛舟隨著清澈而又彎曲的山壑迂回而行，輾轉來到了那個草木鬱茂的山溝裏，那裏的猿啼聲清閑而又哀惋。也許是由於詩人的心情特別喜悅的緣故，他對於這靜夜裏吹來的涼風也感到格外地喜愛，而那些在清晨爭相鳴叫的山鳥，自然更令詩人開懷。面對此時的收穫，詩人回顧他從彭澤歸來的十二個春秋，他分明知道自己在躬耕中衰老了，但他覺得這十二年過得充實，並未違背他的本懷。置此情景，詩人想遙向荷蓀老人<sup>②</sup>說上一句：我姑且與您一道棲息，這就是詩人歷久不衰的素志。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論語·微子》載：「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參見《論語譯註》202頁～203頁，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在這裏，淵明引用這個典故，是旨在說明他決意隱居的志趣。

作詩戲贈周續之、祖企、謝景夷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詩，也應該是作於該年。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sup>①</sup>據《宋書》所記載，檀韶在義熙十二年丙辰遷江州刺史，因而周續之的出州講《禮》應該是在義熙十二年。我們在上文中曾經介紹過，在「潯陽三隱」中，僅有劉遺民與陶淵明纔是真正的隱者，而周續之不但在義熙十二年出州講《禮》，而且在永初中（420年～423年）還出仕於宋了。對此，《宋書·顏延之傳》說：「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居之……」<sup>②</sup>對於這種身在江湖、心懷魏闕的沽名隱者，按照淵明的性格來說，自然是不屑一顧的，因而淵明在這首贈詩中也不乏微辭。詩的開頭六句是「負疴屋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sup>③</sup>，這既交代了淵明此時的身體狀況欠佳，正處在病老交加之中；同時也涉及了他們昔日裏的友情。但接著的「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六句，便對周續之的趨附權勢不乏揶揄了。「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兩句，分明是對周生三人的挖苦，早在太元中，儒生范寧就在豫樟講學，大力提倡儒學，那時的氣氛肯定比此時要濃厚得多，且周續之也是從那裏受業的，又何來的「今朝復斯聞」呢！「馬隊非講肆」一語則更寓深意，周續之的講肆確實靠近馬隊，這並無什麼誇張，但這裏一個「非」字分明在喚醒周續之：那個地方不是弘揚孔學之地，切莫將孔聖人的學問糟蹋在那裏！而「校書亦已勤」一句，其調侃意味就更濃了。詩的結尾四句表達了詩人對周續之等人的委婉規勸，「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兩句，分

①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宋書》卷四十三263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③ 參見《陶淵明集》4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明是在勸他們及時歸隱<sup>①</sup>。但人各有志，周續之非但沒有採納陶淵明的建議，而且他後來還依附劉宋政權，充當了其御用文人。

### （三）陶淵明隱居生活的後期

義熙十三年（417年），東晉王朝乘勝收復了北方的許多失地，取得了可喜的戰果。據《宋書》卷二《武帝紀》所載，義熙十三年正月，劉裕「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留城」；「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到洛陽。七月，至陝城，龍驤將軍王鎮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大破姚泓於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生擒泓。……」<sup>②</sup>這是東晉王朝自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地北伐，也是戰果最顯著的一次北伐。但另一方面，劉裕經過幾番征討，他也牢牢地掌握了兵權，事實上也控制了東晉王朝的實權，爲他後來的取代東晉王朝鋪平了道路。

**贈詩羊長史** 淵明這年五十三歲，該年，與他同居在南村的周旋人羊松齡奉命赴關中，淵明因作詩與之贈別。在《贈羊長史》一詩的前面，詩人有一個小序交代緣起：「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sup>③</sup>今案：這年八月，劉裕伐後秦，攻佔了長安，滅姚泓，駐軍關中，故左將軍朱齡石遣羊長史赴關中稱賀，淵明於是與羊松齡有此別。對於收復關中的失地，淵明自然是讚許的，故爾他在詩中說「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誓）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疴不獲俱」<sup>④</sup>。在這裏，詩人對於收復關中顯然是表示讚許的，且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聖賢行狀遺址，也

---

① 皇甫謐《高士傳》之丁注說：堯時許由隱居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許由不願意聽，他便跑到潁水邊去洗耳了。

②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6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③ 參見《陶淵明集》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頗多神往之意。但詩人在讚許之餘，將筆鋒一轉，拜託羊松齡在經過商山時，替他捎話給「四皓」：「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sup>①</sup>，這就表達了詩人決意隱居的意願。同時，我們從字裏行間還可以看出詩人對羊長史此次風塵奔波的一種善意相告，尤其是「肆馬無貫患」一句，雖然是取意於《四皓歌》，但也很明顯地在希望羊松齡與其「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在詩人看來，儘管關中收復了，但終究免不了朝代的變遷，因此他「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這首贈別詩體現了詩人一種矛盾的心理：詩人一方面希望天下能夠統一，早日結束分裂；另一方面他也不願意看到了東晉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作為一個晉室士族的子孫來說，淵明的心理自然是很不安寧的。

**回到舊居** 淵明在六年前（411年）移居南村，他該年又遷回了他闊別了六年的舊居，因作《還舊居》一首。此詩通篇都縈繞著一種哀惋的情調，讀之令人感慨淋漓，茲錄全詩如下。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屋邑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舊跡，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sup>②</sup>

試想：詩人對於闊別了六年的故居，今日的回來自然是不勝神往的。但故居的道路（阡陌）似乎依舊如同往昔，但那裏的村舍在僅僅六年的時間內就與往昔面目全非了，而且往日裏鄰居中的老人也很少有留存（活）下來了的。這就可以想見故居的村落凋敝的景象了，那眼前處處的廢墟自然也會令詩人不勝感傷的。在這六年中，潯陽儘管沒有遭受兵燹，但當時戰爭的創傷尚未醫治，而此後發生在其他地域的戰事尚在頻仍，這就勢必會要加重對人民的兵役、徭役與賦稅的徵收，也就會很自然地要造成詩人故居的父老所剩無幾的慘象。「步步尋舊跡，有處特依依」兩句，則更是體現了詩人一方面對故鄉具有深摯的

① 參見《陶淵明集》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5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感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故鄉當前淒涼景象的感傷。山川依舊，而昔日故鄉的恬靜的環境、曖曖的村居、茂盛的桑竹，還有昔日的鄰居耆舊，他們都不復可見了，詩人焉能不觸景生情，乃至感慨淋漓呢！他既感慨日月的流逝造成了今昔之非，他也擔心死神會很快降臨到他的頭上（因詩人當時被各種疾病纏身，加之貧病使他衰老很快），乃至使他年僅半百就離開人世。然而詩人畢竟是一個胸懷曠達的人，他隨即提醒自己放下這些念頭，暫且喝一斟酒以排遣眼前的憂傷。

**哀悼從弟仲德** 《悲從弟仲德》一詩相傳也作於該年，這是一首在哀慟失聲以後和淚寫成的作品，惜乎我們對仲德的行狀已經無法考證了，否則我們對於此詩將會理解得透徹。今謹鈔全詩如次：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座，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跡，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sup>①</sup>

如果說在《還舊居》中所描繪的「鄰老罕復遺」是詩人對故居整體印象的描寫的話，那麼，詩人在這裏對於從弟仲德夫婦雙雙亡故之後所留下的遺老孤幼的淒涼景象的描寫，便是對故居具體的淒涼景象的描繪了。在淵明的思想理念中，素來就具備了「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之一）的觀念，何況仲德與淵明之間又是「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的關係呢！因此，詩人「銜哀過舊宅」時便「悲淚應心零」了。人生確實太無常了，往昔時淵明還曾與仲德執手交談，豈能意料此番他從南村歸來，仲德卻已經離開人世了！在詩人看來，仲德的中年早逝，也是天數所定，自然難免了，而他一生的功業尚未成就卻留下了老母終日沉湎在哀慟之中，還留下兩個纔幾歲的可憐的小侄子……接著，詩人對於仲德夫婦靈位所存放的「虛室」裏的淒涼景象作了描寫。由於日子久了，流塵積滿了他們兩個的靈位；庭院裏多年旅生的野草更反襯出這屋宇的荒涼。仲德的家自然是門庭冷落以極，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只從園林中的樹木裏似乎還可依稀見出昔日的舊情。像仲德這樣杳然隨造化而逝，固然永遠不會來到這個人世了，這怎能不令詩人在故地久久徘徊，乃至感傷得熱淚盈襟呢！

淵明這次的回到故居，顯然沒有見到任何令人欣喜的氣象，他本人自然也沒有什麼好心緒。在東晉王朝行將遷滅之際，在潯陽、在淵明的故里，被那滿目淒涼的氣氛籠罩著，給人以無盡的哀傷……

義熙十四年（418年），原來被劉裕所收復的長安一帶（關中）又被赫連勃勃奪去<sup>①</sup>。但這次北伐的戰果仍然是主要的，儘管關中得而復失，但自潼關至青州一帶卻成了東晉（後來的劉宋）的疆土。此後宋、魏之間多次發動戰爭，其戰場也主要是在這一片土地上，從而使長期遭受兵燹的長江流域一帶得到了相對的安寧。在這年，劉裕加緊了對東晉王朝的篡弒，據《晉書·安帝紀》所載，「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sup>②</sup>，晉宋之易代，也就近在目前了。

**與王弘之交** 在義熙十四年，王弘出任江州刺史。據《宋書》卷十二所載，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弘少好學，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sup>③</sup>待到劉裕為鎮軍將軍時，王弘被「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sup>④</sup>。像王弘這樣年輕就步入了仕途的人，他在官場經過幾番磨煉之後，無疑會成爲一種職業性的官僚了。據《宋書·王弘傳》所載，他的出任江州刺史是在義熙十四年，而在《晉書》卷九十四中則曰是「元熙中」到任江州的。其具體記載文字如下：

刺史王弘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不

---

①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7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與《晉書》卷十《安帝紀》267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晉書》卷十《安帝紀》267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③ 參見《宋書》卷十二《王弘傳》78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④ 參見《宋書》卷十二《王弘傳》78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sup>①</sup>

但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說：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裏之間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sup>②</sup>

又說：「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sup>③</sup>。像王弘這樣的人，連顏延之都不願意理睬他，他自然不可能成爲陶淵明的好朋友。祇是淵明在晚年處在生活貧窘之中，姑且隨緣而已。

**當年的作品** 相傳淵明在這一年的作品特別多，茲就其作品的內容略作介紹。《贈長沙公》相傳作於該年。這個長沙公應該就是陶延壽（也有人說是延壽的兒子），當年，陶侃以戰功被封爲長沙郡公，其子陶夏襲其爵；陶夏死後，其侄子陶宏嗣之；陶宏死後，其子陶綽之嗣之；陶綽之死後，其子陶延壽嗣之。宋受禪後，延壽被降爲醴陵侯。又據《宋書》卷一《武帝紀》所載，義熙五年六月，席慕容「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劉裕）命兗州刺史劉藩、弟並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慎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sup>④</sup>也許陶延壽此時還立有戰功，他在義熙十四年路過潯陽，淵明作此詩相贈。詩中的小序說：「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

①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宋書》卷一《武帝紀》7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以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sup>①</sup>關於此詩的具體寫作年代，似乎也很難以確定，學界大多認爲作於義熙二年至元熙之間(406年—419年)，然竊以爲作於淵明遷居南村之期間比較近乎情理，因爲南村靠近潯陽城鎮，不似上京(園田居)偏僻，故爾容易遇上陶延壽一些。《贈長沙公》全詩以四首四言詩組成，在詩中傾訴了詩人的那種同族親情，也表達了詩人惜別的感情。

相傳《酬丁柴桑》一詩也是作於這年，丁柴桑其人行狀不明，但從《晉書·陶淵明傳》所載「既絕州郡之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云云，可以知道，當時張野等人可能邀淵明去他家飲過酒，淵明既不認識其主人，亦欣然無忤，蓋這位丁柴桑就是淵明被邀去過的一個縣令家。由於幾番飲酒，互相熟悉了，這纔有詩歌的贈答之作了。該詩由兩首四言詩組成，我們僅看其中的第一首就可以知道丁柴桑應當屬於與淵明過遇的酒友了。「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於惠百里。飡食如歸，聆善若始。」<sup>②</sup>像這樣任耳叫去的「爰來爰止」的主人，何嘗又不是詩人在「絕州郡之謁」以後隨緣去人家飲酒的寫照呢！而作爲詩人來說，他也就姑且「放歌一遇，既醉還休」<sup>③</sup>了，詩人在不顧及其他的情況下，自然也會「欣然無忤」了。

《與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相傳也是這一年的作品，此詩也似乎帶有諸人置酒邀飲的氣韻。這樣眾人在一個大墳墓前的柏樹下幕天席地地飲酒，自然也易於使人觸景生情的了。因而作者在詩中說：「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此時，地上的人與地下的人之間的距離似乎也很近了，人們也將有「未知明日事」的感慨。但對詩人來說，還是「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爲好，因爲他對於人生無常的感喟早已表達完結了。

陶集中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應該是作於義熙十四年。龐主簿即龐遵，他是淵明的故人，《晉書》載他是淵明的周旋人之一，在蕭統的《陶淵明傳》載王弘欲見淵明，就是通過他齋酒於

① 參見《陶淵明集》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半道要之而得以見面的。而王弘的出任江州刺史也是在這一年，故此詩應當作於該年，加之詩中有「僂俛六九年」一句的提示，也告訴我們此詩是作於詩人五十四歲的那年，則又為我們確定其年代找到了一個內證。再從該詩中所描寫的詩人貧寒的境況來看，王弘對淵明的接濟也似乎應當在這一年左右。至於詩中所提到的鄧治中其人，因文獻不載，只得暫付闕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對於我們瞭解詩人的生平頗有借鑒意義，且詩之通篇意境也佳，謹錄全詩如下。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sup>①</sup>

這首敘事詩概述了詩人一生坎坷的遭遇，同時也表達了詩人不怨天尤人、且又澹泊名利的情懷。對於通篇的內容，我們不準備贅述了，但其中的描寫飢餓的文字，確實值得一提，若不是有切身的饑餓生活體驗，也是斷乎寫不出這種文字來的。其中的「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四句，將那種夏日饑餓嫌日長，冬日饑餓怨夜長的切實體驗寫的極為細膩逼真。筆者也曾有過這樣的體會，尤其是人處在饑腸轆轤之時，根本就無法入睡，也就愈加覺得夜長了，特別是在寒夜饑餓之時，那種饑餓與寒冷交至的感覺，則更加使人難以忍受。

陶集中還有一首《歲暮和張常侍》，據說也是作於該年。張常侍就是張野，《蓮社高賢傳》中收有其傳記。今查《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其生平大致如次：「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同。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治州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劉遺民）尚淨業。」<sup>②</sup>看來張野並非出仕了，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6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②</sup> 參見《十八高賢傳》，《佛藏要籍選刊》第十二冊140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僅僅祇是因爲他曾經被拜散騎常侍，故有此稱而已。淵明的這首唱和詩作於嚴冬，詩的開頭就描繪了韶華易逝、歲月不饒人的境況，其中「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sup>①</sup>兩句，就將詩人老境侵身的感覺作了簡潔而又形象的描述。至於像秦穆公所說的那種「旅力既愆，我尚有之」<sup>②</sup>的情況，在淵明的現狀看來，自然會認爲是非常迂闊的了。「向夕起長風，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sup>③</sup>四句，將歲暮時嚴寒相摧的景象描摹得體貼傳神。試想：傍晚時北風刮得更加猛烈了，烏黑的層雲掩蓋住了靠近西山的落日，使整個冬夜顯得更加淒寒。值此寒氣刺骨之際，連往日裹展翅翱翔的飛鳥也不敢在野外活動了，它們翩翩飛回自己的窠巢。這個階段的詩人已經非常窮困了，他經常沒有酒喝，因而也無以籍慰他的愁腸，但有貧寒交加與人生的辛苦常縈他五內了。面對這一境況，淵明還是很看得開的，他認爲人生「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因而「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sup>④</sup>了。這就是說，人生的窮達並不是在詩人所考慮的範圍之內，而人顏的憔悴也是隨歲月的遷移所變化而來的（這些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但詩人反思自己，他那高遠的情操尚在，此時他舉步徘徊，那對人生的感慨油然而生。

在這一年中，相傳詩人所作的五篇作品裏，其中真正可以落實的祇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其餘還尚待研究，祇是姑且附在該年而已。再則，陶集中的作品，若要篇篇都落實下來，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還有不少作品剛好確定其年代，卻又被後人推翻了。但如果不按照年代理清一個歷史脈絡，則又無法瞭解詩人的思想發展歷程，因此我們祇能做到大體如是就不錯了。

劉裕在義熙十四年殺害晉安帝司馬德宗之後，419年，便改元爲元熙，立德宗的弟弟德文爲晉恭帝。

---

① 參見《陶淵明集》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尚書·秦誓》，《十三經註疏》256頁中，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九日閒居》之創作 淵明在這一年的作品不多，相傳有《九日閒居》一首。今案：《九日閒居》的內容表現了詩人在重九之日賞菊而無樽酒相慰的生活現狀，此種境況大概應當在詩人的晚年，或曰近於義熙十四年。據沈約《宋書》卷六十三所載，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後自歸。」<sup>①</sup>又《晉書》之陶傳亦載王弘在元熙中常周濟淵明酒米之乏，因而我們將《九日閒居》歸入此年，應當是比較近乎情理的。

《九日閒居》前面有一個小序，曰：「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sup>②</sup>淵明一生愛菊，其《飲酒》詩中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歷來是人們吟誦的佳句。而當此時，詩人年邁貧窘，於此良辰美景，獨缺佳釀，他對此自然是感慨良深的。《九日閒居》全詩如下：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悽  
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  
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  
榮。斂襟獨閑謔，緬焉起深情。棲遲故多誤，淹留豈無成！<sup>③</sup>

從詩中所描寫的境況來看，淵明此時應當是非常貧窘了。「性嗜酒」的詩人居然也「塵爵恥虛壘」（即酒杯裏生起了灰塵，酒壺裏也無酒可盛了，這意味著詩人許久沒有飲酒了）了，則他當時境況之艱難，也就自不待言了。本詩一開頭就將人生短暫卻又多情且貪生的矛盾給提出來了，儘管歲月對待每個人都是均衡的，但它總是在無情地流逝，然而人們總是愛好那種虛名。這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詩人幾經人生風雨以後，他對人生的虛名更能放下了，他早年在《命子》詩中所具有的那種光耀門庭的情懷顯然在減退。接著，詩人描繪了這個有花無酒的慘淡重陽的蕭瑟景象：霧露逐漸地轉寒而暖氣也正在消失，天宇中的空氣澄明而無塵滓，春天裏的燕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倒是北來的大雁還留下了它們哀惋的餘音。重九之日，坐於昔日的籬邊賞菊（作《飲酒》詩時

① 參見《宋書》392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電子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陶淵明集》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 陶淵明的歸隱期

應當也是坐於此的)，菊花依舊芬鬱，祇是家裏已無滴酒存儲，詩人因而祇能空對眼前的良辰美景了。於是，詩人整頓衣裳閑步謠吟，他在遐思往事，自然也勾起了他無限的深情。但詩人認為：他的隱居雖然在物質生活上確實帶來了不少的困難，但他並不相信他長年隱居就會一事無成。事實上，在淵明的人生中，他確實是有所失，他失去了可以得到的高官厚祿，他失去了可以享受的榮華富貴，他還失去了他所嗜好的美酒……然而淵明的失去雖然很多，但他也未嘗就無所得，他獲得了自身人格的自尊，他獲得了人生的真實義趣與價值，而其間尤為可貴者乃是他以切身的體驗創作了他獨具藝術風格的詩篇，他的作品不但千古流傳，而且愈久愈甚。如果以物質價值作為衡量的標準，淵明確實是什麼也沒有得到，他甚至失去了他唾手可得的財富；如果採用精神財富的計量標準來衡量，則淵明無疑獲得了世界上最珍貴的財富，而且還將以永恒的時間來顯現其作品巨大的藝術價值。

淵明自義熙元年的徹底歸隱，至此已閱十五個春秋，他在這十五年中，幾經遷徙，目擊時艱。其間雖不乏人生的辛苦，但他晏如處之，尤其是對待來自於官方的誘餌，他根本就不屑一顧。他始終以堅定的毅力支撐著自己，不為世間的榮利所轉移，走完了他這十五個春秋的艱難步履。這對於淵明的個人來說，他顯然付出太多，但他的付出很值得，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人格，而且也成就了自己的藝術創作，其間的不少作品成了膾炙人口的千古傳誦之作。

## 四、陶淵明的晚年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420年以後的宋晉之易代，是淵明在思想發展與藝術創作上發生很大轉變的階段，也是淵明人生的晚年階段。在這個階段裏，淵明不但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而且在藝術創作上也更具有成就了。如果用李商隱的詩來說，「天意憐芳草，人間重晚晴」，淵明的晚年確實是秋菊飄香的階段，那種人生的芬芳馥郁，在淵明這裏是可以真切地見得出的。下面，我們就淵明在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與藝術創作，來作一個粗線條的描述。

### （一）陶淵明的晚年

**晉宋易位述五柳** 420年六月，劉裕抵達京師建康，他成功地實現了他篡位的政治目的。據《晉書》卷十《恭帝紀》所載，劉裕對傅亮密授旨意，派他去諷勸晉恭帝司馬德文禪位，並將已經起草好了的詔書拿出來，讓恭帝簽署。當時，恭帝欣然說：「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sup>①</sup>。而在沈約的《宋書》卷二中則如此記載：「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sup>②</sup>儘管在沈約的筆下不免對劉裕有掩飾之辭，但晉恭帝面對當時的局勢，他不如此，又能如何！他這樣痛快地讓位，或許還能保留一個小侯王的體面，倘不如此，身家性命焉能保全？劉裕的篡位，在歷史上應該是必然的事情。但這種歷史變故對於出於東晉世家的陶淵明來說，其感覺就顯然不一樣了。在這裏，我們雖然不能說淵明是如何地忠誠司馬氏的之道統，但他作為晉室重臣的後裔，面對晉氏江山的改屬於宋，自然會不無痛心疾首之感的。

在陶集中，最富特色的那篇《五柳先生傳》，應當是作於這年左

---

① 參見《晉書》卷十《恭帝紀》26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參見《宋書》卷二《武帝紀》17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

右的作品，我們在上文中也對此作過了討論。今謹將全文鈔錄如下：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sup>①</sup>

這是一篇文字短小精悍的佳作，祇要反復誦讀，就不難見出其中反其意而用之的筆法，字裏行間，處處傲骨，語語與時抵牾，何嘗不是對宋易晉統的一種曲折的反抗！可惜蕭統、沈約爲陶淵明作傳時，首列此文，並以「時人謂之實錄」作結，這便誤導後人以爲此篇乃淵明青年時期的作品，實在良爲可憾！在這裏，我們且不說「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等描寫，純是淵明後期生活的寫照，單就其中的「無懷氏」、「葛天氏」等語，就不止是體現了詩人對上古社會充滿了向往，而且還大有不臣服於當世宋王朝的韻味在其中，它與《桃花源詩並記》中所描寫的秦氏以前的那種遺民生活的虛構，其用意應當是前後相貫通的。因而《古文觀止》的編者早已看破其中的端的，將之繫於永初中，他們實在是很有眼力的。在這裏，我們不想給詩人貼上什麼政治標籤，我們只想就文章來說明以下幾個問題：本文一開頭就交代「五柳先生」的來由，其間「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等語，分明是怨懟之辭，祇是以詼諧的筆調出之而已。我們祇要看看淵明所作的《命子》、《贈長沙公》等作品，兩相對照，就不難看出其中的破綻，詩人是那樣地尊重他的先人，又何來的「亦不詳其姓字」呢！這分明是淵明不願意接受宋代的道統，他不忍心做宋朝的子民而已。我們再看「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等語，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也足以說明詩人從義熙元年歸隱以後的十五年之中，並非是無所事事，他既保全了自己的人格，而且還創作了不少的佳作。至於「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等語，則顯然是對新建立的劉宋王朝的否定了，它曲折地表達了詩人不願意臣服劉宋的情懷。還有，文中的「性嗜舊，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的家境，則更是詩人晚年境況的真實寫照了。因此，我們將《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時間確定在晉宋易代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應該是合乎情理的了。

這篇貌似自我調侃的短文，祇要我們反復讀誦幾次，是不難發現其中所隱含的反抗精神的，因而我們無寧可以將此文視為淵明向劉宋王朝決裂的一篇宣言書。

**《讀史述》之寫作** 相傳《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詠貧士》七首也是永初元年（420年）的作品。《讀史述》屬於由九組四言敘事詩組成的作品，其內容全部是評價《史記》中的歷史人物。在這九篇作品的前面，作者以小序作了說明：「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sup>①</sup>這就給我們閱讀這組詩提供了一個線索。在作者所評介的九個歷史人物（含事件）中，第一篇是評介伯夷與叔齊的（見《伯夷列傳》），我們在上文中也曾就這個問題作過討論。詩人對於伯夷與叔齊在「天人革命」後「絕景窮居」<sup>②</sup>，是至為讚許的，他認為伯夷與叔齊的「貞風凌俗，爰感懦夫」<sup>③</sup>，也就是說他們的這種堅貞的操守，可以將懦夫也感化過來。其二篇是評介殷朝的忠臣箕子的（見《殷本紀》），詩人引用箕子的《麥秀歌》，將箕子銜冤佯狂的那種悲涼氣氛渲染得非常濃烈。第三篇是評述管仲與鮑叔的，篇中對於管仲與鮑叔之間的那種「淡美」之交作了讚美，而對於世俗的「利乖歲寒」<sup>④</sup>的利益之交作了否定。第四篇是歌頌程嬰與公孫杵臼的（見《趙世家》），他們兩人誓

---

① 參見《陶淵明集》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同生死以存趙氏孤兒的事跡，實在感人太深了<sup>①</sup>。對於這兩個仁人君子，詩人窮極贊詞曰：「令德孔聞，百代見紀」<sup>②</sup>。事實上，程嬰與公孫杵臼的這種爲了保全趙氏孤兒的自我犧牲精神，在淵明那個年代就顯得尤爲可貴了。第五篇是對仲尼七十二弟子的評價（見《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其中對於顏回等孔門賢人抱以讚許的態度。第六篇爲評介屈原與賈誼的（見《屈原賈生列傳》），其中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賈誼忠而被讒的人生經歷，在太史公筆下就夠動人的了。在此，詩人以「嗟乎二賢，逢世多疑」<sup>③</sup>兩句，對那種不公平的世道予以了否定。第七篇是評介韓非的（見《老莊申韓列傳》），詩人對於韓非的「以

---

① 關於程嬰與公孫杵臼的事跡，《史記》有非常詳悉的記載，茲錄如下：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大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以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而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併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史記·趙世家》）

② 參見《陶淵明集》1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1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文自殘」<sup>①</sup>頗表同情，對於韓非的《說難》寫得那樣出色，而他自己的遊說卻不免於死，詩人也不無歎惋，同時也暗寓了韓非因不能甘於隱居，故遭此厄也是必然的。第八篇是歌頌西漢時魯地的兩個儒生的（見《劉敬叔孫通列傳》）。劉邦初得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劉邦很討厭這件事，這時，叔孫通上言定朝儀，於是在魯地徵集三十多個儒生，獨有二人不願意合作，他們被叔孫通嘲笑為不知時變的腐儒。但在淵明這裏卻不這樣看，他對這二儒「逝然不顧，被褐幽居」<sup>②</sup>的精神大可嘉許，大抵此中也隱含了淵明的不見用於宋之意。第九篇是歌頌西漢時張摯的（見《張釋之馮唐列傳》）。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後去職歸隱，詩人對於他「寢跡窮年」的精神大為讚揚，並慨歎「誰知此意」[13]。

從以上九篇作品中來看，其中對於伯夷與叔齊、魯地的二儒、張摯之評價，側重於其歸隱之情；對於箕子、屈原與賈誼之評價，則側重在其忠而遭謗的際遇；對於鮑叔、管仲與程嬰、公孫杵臼之評價，則側重在人生之知遇及其為人之義道。在這九篇作品中，似乎使我們不難見出詩人在宋晉易代後的沉重心情。

**關於《扇上畫贊》** 《扇上畫贊》相傳也作於永初元年（420年）。扇面畫雖然盛行於趙宋，然其濫觴則遠在兩宋之前。在陶淵明這裏，共對扇面上的八組人物畫作了讚頌。而這八組人物畫所畫都是隱者，可見《扇上畫贊》實質上是對隱者的一曲讚歌。組詩均為四言，標題下開列了八組隱者的名字，然後逐一贊之。第一組是「荷蓀丈人」，語出《論語·微子》，詩人的贊詞共有八句；第二組是長沮、桀溺，亦出自《論語》，詩人的贊詞共八句；第三組是戰國時的陳仲子，其贊詞共四句；第四組是西漢時的張摯，其贊詞也是四句；第五組是漢代的丙曼容，其贊詞為四句；第六組為東漢時的劉敬，其贊詞四句；第七組是東漢時的謝包，其贊詞四句；第八組為周陽珪，此人的行狀

① 參見《陶淵明集》1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121頁~12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不詳，但從其贊詞來看，他作為隱者也是無疑的了。淵明的這一系列扇面畫，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群隱圖了，我們從詩人對隱者的極力謳歌，也可以發現他對隱居生活極力讚賞的態度，尤其是在宋替晉祚之時，詩人的這種人生態度就更加鮮明了。《扇上畫贊》的最後八句為「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sup>①</sup>這顯然是對全詩的一個總結，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志慕隱棲的人生尚好。在這裏，詩人雖然引用了《陳風·衡門》中的詩句<sup>②</sup>，但其用意卻在於表達自己對於隱居生活的自樂情懷。尤其是卒章的「緬懷千載，託契孤遊」兩句，使那種與古代隱者同樂的情趣便躍然紙上，而作為詩人來說，宋替晉祚，此時不隱更待何時！

**《詠貧士》之創作** 《詠貧士》七首相傳也是這年的作品。在這七首五言組詩當中，第一首敘述貧士的孤高情懷，第二首描寫了詩人當時的貧窘狀況，並引出了以下五首對貧士謳歌的詩作。第三至第七首分別歌頌了歷代能夠守節的貧士。整個組詩儼然成為兩個大部分，且首尾呼應形成了一個渾然的整體，則肯定是一個歷史時期創作出來的。組詩的第一首可以視為序曲，詩人採用象徵的手法，寫出隱者的守貧，就如「孤雲」一樣，「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sup>③</sup>。這相對於一個守貧的隱者來說，就必須具有這樣一種能耐得住寂寞與清貧的意志了，否則，要守貧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詩人在這首詩的最後四句說：「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sup>④</sup>在這裏，詩人一點也不掩飾他守貧的寂寞與清苦，但他具有那樣一種堅定不移的意志，具有那樣一種能耐寂寞的心境，因而他能「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sup>⑤</sup>。

《詠貧士》之二頗可以體現詩人當時的境遇及其志趣，可以說與

① 參見《陶淵明集》1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詩經·衡門》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③ 參見《陶淵明集》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王勃《滕王閣序》，《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之814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異曲同工了，故錄全詩如下：

淒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  
無餘瀝，闕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厄，  
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sup>①</sup>。

這是寫在一個寒冷的歲末之作品，在嚴寒的冬季節裏，難得有一個晴朗的天氣，詩人於是「擁褐曝前軒」了（即在窗戶前面曬太陽）。這時，詩人的園圃裏已經沒有一種開花的植物了，處處枯枝交錯，自然給人一種滿目淒涼之感。由於飢寒的逼迫，無論做什麼事都會無精打采的，因而詩人儘管選擇了滿座的書籍來看，可轉眼間日午已過，就是無心去研閱它們。淵明認為他的隱居雖然與孔子當年的厄陳絕糧不可相比，但他在私下裏也不可能沒有一絲怨憤了。那麼，依靠什麼來慰藉詩人此時貧寒寂寞的情懷呢？那就祇有依賴自古以來這麼多守貧而不墜志的聖賢來作為榜樣了。在這裏，「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兩句正好與第七首中的「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遙相呼應，使得整個組詩形成了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

《詠貧士》自第三首起就開始歌頌歷代守節固窮的聖賢了。在第三首中，詩人對於榮啟期與孔門弟子原憲的守貧作了歌頌。但此詩的最後六句似乎是由古及今，轉而對詩人的固窮之志所作的一種表達。尤其是裏面的「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sup>②</sup>四句，既描寫了詩人當時的貧苦狀況，又將詩人守貧的志趣作了明朗的表達。第四首歌頌了古之貧士黔婁。黔婁一生固窮守節，乃至死後下葬尚且衣不蔽體，但他「非道故無憂」<sup>③</sup>。第五首謳歌了袁安、阮公的安貧守節的事跡，其間「貧富常交戰，道勝無威顏」<sup>④</sup>二句，何嘗又不體現了詩人在隱居守貧的時候的矛盾心情，由於最後還是「道」戰勝了人的貪圖富貴的天性，乃達到了安貧守節的目的。第六首是對東漢張仲蔚安貧的歌頌，詩的最後兩句「人事固以拙，聊得長

① 參見《陶淵明集》6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6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相從」<sup>①</sup>，表達了詩人既拙於人事，決意追隨古代的守貧聖賢以實現其志向。第七首是對東漢黃子廉守貧的歌頌（其間還歌頌了惠孫），詩的卒章兩個句子與開頭的詩句相照應，使整個組詩成了一曲謳歌守窮貧士的和諧樂章。

淵明的謳歌貧士，其間自然不無孔孟的儒家思想。記得我兒時讀《孟子》，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用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受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受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之，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sup>②</sup>

若在孔子則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見，孔孟中的這種「固窮」的思想對淵明的影響實在是貫徹終始的。而在宋替晉祚之時，他的這種氣節也就顯得尤為可貴了。

永初二年（421年）九月，劉裕將年僅三十六歲的晉恭帝殺害了。對此，《晉書·恭帝紀》曰：「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後兄叔度請后，有問，兵人踰垣而入，弑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sup>③</sup>而在沈約

① 參見《陶淵明集》7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孟子·告子上》，《十三經註疏》2725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 參見《晉書》26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的《宋書》卷三則說：「九月丁丑，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於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晉禮。」<sup>①</sup>事實上，晉恭帝處在覆巢之下，他的被殺也祇是遲早的事情了。

晉恭帝被弒這件事對於淵明來說，其震撼尤大，他作於這一年的《擬古》、《述酒》等作，其中就寄寓了深沉的隱慟。其次作於這年的《桃花源詩並記》，文中所假托的桃源烏托邦式的社會，實質上就是對劉宋政權的根本否定。又如作於該年左右的《與子儼等疏》一文，其中「自謂是羲皇上人」，無疑也是他不臣服於劉宋的一種曲折表露。此外，淵明在該年還作有《遊斜川》、《於王撫軍座送客》等詩。下面，我們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將之逐一介紹。

**《遊斜川》之創作** 《遊斜川》應當作於永初二年的正月初五。詩人在《小序》中說：「辛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間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sup>②</sup>據學界考證，斜川位於現在的江西鄱陽湖東面的都昌縣附近的湖泊中。今案，此說殆訛也，若果如此，則此地離廬山至少有六十公里，那麼「南阜」（廬山）、曾城（相傳為天子障）等山脈顯然是不能望見的了，則與所記大不相符。若剋實而論，斜川應當距詩人所居住的上京有一段距離，但又必須是靠近長江或者鄱陽湖的一個自然風景區。如果說在義熙年間，淵明的隱居尚不完全乏衣食、還可以保持住自己的高潔情操尤其是他的閑情逸致的話，則永初之變勢必會使淵明那寧靜恬淡的心態遭到破壞，使他為之一轉而作《五柳先生傳》等，顯現其傲然風骨。但淵明在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之餘，還必須尋找聊以慰藉之途，加之他晚年的貧窘也在折騰詩人，故爾詩人此次的斜川之遊，亦大抵有苦中作樂的韻味。

① 參見《宋書》21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

② 參見《陶淵明集》70頁～7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中國人是十分講究過新年的，在新年初五那天，也正是萬象更新之際，淵明與「二三鄰曲」作了此次的斜川之遊。據小序的交代來看，「臨長流，望曾城」，斜川這個風景秀麗的地方一定是處在長江或鄱陽湖濱且又靠近廬山之處。此時，水中的游魚在跳躍，水面的鷗鳥在翩然飛翔，眼前的廬山固然是非常熟悉的景致了，而那曾城旁邊卻沒有任何起伏的山巒相連，僅此一峰秀聳於水濱的空中，頗使人聯想起崑崙山上的層城了<sup>①</sup>，那是傳說中神僊居住的地方。時值新春佳節，面臨優美的自然風景，詩人自然會覺得欣然應對尚不足以抒懷，於是乎率爾賦詩以暢志。他因感歎歲月的流逝，嗟傷人生之不可永年，於是令同遊人各自記錄其年紀籍貫，以作為這次壯游的歷史記載。惟其如此，學界有人將作者此次的出遊與王羲之的蘭亭聚會視為同類活動，這自然也不無道理。至於那些同遊人，是並無文獻記載的，但從當時與陶淵明往來的人來看，也莫過是張野、羊松齡、龐遵這些人罷了。

《遊斜川》全詩如下：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天和氣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鮪，閒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sup>②</sup>

綜觀全詩，那種貧老之年的新春之樂，自然是對詩人當下困窘的家境及其苦悶的心情的一種稀釋。這一方面因為淵明接受的儒家文化教養與他作為東晉士族世家子弟的身份，使他在宋晉易代之時平添了不少的煩惱，另一方面也因為詩人晚年貧窘的境遇更加增添其淒涼的心緒。惟其如此，斜川之遊可以說是一種人生困厄中的暫尋之樂。我們從「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兩句，就不難見出詩人的這種情緒，

---

<sup>①</sup> 《水經註》卷一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參見湖南嶽麓書社 1995 年版《水經註》1 頁。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7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本來在新年之際應該是心情愉快的，但在詩人的心目中卻有「行歸休」的感覺，這顯然就帶有一種自尋暫得之樂的沉味了。正是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詩人纔有這次及時行樂的斜川之游。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淵明在三次出仕與歸隱的磨礪中，不但形成了他獨自的人生理念，而且也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因而在詩人筆下的斜川風景，則是那樣地澄明剔透，令人怡情悅目。你看：在那晴和的天氣裏，明澄剔透的天空是那樣地高遠，詩人與鄰曲依次列坐在那悠然的水流邊。緩緩流動的清波泛起淺淺的漣漪，水中的游魚在縱情歡暢地蹦跳；而在那幽深的山谷裏不時傳來鷗鳥婉轉的叫聲。詩人極目遠方的湖澤，他望見了在遠處秀聳的曾丘，那山峰雖然沒有傳說中的層城的九重秀色，但詩人回顧四週，卻沒有一座高山可以與之媲美的了。在這清和的天氣裏，在這優美的大自然環境中，詩人提起酒壺向各位同遊的伙伴不停地敬酒，他認為人生中這樣賞心悅目的日子並不會太多，還不如及時行樂，舉酒以澆滅這千載的憂愁，休去再過問明日的事如何了。

《遊斜川》是陶集中寫景的名篇，它同時也是詩人晚年中描寫山水之樂詩作中的孤篇。詩中的「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等句，體現了詩人一貫的審美情趣，也成了中國寫景篇什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擬古》之創作** 《擬古》九首也應當是作於永初二年的仲春。因為劉裕的逼晉恭帝禪位是在永初元年的六月，而此詩中的「仲春遘時雨」（《擬古》之二）與「春風扇微和」（《擬古》之七）等句，則應當是永初二年的事情了。再讀第九首中的「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則顯然是宋晉易代之後的作品了。這個組詩由九首五言詩構成，其內容主要體現了詩人在宋替晉祚之後的沉思與苦悶，殆是在永初二年的春季內吟哦而成的。

其中的第一首以一種近乎寓言的形式來表達詩人對於「不忠厚」的諸少年的鄙棄。事實上詩人在這一期間內並未遠行，因而他也應當沒有那個對「窗下蘭」與「堂前柳」的托付，而僅僅祇是借此事來寄寓詩人對宋晉易代時昔日的晉臣馳驚宋主的鄙視，這纔是「蘭枯柳亦

衰，遂令此言負」<sup>①</sup>的寓意所在，從而也引發了詩人「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的慨歎。

第二首詩借三國時田疇的歷史典故來寄寓詩人的感懷。永初元年，劉裕逼晉恭帝禪位以後，將之貶為零陵王，以兵看守，使之與外面的信息隔絕，這種境況頗與東漢末年董卓廢漢少帝為弘農王相似。關於田疇的行狀，我們在剖析《桃花源詩並記》時將會涉及到，故首先將之列出。《三國志》卷十一《田疇傳》載「初平元年（190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此時田疇作為幽州牧劉虞的使節，赴長安奔問。詔拜田疇為騎都尉，田疇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待到田疇歸來，劉虞已經被公孫瓚所害，田疇謁祭劉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大怒，購得田疇以後，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此時，有人遊說公孫瓚說：「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公孫瓚纔將田疇釋放。「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sup>②</sup>田疇的事跡被有的學者認為是詩人創作《桃花源詩並記》的原型，其實也未見得完全如此，我們將在下文中具體地來討論。而在此詩中，詩人對於田疇的仰慕之至，至少可以使我們發現詩人當時是何等地企盼世間能有田疇這樣的人物出現，他也希望田疇這樣的精神能夠在當時保持下來。

第三首詩大概是詩人見春燕飛回其草廬的舊巢時而有所感慨，其弦外之音是說：春燕尚且棄舊居，人焉不能如此！在本詩中，詩人描寫春雷震響，萬物復蘇的景象頗為生動，其中「眾蛰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sup>③</sup>幾句，尤為清新活潑，耐人涵詠。

第四首描寫詩人登樓遠眺時的感懷，詩人面對滿目河山，產生了懷古之情：自古爭奪功名之士在這塊土地上進行了無休止的角逐（自然也包含了宋晉易代），此事使淵明感慨萬端。他認為人生百年之後，

① 參見《陶淵明集》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三國志》340頁～34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誰都得拋棄功名而歸葬北邙<sup>①</sup>，而最終墓地上的松柏又將被別人砍伐，其墓基也將傾頹而無從認識墓主。詩人因此而感慨人生，道出「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sup>②</sup>。

第五首詩描寫了一位高人，他儘管處在「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sup>③</sup>的困境中，但他仍然「常有好容顏」<sup>④</sup>，這就使我們不由得想起了《五柳先生傳》中的「簞瓢屢空，晏如也」的人生境界來了。顯然，詩人筆下的這位高人的情操，有大半是取他自己作為原型的，且「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sup>⑤</sup>兩句，也表達了詩人「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的情操。詩中「松柏夾路生，白雲宿簷端」<sup>⑥</sup>兩句寫景，雖然著墨不多，但那種隱者居處的氣氛卻脫然而出，自是不凡之筆。

第六首詩的思想比較隱晦，從詩意來看，詩人對於那些崇尚浮談而不務實際的作風似乎頗為反對，而他所讚賞的是「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sup>⑦</sup>的精神。

第七首詩的思想也比較隱晦，但從詩中所描寫的佳人太息於「皎皎雲間月，灼灼叶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sup>⑧</sup>來看，似乎既可以理解為人生美景不長，韶華易逝；又可以理解為世間美好的事物並不長住，其間的宋替晉祚似乎也是如此。

第八首詩寫少年的壯游。我們從詩人有限的生平資料來看，他一生的足跡似乎並未到過張掖與幽州（二處均在北方，當時的東晉統治的勢力並未達到那些地方，後來劉裕在義熙十二、十三年北伐卻到了這些地區，但此時詩人早就隱居了，他在《贈羊長史》中還有「負疴不獲俱」的慨歎，足

---

① 北邙即北邙山，在河南洛陽城外，是當年的官方墓地，漢、魏、晉的君臣的墓葬多在此地。詩人這裏泛指歸葬的墳墓。

②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⑥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⑦ 參見《陶淵明集》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⑧ 參見《陶淵明集》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見他並沒有去過北方)。詩中的「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sup>①</sup>似頗有深意，其中體現了詩人對伯夷叔齊的那種「義而不餐周粟」精神的讚賞，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希望能有荊軻式的人物來完成「刺秦王」歷史使命。再從詩人將伯牙與莊周視為他的知音來看，其間似乎也隱含了詩人當時的苦衷無處傾訴的鬱悶（伯牙因知音子期死而不復鼓琴，莊子因友人惠施死而不復談論）。

第九首詩是人們所常稱引以體現詩人在宋晉易代後的痛苦心情的例證，其中「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知山河改」<sup>②</sup>，也是學界所公認的詩人對於宋替晉祚的一種影射。詩中對於桑樹因遭洪水而「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sup>③</sup>，發表感慨說：「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sup>④</sup>。有人認為這是隱喻晉恭帝本來就是劉裕所立的，因而他的遭禍，似乎也是必然的，這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擬古》九首是永初二年春季所作的組詩，大抵詩人在這一時期內心情十分苦悶，故爾有感而發，即興作詩，集累而成此九首。其中的主旋律不外乎是對於東晉覆亡的感傷，對於高潔耿介情懷的謳歌，對於人間與世事無常的感歎。

**桃花源的構擬** 《桃花源詩並記》也應當是作於永初二年的春天，這篇作品由《記》與《詩》兩個部分組成，誠為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陳寅恪先生對此篇作品作了考證，他認為這篇作品中的材料的主要根據，是來自於《贈羊長史》一詩中所說，由征西將佐歸來後所談的西北人民逃避苻堅暴虐的情形，而其中的理想成分，則與《擬古》之二中追慕田疇的事跡相同。今案：這種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見得全然如此。其一，詩人在本篇中將時間確定在晉太元中，而隻字不言劉宋，其實，東晉自太元十九年（384年）後的司馬道子之亂以後，基本上就一蹶不振了，其後的東晉王朝基本上是名存實亡的，而詩人在這裏標明太元，其中自然不無對東晉盛年的一種懷舊心

① 參見《陶淵明集》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理。也就是說詩人很想回到東晉太元年間的那個時代，也祇有在那個時代裏纔可以找到避秦的處所——桃花源。事實上，詩人從義熙的隱居以來，其家境每況愈下，宋替晉祚以後，他恐怕連維持原來的那種隱居生活也困難了。

其二，詩人將桃花源的地點確定在湖南的武陵（今湖南常德桃源縣），似乎也值得我們去思考。從有關的歷史文獻來看，詩人根本就沒有去過桃源，如果要說去過，恐怕還祇有他的祖先陶侃去過。《晉書》卷六十六載陶侃在出擊杜弼時，到過湘城，至於「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sup>①</sup>時，出擊者是陶侃的部下鄭攀及陶延。因而我們最多只能說陶侃去過武陵，這從陶侃的任南蠻校尉這一職務來看，他似乎也應當真正去過武陵。而其中最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的還是陶侃屬於「溪人」這個線索，考其籍里，陶侃的出生地在鄱陽，這也與武陵毫無關係；但他作為「溪人」，這個在當時作為少數民族（或曰少數民族部落）的發祥地倒確實是在武陵的。今案，在漢代曾置「溪州」，其轄區含武陵、沅陵、遷陵縣等地。而王貢所說的「五谿夷」，其「五谿」也是指武陵那一帶地域。今查《水經註》卷三十七，其中「沅水」部分有「武陵有五谿，謂雄谿、楠谿、無谿、酉谿、辰谿其一焉。夾谿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谿蠻』也。」<sup>②</sup>看來，陶侃雖然出生在鄱陽，但他的祖先畢竟是在武陵的，他的家族也應當是由武陵遷徙過來的。淵明在這裏將地址標明為武陵，蓋其中既有當時那裏的交通落後、王權難以實施到那個尚未開發的地方之原因；但也不可否認其中還包含有對他祖先的功業、對昔日榮耀的陶氏宗族之懷舊情緒。至於作品中「避秦」這個觀念，則顯然是詩人在不願意接受劉宋政權這個現實之時，而另外到精神領域裏構築起一個理想世界，以之來釋放他對於殘酷的現實的痛苦心情。這一理想世界的虛構，與田疇的故事並無多大的關係，且其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① 參見《晉書》1772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 參見《水經註》554 頁，湖南嶽麓書社 1995 年版。

等景物描寫更與北方毫無關係，它與詩人在《歸園田居》裏的所描寫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的景致倒是並無二致。尤其是夾岸桃花的景色，依稀江南風景，也與詩人家鄉潯陽的風景無異，對於藝術想象力如此豐富的詩人來說，構想這樣一個桃源僊境也是毫無必要到田疇那裏去取其原型的了。我們最多只能說田疇的「入徐無山中」的事跡，對於啟發詩人的創作靈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從而促使詩人創造了桃源僊境這個烏托邦社會。《桃花源記》中還有一個南陽劉子驥，這也是確有其人的。《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曰：「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驥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隩，一隩閉，一隩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隩中皆僊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sup>①</sup>大概劉子驥所去的衡山石隩，就是今天南嶽的靈芝泉了。像劉子驥這樣確有其人其事者，未嘗不也成了淵明《桃花源記》創作的最貼近的原型了麼！

在相傳為淵明所作的《搜神後記》卷一中也收有「桃花源」一文，但《搜神後記》之作爲陶淵明的著作，在清代以前就被學界所否定過，<sup>②</sup>在此，我們姑且不去贅談此事了。《桃花源記》確實是一篇難得的佳構，今謹錄全文如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

---

① 參見《晉書》2447頁～2448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② 《搜神後記》之非陶淵明所作，清人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正》一書中的「小說家類三」《搜神後記》十卷下的「提要」中說：「舊本題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注『漁人姓黃名道真』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跡，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偽托，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誌》著錄，已稱陶潛，則贗撰嫁人，其來久矣。」參見《搜神後記》14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sup>①</sup>

像這樣一種沒有世間的爭奪殺伐，沒有那種強加給人們的制度文為的社會，在那里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且地土肥美，人民豐衣足食，這確實是淵明人生中所至為向往的。其實，打他自義熙元年歸隱作《歸園田居》，甚至還可以提前到他作《飲酒》那個組詩時，詩人就在執著地向往著這樣一種社會模式。在詩人隱居的早期，雖然也稱貧苦，但他畢竟還能達到顏延之所說的那種「祿同下士，爵等上農」的水平，而在詩人的晚年，則家境每況愈下，他乃至「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了。儘管詩人具有「固窮」的氣節，但無奈清貧生活竟然使他「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了。顯然，淵明在入宋以後，其家境已經使他「悠然」不起來了，加之宋替晉祚，他作為東晉士族世家子弟的地位只恐也難以保住了，至少其族人陶延壽就被遷為醴陵侯了，更不遑論淵明這樣的陶氏遠裔了。其間雖然也有顏延之、王弘對他的周濟，但對於極具自尊且悟性極高的淵明來說，他何嘗又不是委曲從之呢？殘酷的現實迫使詩人祇能通過藝術的創作來實現他的這種心理欲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76頁～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求，這應該是《桃花源記》所創作的最直接動因了。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認為，文學創作就如「在虛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創造出那種我們叫做『白日夢』的東西來。」<sup>①</sup>雖然，弗洛伊德對藝術創作這種精神活動的詮釋未見得全中肯，但他至少從某個側面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沒有幻想、沒有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是不可能創作出藝術作品來的。筆者尋常誨諸生時也說過：文學可以通過藝術的手段來彌補現實生活中的不足、甚至是空白，也是人們對現實生活所採取的一種以曲折的方式來表達的毀譽。我們姑且這樣來評價《桃花源記》，或許也有幾分中肯之處。

《桃花源詩》自然也是難得的佳詩，謹將全詩鈔錄如下。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侵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sup>②</sup>

關於詩中所描寫桃源洞如何進出的文字，我們姑且不去評論，而詩人對於洞內的社會生活的描繪，乃是全篇的重點所在。詩中的「相命肆農耕」的思想，早在詩人歸隱之前就提出來過，其詩作《勸農》的整篇文章，幾乎就是表達的這樣一種審美意象。而那種和諧地互相勉勵農作，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sup>③</sup>的和諧的人際關係，自然是詩人向往已久的理想的社會模式。「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數句，描寫了桃源洞

---

① 參見弗洛伊德《創作家與白日夢》，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現代西方文論選》140 頁。

② 參見《陶淵明集》7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③ 清人沉德潛在《古詩源》卷一中入選的古《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有何哉！」（中華書局 1963 年版《古詩源》1 頁）在淵明這首詩裏，很顯然地引用了這個典故。

內自由耕種、自由收穫，沒有官方下達的種植指標，沒有官方苛責賦稅的慘象，洞中的人家也不常相往來（如《老子》所說的「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於彼此之間可以聽到雞犬的叫聲。這種理想的社會模式在詩人作《歸園田居》之一時，就已經構就了雛形，我們在上文中也作了適當的剖析。「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兩句，其中自然包含了一種江山無改、道統不變的思想，這也是詩人在不願意接受劉宋政權而又無可奈何之情況下而形諸文字的。下面幾句詩將洞中的人們長幼歡顏、不用曆法、也無須使用世間的人們互相算計的機巧心，那種理想社會是詩人經過了太元以後長期動蕩不安的現實以後（其間自然不無各種人格卑下、互相傾軋、互相殺奪的種種觸目驚心的現象），纔在自己的心靈深處找到了這樣一個「理想國」，為自己的心靈營造了一個逃避風浪的「避風港」。其中曆法用以紀年，這也就勢必要牽涉到年號了，而年號這玩藝又具有極強的政治道統意味，詩人僅僅從太元以來，就經歷了隆安、義熙、元熙、永初四種年號，這自然也意味著四次大的政治變故。此時的詩人可謂動亂也看膩了，篡位也看膩了，他再也不希望社會這樣動蕩下去了。其中「于何勞智慧」一句，既具有《老子》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sup>①</sup>的思想。但更具有《莊子·胠篋》中的那種思想：「是故棄聖絕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掎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sup>②</sup>那種去掉了虛偽的制度文為之後的淳朴的民風，自然成了詩人所向往以久的理想社會。可是，詩人卻偏偏又遭逢了這種每況愈下的亂世，故爾他祇有通過藝術的手段來將他心靈中的那種美好社會復現於世。固然，這中間也帶有很濃厚的老莊思想，老莊思想自然也是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自古以來，

① 參見《老子》第三章，《二十二子》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參見《莊子·胠篋》，《二十二子》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中國文人的入世，就採用孔孟的儒家思想來處世；如果出世，則以老莊的思想來調節心理，二者之間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國文人的一種傳統理念。

《桃花源詩並記》在陶集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篇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種永恆的藝術意境：「世外桃源」不止是成了後世隱居地的代名詞，也成了後世藝術創作的題材。唐人王維所作《桃源行》，就是直接取材於這篇作品；還有宋元以後的山水畫，其間多得諸此篇作品中的那種逸氣，例如宋人巨然的《秋山問道圖》、元人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盛懋的《秋遊高士圖》等，無不從《桃花源詩並記》中汲取了無窮的藝術創作源泉。可見，一部藝術作品，尤其是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它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往往是超越時空的。

**《述酒》之寫作** 《述酒》一詩寫得比較隱曲，人們一般難以理解，經過南宋湯漢註釋為哀零陵王以來，歷代對它也多有闡發，今其詩意大體可曉。義熙二年九月，劉裕以毒酒授張禕，使鳩零陵王（晉恭帝），而禕自飲而卒。既而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淵明之《述酒》，大概就是為了此事而作。全詩寫得頗為費解，但詩人對於晉恭帝被害後「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sup>①</sup>，那份忠誠情愫是溢之言表的。對於晉恭帝的被害，詩人愛莫能助，但有「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sup>②</sup>的慰藉之語了。

**《於王撫軍座送客》之寫作** 《於王撫軍座送客》一詩，應當是作於永初二年。當時，王弘為撫軍將軍，領江州刺史，故謂王撫軍。永初二年，庾登之為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為豫樟太守，將赴郡；因此王弘餞庾登之與謝瞻於湓口。時淵明亦在坐，故有是篇之作<sup>③</sup>。

① 參見《陶淵明集》7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文選》卷二十收有謝瞻的餞別作品，題為「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樟太守，庾被征還東」（中華書局1977年版《文選》294頁上）。在這裏，謝瞻開列了王、庾的名字，卻沒有開列陶淵明的名字。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認為：謝瞻在序中未開列陶淵明的名字，是因宋本有而今本奪去。案：謝瞻卒於永初三年，此詩應當作於永初二年。

這首詩應當作於暮秋季節，詩人此日登高餞別，日將夕矣，但見「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邈遠，風水互乖違」<sup>①</sup>，這就不得不使詩人感歎人生既有歡聚之樂，同時也勢必會有離散之悲的自然規律了。值此主客離別之際，落日已經幻起了一重餘輝，詩人乃「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遷」<sup>②</sup>。

**《與子儼等疏》之寫作** 相傳淵明的《與子儼等疏》也是作於永初二年。但有的學者認為是作於義熙十一年，是年淵明五十一歲，以其《疏》文中有「吾年過五十」之語，又取陸游《劍南詩稿》中「讀陶淵明詩」部分為證<sup>③</sup>，但此說似乎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今案：《與子儼等疏》必然作於淵明的五十歲之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戒子之句有「濟北汜（一本作『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sup>④</sup>之句，若此文作於義熙間，淵明在本朝是絕不會稱「晉時」的，故知此文之作，必在永初年間了。但其最下的年限又必須在淵明六十歲以前（424年前），永初二年，淵明正好五十七歲，蓋此文應當作於420年～421年之間，故暫將之放在這年。且本文一開頭就有「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sup>⑤</sup>之句，因而本文就具有很強的遺囑的屬性，其寫作時間也一定在詩人的晚年了。

這篇《疏》文（實質上是遺囑），一開篇就向他的五個兒子交代了「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的人生規律。接著詩人介紹了他這五十多年的事跡與其個人的人生尚好，詩人毫無自我掩飾地說：「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sup>⑥</sup>惟其如此，詩人認為他久在官場，「必貽俗患」，故他辭官歸隱。也由於這樣，便使得家境日益貧困，「使汝等幼而飢寒」，這些樸質的文字，使我們不難從中見出詩人的親子之愛的情懷來。接著，淵明介紹

① 參見《陶淵明集》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逯欽立註《陶淵明集》28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 參見《陶淵明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⑥ 參見《陶淵明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他的人生尚好曰：「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sup>①</sup>顯然，這段文字與《五柳先生傳》中的內容是完全可以互為表裏的，可以想見這兩篇文章的寫作，其時間的前後相去應當不遠。詩人由於受這種人生尚好所支配，使他不可能再在當年的官場混下去，而他又不可能經紀好自己的農莊，因而他祇能做一個好詩人，這也是我們在上文中所討論過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這類濃富人類情感的精神產品，它要求創造者祇能以一顆純潔的心來對待藝術，這自然也不是那些工於心計者可以沾邊的了。

《疏》文接著敘述了詩人歸隱以後，家境每況愈下，而他自己也日益衰老，家裏的程氏妹、從弟敬遠、仲德等人也相繼去世，更兼詩人當時疾病纏身，依靠醫藥來維持。值此老病家貧之際，淵明恐大去在即，來不及向兒子們作一個交代，故有是篇之囑。從淵明對兒子們所寄托的希望來看，他主要是希望他的五個兒子能團結一致而不分裂，其中的「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等句，其中似乎還隱含了淵明擔心他死後陶儼不能與他的四個異母弟和睦相處之意。如果按照淵明的為人來看，程氏妹是他的異母妹，淵明將之視為同生；敬遠、仲德是他的從弟，淵明將之視同手足。在淵明看來，人生「落地為兄弟」（《雜詩》之一），因而他的待人是仁義靄如的；且他待子，也不無自責之語，諸如「使汝等幼而飢寒」、「汝等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等語，足可見出這位老病蒼然的慈父的那樣一種不勝內疚的心情了。他自愧沒有讓兒子過上<sup>②</sup>幸福的生活，他更擔心自己死後兒子之間不和，造成家庭分裂，致使本來就不景氣的陶家雪上加霜……凡此種種，誠如朱光潛先生所評述的，淵明就是這樣一個富於情感的人，他的命運決定了他祇能做詩人，加上他耿介的品性與極高的才性又決定了他可以成為第一流的詩人。

---

① 參見《陶淵明集》1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宋書》卷三、卷四，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21頁～23頁。

永初三年（422年）是劉裕弑晉恭帝的第二年，也是他執掌劉宋天下的最後一年，這年五月癸亥，劉裕也終歸壽終正寢了。他的兒子宋少帝劉義符即位，至來年改元景平。淵明這年五十八歲，我們從他的《與儼等疏》中已大略知道他此時的境況不佳了。晚年的貧窘、身體的多病、對於世事的感念，使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過得並不順心。

423年，宋少帝劉義符改元「景平」，在這年二月，富陽人孫法光造反，對山陰一帶進行騷擾，被山陰令陸劭擊敗。三月，北魏發動了對劉宋北方領土的進攻，致使司州（治洛陽）全部、青州、兗州、豫州大部被北魏佔領；四月，檀道濟率兵北伐<sup>①</sup>。淵明這年五十九歲，在這一年裏，他的好友顏延之出任始安郡，在路過潯陽的這段時間內，幾乎每天都到淵明家去飲酒，且延之在與淵明分手時，還特意留下二萬錢給他<sup>②</sup>。顏延之的此次來潯陽幫助陶淵明，對於家境日益貧困的淵明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了，使得情緒日益低落的詩人從該年起，又略微有了轉機。

**關於《答龐參軍》** 相傳淵明在這年作有兩首《答龐參軍》的詩，其中第一首是五言詩，作於龐參軍的出任之時，應當是在這年的春天；第二首是四言詩，作於這年的冬天。對於久不從事詩文創作的淵明來說，這兩首贈別的作品固然是他晚年難得的佳作了。至於龐參軍為何許人，這也還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他應當與我們在上面所說的龐主簿不是一個人，他與淵明之間也祇是鄰居關係。而龐參軍非但與淵明趣味相投，而且還擅長詩歌唱和，淵明的這兩首答詩，都是鍼

---

<sup>①</sup> 參見《宋書》卷四《少帝紀》23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

<sup>②</sup> 對於顏延之的出任始安郡，有人認為是在424年，其實不然。據《宋書》卷三十三《顏延之傳》所載，「少帝即位，以為正員外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宋少帝即位在永初三年（422年），而他的改元「景平」是在423年。我們從上文中一個「尋」字，可以知道顏延之的從京師出任始安太守，其間應當相距時間不會太長，絕不會弄到424年去了。蕭統《陶淵明傳》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可見顏延之的到潯陽應當祇是路過，因而他所停留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故「留二萬錢」也應當是在423年這一年。

對龐參軍的贈詩而作的。據淵明作於這年春天的那首五言詩的《自序》所載，淵明與龐參軍之間「自爾鄰曲，冬春再交」<sup>①</sup>，這也就是說他們的鄰居關係也還僅僅祇有兩年左右。而在作此詩之前，龐參軍已經有詩贈別淵明瞭，淵明在反復誦讀其贈別詩的前提下，纔提筆作這首答詩的。而在第二首答詩的開頭也有一個小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sup>②</sup>這就很明顯了：第一首五言詩是作於這年的春天，當時龐剛好被啟用為衛軍參軍，而第二首四言組詩的創作，乃是龐參軍從江陵出使上都路過潯陽時的贈答之作。對於龐參軍究竟是作誰的參軍，這也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按照傳統的說法，永初三年（422年），江州刺史王弘進號為衛將軍、開府三司，則龐大抵是在第二年（景平元年，403年）出任王弘的參軍的，於是引出了他與淵明這位鄰居之間的詩歌贈別。而在這年冬天，龐參軍奉王弘之命出使江陵之後，又在江陵接受了宜都王劉義隆（即後來的宋文帝，他當時為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守江陵）的使命赴都，這便路過了潯陽，得以與淵明敘舊，因而纔有後面那首四言詩的贈別。

淵明的兩首《答龐參軍》都是他送別詩中的佳作，這在他晚年，也是僅有的兩首送別之作了。今先錄第一首如次：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sup>③</sup>

通讀全詩，我們知道淵明與龐參軍之間的鄰居關係為時並不太長，但他們之間的情感卻是非常款洽的，他們兩個常常在園林裏共游，而在談吐之中卻沒有一句帶俗氣的話語，僅僅祇是聖賢的篇章；有時他們斗酒相酌，兩人盡興開顏。這就是詩人回憶他們昔日鄰居之間近兩年的歲月，那些日子自然是開心的日子，也是難忘的日子。這固然會使詩人逐漸地淡忘宋替晉祚之憂，且此時劉裕也命歸九泉了，自然使人

① 參見《陶淵明集》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陶淵明集》8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參見《陶淵明集》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覺得時過境遷了。但正在他們鄰居之間情誼款洽之際，龐卻又要啟程赴任衛軍參軍了，詩人接到龐的贈別詩時自然也應該是不勝感傷的了。淵明認為「物新人惟舊」（典故在《尚書·盤庚上》），他面對龐參軍此去後的「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的離愁，但有叫他珍惜自己身體的祝願，詩人也無法逆料他們此別之後，「來會在何年」了。

從本詩的內容來看，淵明在此時似乎已經不如往昔那樣貧窘至極了，那種「傾壺無餘瀝」（《詠貧士》之二）、「塵爵恥虛壘」（《九日閑居》）的境況，似乎也有改觀。可見，他的友人顏延之的解囊相助，確實也還紓緩了他這一段時間裏的手頭拮据的窘況，加之宋晉易代也逐漸事過境遷，故爾在詩人的情感上又產生了一個新的轉捩。作於這年冬天的那首四言贈別詩是由六首詩組成的，它是淵明晚年四言的佳品，謹錄全詩如下。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覲懷人；懼心孔洽，棟宇惟鄰。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歎，逝將離分；送爾於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sup>①</sup>

這組由六首四言詩構成的作品，其形式上在繼承《詩經》優良傳統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發展，更何況其內容中凝聚了詩人對良友的一番摯情，因而令人讀之感傷五內，乃至不禁淚濕青衫。

組詩之一描寫了詩人隱居的逸致，淵明雖然幽棲在簡陋的草廬，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89頁～9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但在那裏有琴書以消憂。從《晉書·陶淵明傳》中可以知道，他當年就蓄有一張無弦琴，他雖不解音律，而是獲得那種「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sup>①</sup>的閑情逸致。至於淵明的讀書，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了，他是一種憑著自己興趣讀書的方式，固然也是自具一種風格。詩人樂此幽棲，甘當陳仲子式的灌園叟，這就是他與當時的龐參軍之間的差異。但淵明畢竟是一個曾經有過仕途生活經歷的人，他早年出仕的阻風於規林的思親之痛苦、辛丑歲夜行於塗口的拂逆之情、己巳歲經錢溪時的羈役之苦等等，這些對他的體驗還不夠深刻的麼？惟其如此，詩人對龐參軍（也許龐參軍此時正值淵明當年的處境）的羈旅之苦頗有同情，故在第二首詩中，淵明敘述了他與龐參軍之間的親密關係。在淵明看來，人生之最可寶貴者並不在於金玉而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忠信，由於他與龐參軍之間有著共同的人生尚好，所以兩人的相處頗為開心。更兼他們又是鄰居，可以朝夕與共，那自然是難得的一種人緣。對於與這樣的友人的分手，詩人自然是不勝感傷的了。第三首詩回憶了詩人昔日與龐參軍鄰里之間的友好歲月：那種舉觴共酌的歡樂、那種談論詩書的雅興、那種互相賦詩唱和的逸致，在詩人的腦海裏似乎仍然歷歷在目。與具有此種情誼的人分別，固然會使詩人「如何不思」？第四首詩敘述了淵明送別龐參軍的情境，那種「送爾於路，銜觴無欣」的別恨，自然是溢於言表的了。詩人面對「依舊楚，邈邈西雲」，但有「之子之遠，良話曷聞」之永歎了。第五首詩抒寫了詩人兩次與龐參軍離別（含此次）的情境。第一次是當年的春天，當時「倉庚載鳴」，這便使我們自然聯想起了《詩經·豳風·七月》中「春日載陽，有鳴倉庚」<sup>②</sup>的詩句；而下面的「霰雪飄零」之句，又不禁使人聯想起《詩經·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sup>③</sup>之句。這種化《詩經》為己用的筆法，頗將兩次離別的痛苦心情渲染得淋漓盡致了。最後的「豈忘宴安？王事靡寧」兩句，又是化自《詩經·唐風·鴛羽》中的「王事靡盬，不能蓺

①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 2463 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

② 參見《詩集傳》90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版。

③ 參見《詩集傳》10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版。

稻黍」<sup>①</sup>等句，我們在上文中似乎也提到了。可見，對於龐參軍的行役之苦，淵明不止是深表同情，而且他自己也是深有體會的了。第六首詩表達了詩人對龐參軍別後的祝願，他希望龐參軍在此後多多保重身體，這與第一首五言贈別詩中的「君其愛素體，來會在何年」是遙相呼應的。

在淵明的晚年中，幸虧有顏延之這樣的好友對他在經濟上周濟，至於像龐參軍這樣不但能與詩人志同道合，而且又可以彼此賦詩唱和的友人，在詩人身邊實在不多。因此，在淵明晚年的送別詩中，也僅此兩首，但將它擺在在中國的送別詩中，也誠不失為佳作。通讀這兩首送別詩，我們不難看出淵明一生素來重感情、重友誼的性格，這一性格正好也是成就他詩歌創作藝術的必要的心理素質。

**堅拒檀道濟之饋贈** 424年七月，宋少帝劉義符被廢，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八月，改元「元嘉」。在宋文帝執政的元嘉的十三年間，劉宋王朝的統治逐漸地鞏固了，長江流域曾一度出現了東晉以來未曾有過的繁榮，使南方的經濟與文化得當了迅速的發展。但淵明的家境卻不然，自顏延之對他接濟之後，淵明的家境雖然出現了短暫的轉機，但顏延之自出任始安太守之後，在元嘉三年（426年）又被「徵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sup>②</sup>，而那位曾與淵明是鄰居的好友龐參軍也遠離了潯陽，加之詩人年邁久病，故爾家境日益窘迫。至元嘉三年，淵明年六十二，這年，檀道濟出任江州刺史<sup>③</sup>，當時淵明貧病交加，已經窮困到了極點。但淵明畢竟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對於好友顏延之的周濟是樂意接受的，對於那位「以清恬知名」<sup>④</sup>的江州刺史

---

① 參見《詩集傳》71頁～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② 參見《宋書》卷三十三《顏延之傳》264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

③ 《宋書》卷五《文帝紀》載元嘉三年五月，「征西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參見《宋書》26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8年版《二十五史》。

④ 參見《宋書》卷十二《王弘傳》78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8年版《二十五史》。

王弘的梁肉接濟可以說是勉強接受的，而對於劉裕手下的走狗檀道濟的饋贈，他是堅決不接受的。《南史·隱逸傳》載「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sup>①</sup>淵明晚年在寢疾飢餓好幾天沒有進食的情況下，尚且拒不接受檀道濟的饋贈，這足以體現他不接受嗟來之食的君子氣度。在這裏還必須補充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淵明的名「潛」這個問題，查所有陶集文字，如《孟府君傳》、《祭程氏妹文》等處，皆一一稱「淵明」，而稱「潛」者僅僅一處，而且還是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纔出現（即此處的與檀道濟對話），後來的《南史》祇是引述蕭統或沈約的《宋書》中的文字。因此，有人認為淵明的改名為「潛」是在入宋以後的事情了，表現了他不願意作為宋臣的願望。此說亦聊附如此，供讀者參考。

**《有會而作》之創作** 事實上，淵明當年的家境是非常貧窘的，我們從他作於這年的《有會而作》、《乞食》兩篇作品，就可以見出他當年窘迫的現狀來。在《有會而作》一詩的前面有一個《自序》，用以說明其寫作背景。謹錄如次：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以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sup>②</sup>

從這個小序來看，淵明的這首有感而作的詩，就是寫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季節，在東晉年間應當是在農曆八月左右。那種去年的舊糧喫完了，而今年的新糧又沒有收穫時的情境，筆者在三十年前奉「聖諭」躬耕時感受尤深。我們那時是種兩季水稻（若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則只種一季，大約農曆八月左右為收穫季節。則東晉時肯定也只種一季水稻了），每年的農曆五月至六月之間，那種飢餓的威脅就夠使人難受了，農謠所謂的「禾苗黃，餓斷腸」，那是一點也不錯的。淵明的此詩就是寫在

<sup>①</sup> 參見《南史》卷七十五《隱逸傳》615頁，山東出版總公司1998年版《二十五史》。蕭統《陶淵明傳》所載與此相同。

<sup>②</sup> 參見《陶淵明集》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這種青黃不接之際，他當時「旬日以來」，「煙火裁通」可見其家裏揭不開鍋的日子也不會是一朝一夕了。加之當年又遭天災，收穫新糧的希望是不大了的（肯定會歉收），如何安排一年的生活，這對於淵明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為難而且非常令人傷感的事。對此，淵明擔心後世的子孫們不知道他們的祖先還曾有過如此艱難的境況，故作此詩以紀之。

《有會而作》確實是寫實之作，謹錄全詩如下。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慙如  
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飯心，  
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  
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sup>①</sup>

這顯然是一首具有極強的寫實性的作品。在詩人的晚年遇上了天災，更兼他當時老病交加，過著「三旬九食」的日子。古語說「飢不擇食」，那是一點也不假的，記得我在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個大饑荒中，當時我們連樹葉與野草都喫光了，哪裏有人去考慮山珍海味呢！當時祇要能夠填飽肚子就不錯了，祇要能夠吞下去的東西都成了我們的佳餚。我們如果瞭解到了飢餓者的這種心理狀況，則對於詩中的「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兩個句子就會有深透的理解了。在詩中還引用了《禮記·檀弓上》中的齊國蒙袂人不喫嗟來之食而最終餓死的典故，詩中的「常善粥飯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四句，顯然是反其意而用之的調侃語，否則，檀道濟饋贈梁肉給淵明，他何以要「麾而去之」呢？自然，恪守孔子「君子固窮」的遺訓，不效「小人窮斯濫矣」，那纔是詩人的夙願，也是他敢於辭官歸隱、並「絕州郡之謁」的內在精神支柱。詩人認為：古人中這樣的榜樣很多，這在淵明所作的《詠貧士》組詩中就例舉了不少的固窮的古聖賢，他們成了淵明所誠心師法者。

**《乞食》之寫作** 如果說《有會而作》一詩是對淵明垂暮之年家境貧困的寫實的話，那麼，《乞食》一詩則是反映詩人向鄰居求助時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的尷尬場面。與《有會而作》相比，《乞食》一詩似乎更可以反映淵明晚年的貧寒，以及他作為一介士子晚年乞食於鄰里時的心酸。茲錄全詩如下：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sup>①</sup>

這首詩描寫了詩人在飢餓的驅遣下出門乞食的場面，尤其詩人作為一介書生，他何曾敢於向主人開口乞食呢？那種含羞忍辱的內心隱慟，恐怕不是紙墨可以形容得了的。詩中的「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兩句，可以說將文人行乞的那種窘相生動活潑地描繪了出來。幸虧淵明此次的乞食還遇到了一位慷慨樂施的鄰居，他不但沒有讓淵明受臉色（即給他難堪），而且還與詩人聊天談笑終日，並設酒款待這位富有才華而又年邁多病的詩人。儘管一個人他曾經一度是英雄，但他如果失去了昔日的環境，而被可怕的命運發落去行乞的時候，那「一飯之恩」自然也是終身難忘的。因此，詩中引用了《史記·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少年受漂母之食的歷史典故，其中自然隱含了淵明無盡的感恩之情。但詩人自認為他不如韓信，他在垂暮之年也不可能報答主人的恩情了，而只可能「冥報以相貽」了。

一代詩人，也可以說是東晉、抑或是整個六朝的劃時代的大詩人，其晚年的窮苦居然到了如此地步！歐陽修所說的「窮而後工」如果靈驗，莫非上蒼果真是以此道來成就淵明的詩歌創作麼！

元嘉四年（427年），這年也是淵明人生歷程中的最後一個驛站，他在這一年裏也逆料了自己的大去在即，因而創作了《挽歌詩》（一本作《擬挽歌辭》）、《自祭文》。像淵明這樣磊落地對待自己的生死，看破世間的虛榮，連《祭文》、《挽歌》也是由自己來作，他也真是死得灑脫、去得自在。且在淵明之前，尚未聞有自己作《祭文》、作《挽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9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歌》者，皆是人死之後，由其親人請人代筆而成。那種在人家生前說得一無是處，而到了人死之後卻又冒出了許多溢美之辭的文字，委實乎一文不值，連狗屁也不如；倒不如像淵明這樣自己寫來，倒是真是貼切，頗使後人景仰。

**自撰挽歌三首** 《挽歌詩》三首的文字比較平實，但感情真摯，這在東晉實在是難以覓得的好作品。謹錄全詩如下：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昔在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嶺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sup>①</sup>

淵明的這三首挽歌確也寫得平白如話，即便今日，喚童孺謳歌，也未見得十分費解，而在東晉時期，則自然會是婦孺皆歌的了。但詩人的用語雖然平白，未見得就是內容的淺顯，更不是內容的膚淺，淵明這三首挽歌的感人至深之處，也就在於他是以一種純素的心來從事其創作的，是以一種極其平常的心來看待生死的。淵明不信仰佛教，也不信仰道教，他奉行的是「子不語怪力亂神」<sup>②</sup>的古訓，這似乎頗爲傾向於儒家的思想。雖然，淵明的生死觀在信仰宗教者看來，實在是頗爲遺憾的（廬山慧遠法師未能招他入室，事實上也是一個遺憾），但也因爲他不相信世間有鬼神，於是乎也使他對於死亡特別地看得開、放得下，也沒有任何的懼怕。加之淵明在晚年或許已經接近家徒四壁的境

① 參見《陶淵明集》97頁～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論語·述而》，《十三經註疏》2483頁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

遇了，因此他更沒有什麼值得掛牽的東西存在了；即便是他在生，親舊招他飲酒時，他「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曾不吝情去留」<sup>①</sup>，他對人世間何曾有過留戀！由於他生前的這種生活方式的積習所成，致使他對世間的一切都看得很澹泊，因而他乃至對待自己的生死也不當作一回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正由於不信仰宗教，他也就不相信世間會有鬼神的，於是也就無所謂對死亡存在恐懼，加之他對親舊之間也無任何掛牽，因此他只把死亡當作一件極其尋常的事來看待，簡直就如同我們平常的衣食住行一樣了。

淵明畢竟是絕代的詩才，他同時也是絕頂聰明的人，因此他在自己生前就寫下了挽歌，幾乎將他死後的情境描摹得一絲無遺了。在第一首挽歌中，開頭兩句就將生死這種自然規律給提出來了，其中的「早終非命促」一句，似乎也帶有《莊子》中「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sup>②</sup>的思想傾向，但淵明畢竟又沒有完全照搬莊子的這種思想，因為他是詩人，他不是思想家、更不是哲學家，他無暇去作那麼多形而上的哲理思辯，他祇是認為當下如此，那就是說人生的生死本來就是如此，壽夭都是一期生命，在本質上面並沒有什麼壽夭的差別。淵明的高明之處，乃在於他以生人的身份來作死人的描寫，這簡直是奇才，也可以說是鬼才。他充分馳騁他想象的翅膀，在人生的生死這片廣袤的天空裏翱翔：他認為人死了以後，只不過是其魂的消散而已，而其形骸則寄托在空木（棺材）之中了。其實在東漢以前的人，並沒有後代人那種「鬼」的觀念，在許慎看來，人的死亡祇是陽氣已經完結了，因此他訓「鬼」為「歸」。段玉裁註《說文》引用《爾雅·釋言》曰：「鬼之為言歸也」；又引《左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又引《禮記·禮運》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sup>③</sup>。可見兩漢以

---

① 參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陶淵明集》1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參見王先謙《莊子集解》12頁～13頁，上海書店1987年版。

③ 參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434頁下「鬼」字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前的人是並不認為人死以後會變成鬼的，他們也不會相信還有一個永恆存在的靈魂。淵明對於人的死亡正是這樣看待的，加上他生前並不執著於人情的去留，培養了一種任運隨緣的情性，所以他非但不怕死，而且也不貪生。他以奇崛的想象力設想在他死去以後子女們的啼哭，親友們悲傷的情境，而這些情景在死人那裏來說，是無從知道了的，何況於那些世間的是非與榮辱毀譽呢？他認為他生前唯一的遺憾就是「飲酒不得足」，這既是一句俏皮的話，但也是淵明所說的一句老實話，他一生「性嗜舊，家貧不能常得」，加之晚年的貧窘，他更是無酒可飲了。這種無一絲自我掩飾的文字，簡直令我們可以透過其文字見到那一千六百載以前詩人的那顆純真的心了。

《挽歌》之二繼續圍繞他生前的飲酒不能滿足展開，詩人想象在他死後，一定會有美酒佳餚祭奠於他的遺體旁，但他遺憾的是「何時能更嘗」；他想象親友們一定在他的遺體旁哀哭，但他遺憾的是自己此時已經口不能言、目不能視了。其實，對於詩人來說，生與死的區別，也祇是「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而已。

《挽歌》之三是詩人對於他死後出葬場面的描寫。那種「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的情景，且從此以後伴隨他居住的就不再是昔日的人間草廬了，而是那一座座高聳的墳堆了。詩人對於馬匹的長嘶與秋風的蕭瑟作了描寫，將送葬的氣氛渲染得格外淒涼，他還奇瑰地設想到安葬他的墓穴一閉，他就將永遠不能回到人間來了，而這是自古以來的聖賢也無可奈何的事情。最後詩人構想送葬結束以後，人們各自回家，他們的生活又依舊恢復了正常，除了個別的親舊或許對他還有餘哀以外，其他人又快樂地歌唱起來了。而對於亡者本身來說，也是「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的了。像淵明這樣地看破生死，想必他一定會死得坦然，去得自在。

三首《挽歌》圍繞著詩人死了以後魂氣消散時的親舊哭喪情景、對亡者的祭奠與將亡者安葬的情景這三個環節展開，體現了詩人淡漠生死、放懷得失的情懷。尤其他所描寫自己生前的「飲酒不得足」與在祭奠他時而他面對美酒卻不能飲的遺憾，則更將詩人那種不假雕琢的本心和盤托出，足以見出其曠達的情懷。

**自撰祭文** 淵明不止是自作《挽歌》，他而且還自寫《祭文》，這在淵明之前恐怕尚無第二例。淵明在《自祭文》中所體現的思想，被宋人葛立方評價為「第一達摩」（見上文所引《韻語陽秋》文字），這雖然尚有偏愛的一面，但其中確實也還有耐人涵詠之處。我們不妨再將此文通讀一遍：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

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致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湟豈吾縉。掉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

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然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sup>①</sup>

《自祭文》的文字雖然不長，但它概括了詩人六十多個春秋的生平簡況，更體現了詩人的人生尚好與喪葬理念，與《挽歌詩》三首足以互為表裏，資相發揮。在《自祭文》中，淵明在交代了緣起之後，就敘述他一生的坎坷經歷，面對那種「簞瓢屢罄，絺綌冬陳」的日子，淵明「晏如」地度過來了；那破舊的柴門與草廬，是他朝夕樂於安居的處所。非但如此，淵明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親自下地耕種，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獲取衣食之資；而在農閑時，他與老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132頁～1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他可以「樂琴書以消憂」了。面對短暫的人生，他一切都能放下，一切「樂天委分」，絕不怕死貪生；對於世間的榮辱毀譽他全能看破，因為那些由別人強加給他的觀念並不等於是他人生的實際。他樂天知命，仰慕高隱，從不貪戀人間的虛榮……面對他人生終結時的歸葬，淵明也是那樣地坦然，他並不主張厚葬，但也不願意裸葬以見笑於世人，他選擇了常人安葬的標準，而更追慕上古「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的淳朴作風<sup>①</sup>。至於人死之後的祭文，淵明則更是看破了，他本來就「匪貴前譽，孰重後歌」，自然就無須那些在亡者靈前討殘羹的無聊文人來粉飾他了。對此，筆者頗為贊同，吾亦近天命之年了，人間婚喪之事多寓目焉，那些人往往在亡者生前說得他一無是處，而到了死後卻又要敷衍出許多溢美之辭來，那種用以佞諛孝家而討得殘羹的文字，吾實在將之看得連狗屁都不如，這也是筆者輕視韓文公作祭文一事的原因所在。其實，早在東漢時期蔡伯喈，便對他所撰寫的祭文深感愧疚，那段話還被明人馮夢龍所徵引<sup>②</sup>，便足以說明傳統碑銘祭文之弊端了。

正因為淵明一生放懷得失，看破虛榮，甘守固窮之節，因而他頗得人生高隱之趣。在人生的臨終之際，乃是歲寒後彫的關鍵時刻了，無論有的人生前如何說大話，我都不願意聽，我就喜歡看淵明這樣坦然地面對臨終。淵明能夠如此灑脫地對待自己的臨終，也無怪乎後人懷疑他精通禪法了。事實上，在禪者臨終之際，其去得灑脫的偈頌也有不少，然竊獨喜好南宋芙蓉道楷的《示寂偈》，今謹鈔錄如次：「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sup>③</sup>淵明雖不精通禪法，他也不善道法，但他生來就這樣任運隨緣，心無緇染，故爾在他臨終的當下那一念就灑脫自在

---

① 《周易·繫辭下傳》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參見《十三經註疏》87頁上，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版。

② 《太平廣記》卷十二《趙逸傳》的總批中說：“蔡伯喈曰：‘吾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惟為郭林宗碑頌無愧色耳。’然則諛墓之弊，自古已然。而修史者欲以墓誌為徵，尚得為信史乎？”

③ 參見《五燈會元》卷十四《芙蓉道楷傳》886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了，這在俗家恐怕也難以找到第二例了。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三編中說：「陶潛是儒家，兼有道家思想，臨終時作挽歌和自祭文，從容自在，比畏死的佛徒，不知高明多少倍，萬卷佛書，何曾抵得陶潛的三首挽詩和一篇自祭文。」<sup>①</sup>誠然，范文瀾先生並不很理解佛教，他的非佛也是很不可取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其中確實也有一小部分不肖佛子，他們在臨終時是絕不會如淵明這般灑脫、這般自在的。

淵明就以這樣灑脫的態度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那段路程。卒於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sup>②</sup>。淵明卒後，其好友顏延之為他撰寫了《誄文》（詳《附錄三》），延之根據淵明的行狀，「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sup>③</sup>古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淵明在生前雖然沒有獲得豐厚的物質享受，他也沒有得到人間的虛榮，但他以他傲然的風骨立世，以他灑脫的風度處世，以他精美的詩文傳諸後人，他因此而對後世產生的影響至為深遠，且至今尚為吾人所鍾愛。在淵明逝世後不到半個世紀，沈約（441年～513年）在纂修《宋書》時就為他立傳；稍後時蕭統（501年～531年）將他的作品編輯成集子，並為之作傳、作序。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

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並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亦乃爵祿可辭！不勞復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sup>④</sup>

淵明在死後能得到蕭統如此高度的讚賞，豈祇是因為他一生過得自

---

① 參見《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二冊 570 頁，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② 朱熹在《通鑑綱目·宋紀》中說：「十一月，晉陶徵士潛卒。」明人袁黃將《通鑑》與《綱目》二書合璧，纂成《了凡綱鑿補》一書，在該書的《宋紀》中亦引述了這段文字。參見清刻二十八冊線裝本《了凡綱鑿補》之十一冊六頁。

③ 參見《文選》卷五十七《陶徵士誄》791 頁下，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④ 參見《陶淵明集》10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在、過得灑脫，而是因為他的人格偉岸、他的情操高潔、更兼他的詩文創作獨擅六朝文壇，且長為後世文人所青睞、所借鑒、所贊歎。《陶淵明集》自宋元廣為刊佈以來，版本甚多，且評註屢出，這也充分地說明了他的作品以其永恆的藝術魅力在長久地感召著後人，在濡養著後人的藝術創作才華，在陶冶著中國人民的高雅情操。

## （二）陶淵明對後世的影響

**關於作者的歷史定位** 淵明生活在東晉後期與劉宋之間，他的人生是坎坷的，但他的精神生活是豐富的，尤其是他的人格則是偉大的。淵明一來到這個人世，陶氏家族便開始中落了，在淵明七、八歲之間，他的父親就離開了人世，到他二十歲左右，其家境更加貧困了，以故他在《自祭文》中說：「自余為人，逢運之貧」了。淵明晚有子息，他二十九歲左右，其長子陶儼纔降生人世，他不勝欣喜地寫下了《命子》一詩。誰知來年他的妻子卻又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中年喪偶的悲痛使淵明寫下了那篇被蕭統認為是「卒無諷諫」的《閑情賦》，那實際上就是對他亡妻的一種曲折的懷念。記得《竹坡詩話》載：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

「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

「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sup>①</sup>

其實，淵明何曾有兒女私情的描寫，那純他是對亡妻的懷念而已。

淵明二十九歲開始出仕，起為州祭酒，但他不久就辭歸了，雖然他辭歸的具體原因不明，但我想這肯定與他的屈身仕下有關，就如吾儕此時事事必須向那些半文盲請求指示的那種況味，而淵明是一個極富才氣而又注重自我人格自尊的人，面對這種處境，他自然會毫不猶豫地辭官的。此後近六年長的時間，淵明一直在家賦閑，直到隆安三年他纔到桓玄的屬下去作官。但淵明那酷愛自由的秉性，以及他掛念

---

<sup>①</sup> 參見《歷代詩話論作家》93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親友、樂於「親戚共一處」(《雜詩》之四)的生活方式，也決定了他此次的作官為期不久。事實上，他在此其間的阻風於規林時的喟歎，在夜行塗口時「投冠歸舊墟」的打算，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了。加之他在隆安五年喪母，於是桓玄門下的那個差事總算免除了。大約在義熙元年，淵明曾在劉裕與劉敬宣的門下作過參軍，但那祇是短暫的當差，義熙二年還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澤令，此後他就長期歸隱了。淵明面對當時「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心，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序》)的現實，加之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後患」(《與子儼等疏》)，他從此便決意終身隱居了。

在隱居期間，淵明「既絕州郡之謁」，同時也謝絕了活動於他家鄉潯陽一帶的宗教團體的邀請(「請息交以絕游」)，其中既有來自於廬山的佛教團體邀請，大概也會有來自於江州王凝之那裏的道家團體的邀請，他對這些都不予理會，過上了躬耕自給與琴書以消憂的隱居生活。但淵明隱居後的生活也並不是那樣一帆風順，在他隱居後的第三年，其草廬就被火燒了，使他舉家遷居在一個船舶上度日。早在義熙元年，他因為程氏妹的去世而及早辭去了彭澤令，而接著他的從弟敬遠、仲德又相繼去世，這對於富有情感的淵明來說，無寧是一種精神上的沉重打擊。淵明的待親人是那樣地友善，他待子女也特別地慈祥，他的五個兒子都不愛好讀書，對此，淵明並沒有嚴父式的苛責，他祇是自我寬慰地說：「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家族的人丁日益單薄、子嗣又無長進，這些痛苦在常人那裏肯定是不好承受的，但淵明則素來任運隨緣，他以極其澹泊的觀念以處之，以極平常心態來視之。

發生在元熙至永初間的政治變故，確實也曾一度使淵明為之震撼，為之傷感。陶集中的《述酒》、《擬古》、《詠荊軻》、《詠三良》等作，的確也是反映他這一時期的心理隱慟的作品。此後詩人家境日益貧窘，儘管其間江州刺史王弘間或對他有酒米之乏的周濟，其好友顏延之也有二萬錢的饋贈，但這些畢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詩人晚年的貧困處境。尤其是到了元嘉年間，淵明不止是沒有酒喝了，他而且連飯也喫不上了，那種「老至更長饑」的日子，實在是令人心酸的。他

甚至還被飢餓驅遣到鄰居那裏去乞食，在淵明的詩中，那種對漂母之惠的幾乎要熱淚盈眶的感激，足以見出其晚境的淒涼。但詩人對這些都以極平淡的心來處之，他乃至在臨死前還自作挽歌、自撰祭文，以十分灑脫的風度離開了這個曾經給予了他無盡的痛苦與感傷的人世。

淵明是一代詩人，而且是第一流的詩人，他的出世可以說是整個六朝文壇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在淵明的思想中，來自於他家族的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觀念的影響，這在他的思想中恐怕是佔了主導的地位的，但由於日後的社會腐敗黑暗、時局的動蕩不安、世風的頹敗、家境的貧窘等因素，致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些老莊思想的影響，其間還從《論語》及其他文獻裏的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伯夷、叔齊、榮啟期、張摯等隱士的行狀中接受了他們幽棲的情懷。淵明的隱居，不似有的隱者那般待價而沽，他是真正地隱居了，他而且還自己親自下地勞動，通過自己的耕種來滿足自己的衣食之需。這種思想觀念的形成，一是來自於孔子「固窮」的理念之影響（這是最主要的，也是原則性的），二是來自於長沮、桀溺等古代隱者的以實際行動歸隱的感召。對此，蘇軾認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秀』，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sup>①</sup>拙著在上文中也曾對此作過評述。由此可知，淵明並非是那種以躬耕的方式干名於世的人，他確實是把農作當作解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手段（「衣食固其端」）。也因為他長年從事耕種，以故他患有羸疾；也由於他長年的耕種，他與農民之間建立了很密切的關係，那種「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歸去來兮辭》）等文字，就足以說明他與農民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了。事實上，在他的《飲酒》組詩之九中的田父清晨來叩門請他喝酒、《歸園田居》之五中的「隻雞招近句」等例子，都反映了淵明與農民之間的那種親密關係。他這樣親自下地勞動，勢必會使他的詩作更加貼近農作、貼近於農民（即他周圍的父老鄉親）、貼近於大自然。

淵明一生不信仰任何宗教，廬山慧遠法師招他上山，他至而「攢

---

<sup>①</sup> 參見《珊瑚鉤詩話》卷一所引蘇軾語，《歷代詩話論作家》86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眉而去」，他與精通禪定的劉遺民之間交往非常親密，但他並不讚賞劉遺民住山的舉動，他很坦白地告訴遺民：「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和劉柴桑》）。陳寅恪先生說淵明是一個天師道徒，這也很不確切，淵明的一生不但與五斗目教沒有任何來往，而且對於其從弟敬遠因住山辟穀修道而導致中年夭折，淵明頗為惋惜，也頗為痛恨道家的欺騙性，故爾他在《祭從弟敬遠》文中說：「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其實，淵明非但不信仰宗教，他甚至連世間「神鬼」的觀念也沒有，他更不相信還有一個永恆不滅的靈魂存在。他看待人的生死，就如同看待世間的草木枯榮一樣，認為是一種極其平常的自然規律。

淵明對於理想的人類社會也曾有過憧憬，在他所處的東晉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裏，這種憧憬自然會更加強烈。從《歸園田居》中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的描寫，到他後來創作《桃花源詩並記》時，其中對於「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設想，可以見出他對這種理想的社會模式的構想是前後承貫的。在這種社會裏，沒有當世官場的傾軋，也沒有官方租稅的強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地龐樸淳美。在他的這一理想的社會模式中，自然有一些成分是來自於《老子》的「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但其中無疑也接受了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等人躬耕實踐的直接影響。在動蕩的年間中向往太平盛世，在世風日下中向往龐樸的民風，這應當是人之常情，而淵明利用文學的形式展示了人們對這一理想社會的憧憬。

淵明崇尚自然，他注重主體人格的尊嚴，他酷愛自由，具有一種不事雕琢、不加文飾的淳朴性格。這在他那篇帶有很強的自敘性特色的《五柳先生傳》中，就有「曾不吝情去留」的說法，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也說他「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sup>①</sup>事實上，淵明非但在親友面前不掩飾自己，就是在他的子女面前，他也不對自己作半點文飾，他很坦率地告訴他的兒子們：他具有「性剛才拙」的缺點，而且對於

---

<sup>①</sup> 參見《陶淵明集》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因為他的個人因素所造成的子女們「幼而飢寒」，他還深感內疚。也正因為詩人具有這樣一種秉性，具有這樣一顆不著緇染的純潔的心，因而他很適合於作詩人，而他事實上也成為了中國詩壇上屈指可數的詩人。

淵明的生前並不十分富有，他的晚年乃至「旬日以來」「煙火裁通」，他甚至還被饑餓驅遣到鄰里家去乞食，這樣心酸的人生，對於淵明委實乎太不幸了。但在淵明的人生中，還有他十分幸運的一面，那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給後人留下了一百四十二篇詩文作品。由於詩人晚年貧寒，其兒子們又不讀書，他的文稿難免沒有散佚的可能，到蕭統為他編纂文集時，尚有「更加搜求」之勞，其作品的散佚恐怕也是在所難免了。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衡量一個作家的地位，決不可能單純地以其作品的多少作為唯一的標準，而往往是以其作品的藝術價值的高低來定位的。在陶集中，除了《歸園田居》、《飲酒》、《桃花源詩並記》、《自祭文》等一系列名篇以外，其餘作品也無一不是佳構。淵明的詩文，其寫景狀物宛爾目前，敘述人情則體貼備至，其出語平實而內蘊深邃，實在令人一唱三歎、乃至反復涵詠其間。綜觀陶集，其詩歌作品既有四言詩，又有五言詩；而其散文及其他作品，則既有辭賦，又有傳記，還有疏啟、哀祭、題贊之什，亦可謂洋洋大觀矣。

淵明的四言詩祖承《詩經》的傳統，開有晉之詩風，其中《命子》對子嗣的厚望、《停雲》對親友的思念、《榮木》中的人生易老之歎、《贈長沙公》中的同宗之情、《答龐參軍》的惜別之恨、《勸農》的力耕精神、《歸鳥》的歸隱之念……其作無一不佳，無一不耐人詠歎。尤其是詩中的用語平實，則更貼近生活，更具有藝術魅力，即便是詩中的用典（例如我們在上文中所討論過的《答龐參軍》詩），也是化古語為今用，用典於詩中，令人不覺，如同溶鹽於水，至飲水時方知咸味。淵明的五言詩在繼承漢樂府、「古詩十九首」的傳統下，其創作又有了新的突破，要在其用語平易而意境高遠。其中若按內容而分，則既有敘事詩，又有記游詩，還有詠史詩、贈別詩、郊祭詩等，但無論是反映哪一個方面生活的五言詩，可以說首首都耐讀，篇篇都有佳

句。其中「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夜行塗口》）的惜別親人之情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違」（《與從弟敬遠》）的固窮之節，「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歸園田居》之二）的閑靜心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之三）的躬耕生活，「門前多落葉，慨然已知秋」（《酬劉柴桑》）的時令之驚，「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之八）的閒適之意，「阡陌不移舊，邑屋有時非」（《還舊居》）的人世滄桑之感慨，「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悲從弟仲德》）喪親之慟，「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讀山海經》之一）的耕讀之樂……開卷游目，佳句赫然，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淵明之爲文，亦多佳構，對於其中的傳記、題讚之什，我們暫且不論，單就其中的辭賦與哀祭文字，就似有諸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處。辭賦一體，始於楚騷，盛於兩漢，至左思之《三都》，則蔚爲大觀矣。而在淵明這裏，騷體只《歸去來兮》一首，賦則《閑情》、《感士不遇》而已（因牽涉到學術辨說，以免破壞文氣，故將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提出，置於附錄部分，詳《附錄一》）。其篇幅雖然不多，但極具特色。《歸去來兮辭》踵楚辭之步武，開新賦之先河，其中無論敘事抒情，還是寫景狀物，皆方駕前賢，垂範後學。尤其是其中所體現的歸隱的逸致，恐怕不是那些「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文人墨客可以炙手的。而在賦體方面，《閑情》一賦，雖重在言情，而深得「國風好色而不婬，小雅怨誹而不亂」<sup>①</sup>的旨趣；至於《感士不遇賦》一篇，則批評時弊，鞭辟入裏，且其展示高雅情趣，躍然紙上。此二賦將兩個漢以來賦體的長篇巨製作了改造，使那種「鋪采摛文，體物寫志」<sup>②</sup>的偏重於詞彙堆砌的古賦，改變成了描情繪志，直接表達作者思想情感的文學樣式。從此以後，賦體便走出了文人的象牙塔，來到了抒寫靈性的文苑之中，爾後的抒情小賦代出，乃至到蘇軾的《赤壁》二賦，無不從這裏獲取營養。至於淵明的哀祭文字，陶集中共三篇，其中還有一篇是《自祭文》。但三

<sup>①</sup> 參見西漢淮南王劉安《離騷序》，《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已引用，光緒十年上海同文書局刊行的線裝本 30 冊《史記》之 23 冊。

<sup>②</sup> 參見《文心雕龍·詮賦》，《文心雕龍校證》4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篇文字無一不佳，要乃篇篇出乎摯情，字字飽和熱淚。這種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哀祭文字，自然會成爲了中國文學中的佳品。

**對後世的影響** 我們對於淵明的生平及其文學創作有了一定的歷史定位以後，再來考察他對後世的影響，自然就會有的放矢了。如果站在宏觀的角度上來看，淵明對後世的影響是雙重性的，一是他作爲一代偉大詩人的人格對後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的文學創作對後世所產生的藝術的、抑或是美學的影響。

站在人格的角度上來看，淵明的形象是高大的。他的歸隱不止是體現了他不願意與污濁的統治集團合作，從而保持其自身的純潔，而更體現了他甘於寂寞、甘守貧窮的高尚氣節。我們在引言中曾經提出來了，淵明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與其不能以其主觀意志來改變那個社會，還不如潔身自好、歸隱田園爲好，免得助紂爲虐、對人民犯下不會饒恕的罪行。另一方面，要歸隱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做到始終不渝的隱居，那就更需要一種「固窮」的氣節來支撐了。淵明在隱居的過程中備嘗辛苦，乃至後世蘇軾在評價淵明時，還認爲他的「不爲五斗目折腰」的做法不可取，而蘇軾的一生雖然那樣地任運隨緣，但他一生東徙西遷、逆來順受，也未見得就足取，倒不如淵明那樣決意歸隱，既來得灑脫，也去得自在的好。淵明在隱居中沒有任何宗教情懷在支撐他的「固窮」理念，他完全是依靠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的那樣一種浩然正氣在維繫其隱居生活。他在隱居的期間，爲了解決自己生活資料的來源，他不惜親自下地勞動，在陶集中，「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歸園田居》之三）、「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於西田穫早稻》）、「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雞鳴；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回」（《於下潁田舍穫》）等句，若不是有親身勞動體驗的人，是絕對不可能讀出其中的韻味來的，且莫說寫出這等精美的文字了。最可貴的還是淵明在晚年之中，他雖然貧窮到了近乎乞食的地步，但他依然傲骨凜然，他面對檀道濟的施捨，「麾而去之」，體現了中國文人的那種偉岸氣節。像淵明這樣以自己堅忍的意志來隱居，自始至終不渝初衷，以實現他崇高的操守者，是古來就少有的。中國人中號稱隱者的

人很多，但果真如淵明者又有幾何！因而淵明作為中國士大夫的偉岸人格、高潔的情操，對後世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人們尋常說隱者，也未嘗有不提到陶淵明的，其原因率皆在此。

淵明對於後世的影響之至大者，還至於他的詩文創作這個方面。他通過他自己的創作實踐及不朽的藝術作品，濡養著後世的文學創作，為中國的文學寶庫增添了異彩。自唐宋以來，後人的詩話及其他評論文字，鮮有不涉及淵明之詩文者，其評價的角度也很全面，我們在這裏無法一一例舉。而在這裏，我們想就淵明的藝術風格及語言特色來作一點討論。

如前所說，淵明是一個注重感情的人，他待親友誠懇，對子女慈祥，待農人鄰居如朋友，他的這種性行注定了他同樣是一個忠實於藝術的作家。另一方面也因為淵明具有一種磊落率真的性行，他的為人不但沒有任何機巧心，而且其心體之純潔，可以說是無一絲塵滓的。他以這樣一種純潔的心量來觀物，則眼前的秋菊春山、斜川夏雨、新月平湖，無不顯現出其真實的美之境界來。禪家所謂的放下一切、一絲不掛、當下即得，乃是以一種無垢染的心體來觀照事物，而淵明雖然沒有逃禪，但他的這種心境，這種境界，在某些方面卻正好與禪家的悟境耦合，無怪乎宋人葛立方謂淵明為「第一達摩」了。加之淵明具有極高的才氣與悟性，他以純潔的心體、以絕倫的穎悟來觀照審美對象，於是乎無論是寫景狀物，抑或是敘事詠史，其筆下的文字皆不著塵俗氣，而盡得風流。我們在上文中曾例舉過他上文中的「遠我遺世情」（《飲酒》之七）、「虛室絕塵想」（《歸園田居》之二）、「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等句，這顯然是最能代表淵明的這種藝術風格的佳句了。在淵明的筆下，哪怕是對於那些人生中拂逆的事情、抑或是痛苦的事情，但經過他的藝術大筆一點化，也就飄逸清新極了，例如《自祭文》中的「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等句，即是其例。儘管有的人死死摳住陶集中的「猛志逸四海」（《雜詩》之五）、「猛志故常在」（《讀山海經》之十）等個別詩句大作文章，但殊不知淵明處在「傾壺絕餘瀝」（《詠貧士》之二）的境況下、「擁褐曝前軒」（同上）之時，他仍然能不失以往悠閑的風度。即便是在宋晉易代之際，詩人正在經受心靈的痛

苦撞擊之時，他也不乏「無懷」、「葛天」（參見《五柳先生傳》）式的傲骨，也還有「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桃花源詩》）的綺思。飄逸、靜穆應當是淵明詩文創作的整體風格，也是他一貫的藝術審美理想。但他的藝術創作在統一於閑靜、飄逸這個主旋律的前提下，又充分發揮其創作才華，體現其藝術創作風格的豐富性。因而在淵明的詩文之中，偶爾出現了一二句「猛志」的詞彙，也並無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淵明創作的語言風格對後世的影響也很深遠。如果要評述陶淵明的語言風格，我想：用平實、清新來概括，應當不會有很大的錯誤。淵明的這一語言風格的形成，大抵也與他不尚奢華、不事文飾的人品直接相關。對此，《海藏詩話》曰：

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而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實」。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為詞體耳。又子由敘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臞而實腴」，乃是敘意在內者也。<sup>①</sup>

蘇軾所謂「外枯中膏，質而實綺，臞而實腴」的評論是比較中肯的。淵明的這一語言風格的形成，除了他超人的藝術才華的資質因素以外，還與淵明的躬耕自資、貼近民眾、貼近大自然有關。惟其對於現實生活的體驗如此真切，因而其文學創作無須華麗的辭藻，僅以樸實清新的文字，就可以達到驚人的藝術效果。更兼淵明那絕倫的天資與超邁的穎悟，乃至使得其尋常文字從他筆下拈出，也一一生動活潑、出神入化了。與淵明同時代的作者相比，那種綺靡的文風、鋪采雕琢的時尚，顯然是不足以寓於淵明之目的。故宋人葛立方認為：「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sup>②</sup>金人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說：「一語天然萬古

<sup>①</sup> 參見《歷代詩話論作家》91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②</sup> 參見《韻語陽秋》卷一，《歷代詩話》483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sup>①</sup>這些前人的評述，多中肯綮，淵明無論是作詩著文，皆從平實中見出奇崛，於淺近中滲透著摯情。

淵明的藝術語言非獨平實清新，而且要言不煩。在陶集中，我們幾乎很少發現他有長篇巨制，淵明將無盡的思想內涵熔鑄在有限的文字之中，因而賦予了這些平實清新的語言以極大的藝術潛能。例如他那頗帶有自傳色彩的《五柳先生傳》，全文不足二百字，但我們讀罷試閉目而思，一千六百載前的詩人不是宛然在於目前麼！他那灑脫的風度、任運的人生態度、傲然的風骨，不是給了我們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了麼！其《自祭文》全文也不過四百字左右，但字裏行間，詩人的行狀、喪葬的理念，還有那種輕鬆地別離人世的氣度，不是仿佛入於我們的眼目了麼！即便是他的用語極為通俗、乃至近乎打油詩的《止酒》一詩，其文字雖然淺近但不失之俚俗，使得詩人那嗜酒的個性凸然出現在紙上。

淵明的創作風格與語言藝術無疑成了後代文學創作的楷式，也在代代相續地濡養著後人的文學創作。唐人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等人，無不從中汲取創作營養，宋人蘇軾則對淵明則更是推崇備至，即便是李、杜等大家，也無不借鑒於淵明的詩文創作。但後世的詩文創作卻很少有超過淵明者，對於他所開創的田園詩風，孟浩然雖步其後塵而不及淵明之淳美，王維習其山水描摹而終不及淵明的樸素清新。《蔡寬夫詩話》對此頗有評論：

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②

這就說明了淵明的文學創作不但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還在

① 參見《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冊 85 頁，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② 參見《歷代詩話論作家》101 頁，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國的文壇上建造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對於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定位，我想朱光潛先生的評價應當還是比較中肯的，姑引述他的這段文字作為此篇的總結吧。

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祇有屈原，後祇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鬱，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麼淳、那麼練。屈原低回往復，想安頓而終沒有得到安頓，他的情緒、想象與風格都帶著浪漫藝術的崎嶇突兀的氣象；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瀅，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肅穆。杜甫還不免有意雕繪聲色，鍛煉字句，時有斧鑿痕跡，甚至還笨拙到不很妥貼的句子；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極境而使人忘其為藝術。後來詩人蘇東坡愛陶，在性情與風趣上兩人確有許多類似，但是蘇愛逞巧智，缺乏洗煉，在陶公面前真是小巫見大巫。<sup>①</sup>

---

<sup>①</sup> 參見《詩論》305頁～30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

## 五、附 錄

## 一、關於陶集中未定年代的作品

在陶集中還有好幾篇作品一時無法確定其年代，且有的作品的寫作年代也頗有爭議，如果放在評傳中來討論，也許會使讀者對淵明的思想發展歷程的認識有所掩蓋，乃至使全書的重點顯得不突出，故聊且附錄篇末來討論，從而既使全書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又不破壞全書的評述語氣。

《讀〈山海經〉》是由十三首五言詩組成的，從第一首詩中的「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sup>462</sup>來看，這個組詩應當是作於五月這個季節。整個組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第一首交代寫作背景，抒寫詩人隱居的閑情逸致；從第二至第十二首是讀《山海經》一書的隨感；第十三首從齊桓公不聽管仲臨終的遺言，而遭受易牙、豎刁等人的禍患，乃至臨死時飢渴無告的教訓來告誡「帝者慎用才」。若平心而論，《讀〈山海經〉》應該是淵明在義熙年間歸隱不久的作品，尤其是第一首詩（序詩）中所寫的境況，更應該是淵明義熙初的實況，而決不可能是在永初中所作了。再則，組詩中具有總結作用的第十三首中的「帝者慎用才」一語，也完全是影射晉武帝啟用司馬道子的這一失誤，而與永初年間的宋晉易代毫無關係。至於組詩中的第十一首雖然似乎可以影射晉恭帝事，但其記載與《山海經》的內容直接相關，像淵明這種「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詩人，對於讀書有感者未見得就不形諸文字了。在組詩中所吟唱的每一個《山海經》的故事，也未見得全部都能與現實掛得上鉤，而僅僅祇是淵明歸隱之後以讀書的方式來遣悶的一種閑情逸致的流露而已。

---

462 參見《陶淵明集》8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十分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大陸以往近四十年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定位，幾乎就是以魯迅的幾句話作為鐵律，這在中國長達四十多年的學術史上未嘗不是一種悲劇。王瑤先生就是依據魯迅的幾句話來確定淵明整個組詩的思想意義與歷史年代的<sup>463</sup>，他認為這個組詩中的第十一首「是為劉裕弒逆而作」<sup>464</sup>，這完全是一種可憐的附會之說，這種學術悲劇也應該成為歷史的過去了。但《讀〈山海經〉》這個組詩也確實難以確定其創作的具體歷史年代，但大致作於義熙中淵明歸隱的早期，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事了，在他的晚年確實已經是「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詠貧士》之二）的了，他恐怕再也沒有逸興來讀完這部篇幅過長著作了。

其實，我們評價陶淵明不應當太政治化了、太情緒化了，要知道陶淵明僅僅祇是一個詩人，他絕不是一個政治家。《讀〈山海經〉》這部組詩，僅首尾與《山海經》無關係，其餘皆是詩人

---

463 王瑤在他所註解的《陶淵明集》的前言中，就是用魯迅的幾句話來作為陶淵明的歷史定位的。其中有《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題未定（草六）》的這幾句話：「被論客讚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未整天整夜地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更加抑揚，更離真實。……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就不禁為古人惋惜。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又《題未定（草七）》中「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就是魯迅的這幾句話，便成了王先生整個著作的全部出發點，他僅僅祇是在這幾句話的圈子裏跳來跳去地找論據（參見《陶淵明集》1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1983年重印）。魯迅固然有他的高明之處，尤其是在對中國舊文化的批判方面，對於文壇的筆戰方面，他確實是功績卓然的，但未見得他所說的話就處處正確，而需要我們對於文獻作客觀冷靜地思考以後，才可以下結論，切不可在人家的牙慧裏拾餘唾。

464 參見《陶淵明集》82頁～83頁中的註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的讀書筆記，事事在《山海經》中可以找到證據，難道說古人的讀書筆記也非得與政治掛鉤不成！這個組詩的體例，第一首是序詩，最後的第十三首為終篇，或曰如騷體詩中的「亂曰」部分。它是詩人義熙年間隱居之後在躬耕之餘，體現其「樂琴書以消憂」的那個生活側面的作品，並與晉恭帝的死扯不到一起去。我們先看其序篇（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以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  
 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  
 《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sup>465</sup>

這哪裏有零陵王被害後的那種「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的隱慟呢？這分明是詩人歸隱之後躬耕之餘（農閒時）以讀書消遣的閒適生活之寫照。而他這裏之所讀，非孟亦非孔，而是《山海經》（當時有郭璞的「圖贊本」）與汲冢所出土的《穆天子傳》這類奇書，這自然是隱逸消閑的所讀之物了，亦展現了隱居者的讀書之樂了。我們再看「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兩句，與《歸園田居》之二中的「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之間，不正好互相印證、資相發揮麼！其中「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兩句，也分明是義熙初歸隱的氣象，在《歸園田居》之五中的「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還有《和劉柴桑》中的「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不也是與之境界相似麼？最重要的還是陶淵明晚年因羸疾而乘籃輿，他在那個時期恐怕是無法再從事體力勞動了的，因而「既耕亦以種，時還讀我書」的情景，也絕不會出現在詩人酒食匱乏、老病交加的晚年了。更何況自義熙的歸隱之後，反映淵明躬耕的詩作有《歸園田居》、《庚戌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丙辰歲八月於下潁田舍穫》等作品，而唯獨沒有反映他讀書生活的作品。如果說《讀史述》九章還可以

465 參見《陶淵明集》8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勉強算是詩人在永初年間的作品的話，則此篇一定是詩人義熙歸隱時（大約在義熙元年至二年之間，即西元 405 年至 406 年之間）的作品了，這樣纔與詩人《歸去來兮辭》中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的實際生活相符合。

我們再來看《讀〈山海經〉》的最末一篇：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

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sup>466</sup>

在這裏，詩人例舉了兩個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加以對比，前者是舜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禹山而啟用大禹，從而使天下大治的故事（見《尚書·舜典》）。後者是齊桓公在管仲臨終時曾問易牙、開方、豎刁三人可以啟用否，管仲告訴他不可，而桓公不聽，啟用了這三人，結果導致齊國大亂，桓公自己在臨死時連飢渴也無法解決，乃至後悔莫及而死（事具《史記·齊太公世家》）。這樣兩相對比，就很有力地說明了舜由於啟用人才得當而天下興旺，桓公由於用人不當而自身難保的道理，從而突出了「帝者慎用才」這個主題。事實上，晉武帝在太元間的啟用司馬道子，就是屬於用人不當，從而導致了隆安年間司馬道子父子的專權，桓玄的篡逆等一系列的社會動蕩。而晉恭帝僅僅祇是劉裕扶植起來的一個東晉王朝的傀儡，劉裕既然能夠立他，自然也能夠廢他，這與「帝者慎用才」又哪裏能夠強扯到一起呢？王先生在魯迅的「聖旨」下妄斷這個組詩是永初年間的作品，委實乎可笑，亦委實乎可悲。

《讀〈山海經〉》中間的十一首詩純是讀書筆記，像淵明這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讀者，他在讀書有感時焉有不作札記之類文字的呢？祇是因爲淵明長於作詩，故爾他以詩來替代札記文字了而已。下面，我們將中間的十一首詩的內容提要如下。第二首詩是對《山海經·西山經》

<sup>466</sup> 參見《陶淵明集》8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中「西王母」那段文字的觀感，卒章的「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sup>467</sup>兩句，其落筆在西王母為穆天子作歌謠，其弦外之音在於表達詩人不同凡俗的見解。第三首是對《西山經》中「玄圃」（《山海經》作「平圃」）的歌讚，其間也表達了詩人對這個遠離塵世的絕境的嚮往。第四首是對《西山經》中所描寫的「丹木」產生的感想。第五首是讀《西山經》中「三危之山」中三青鳥故事後的感想，詩人由是而生「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sup>468</sup>之想。第六首是讀《東山經》中「無皋山」的感想，其中「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sup>469</sup>兩句，則是對《大荒北經》中神人開目天明、閉目天晦、燭照九陰之幽的歌讚。第七首是讀《海外南經》中「三株樹」之後的歌讚。第八首是讀《海外南經》中「交脛國」民長年不死後的歌讚。第九首是讀《海外北經》中夸父的故事而作的歌讚。詩中「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sup>470</sup>兩句，對於夸父死後造福子孫的精神，予以了熱情的歌頌。第十首便是魯迅所稱引為「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了，我們索性將全詩鈔錄如下。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sup>471</sup>

詩人在這裏引用精衛與刑天的故事，對於精衛填海的不懈精神與刑天斷首以後不墜其志的品性，詩人無疑是讚賞備至的，這也是詩人自義熙終身歸隱不仕後能「固窮」的內在修養所在。其實，這又與「金剛怒目」有何干系呢？這是一種純然冷靜的理性評述，而絕不是所謂的那種「金剛怒目」了。第十一首被

467 參見《陶淵明集》8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68 參見《陶淵明集》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69 參見《陶淵明集》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0 參見《陶淵明集》8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1 參見《陶淵明集》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王瑤先生認為是「爲宋武帝弑晉恭帝而作」<sup>472</sup>，其實此詩是綜合了詩人讀《海內西經》「疏屬之山」與《西山經》中「鍾山之子」等處故事以後寫成的感想。其中以「巨滑（一本作『危』）」殺欽馭的貳逆之行，窳窳的被負貳之臣殺死後變化成龍首之物（見《海內南經》）等故事，從而提出了「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sup>473</sup>的思想。王先生就將這些與劉裕的殺恭帝扯到一起去了，這樣乍看似乎也還有一點道理，但通觀全部組詩就很不協調了。且《晉書·武帝紀》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武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sup>474</sup>這中間難道不也存在著弑逆之舉動麼？再說，晉武帝在這裏確實是死得不明不白，因而詩人認為雖然世人不清楚，但未見得就沒有上天的明鑒，這與詩意之間要脗合得多。而劉裕的殺恭帝，可以說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不敢言的事，又何須這樣來一個隱喻呢？第十二首是讀《南山經》中的鷓鴣現而其縣必多放逐之士，從而聯想到楚懷王放逐屈原時，他曾疑心此鳥多次飛到楚國來了。篇終以「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作結，說明了此鳥並非實有。

中間的這十一篇，沒有哪一篇與讀《山海經》的內容無關，這顯然是詩人在春忙之餘讀書消遣而信手拈成的，根本就無法與政治強扯到一起。且讀《山海經》非同讀《史記》，其中多怪異的風物，也多屬於子虛烏有，若不爲了休閒，又何須去讀這類書呢？可見，《讀山海經》這個組詩是作於詩人義熙歸隱的初年，它是體現淵明躬耕之餘的讀書生活的作品，而絕不是什麼「金剛怒目」，也與宋晉易代毫無關係。

陶集中的《詠二疏》也應當屬於淵明在義熙年間的作品。

472 參見《陶淵明集》86頁之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3 參見《陶淵明集》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4 參見《晉書》卷九《武帝紀》24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二疏就是西漢時期的疏廣與其兄子疏受二人，疏廣官至太子太傅，疏受的官也做到了太子少傅，他們在職五年之後，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名位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當時公卿大夫故人等送行者車百乘，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每日設酒食與故舊賓客娛樂，不留金錢。《詠二疏》就是對此事所作的歌頌。詩作除了敘述二疏以上的事跡以外，還認為「誰云其人工，久而道彌著」<sup>475</sup>，這顯然是對二疏作法的贊同。今案：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交代自己辭歸的原因時，似也有「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之語，殆他當年也覺得自己如果還勉強在官場混下去，就很難說不遭咎尤了，故亦如二疏一樣及早地歸隱了。又二疏歸隱後不積蓄錢財的做法，與淵明的「不營家業，家務悉委之兒僕」<sup>476</sup>頗為相似。因而我們從中可以瞭解到淵明的歸隱，其間還隱含了他在官場無法適應，並擔心因此而獲咎的原因。那麼，此詩的寫作宜在義熙年間，甚至還在義熙初年，而不應該是淵明晚年的作品。

還有《感士不遇賦》一篇，淵明在這篇作品中例舉了各種歷史事實，從中引出了歷史的教訓，批判了當時的世風日頹，表達了詩人終身歸隱的決心。如果按照這一思想內容，似乎也應該是義熙初年的作品。但王瑤先生認為其情趣與《讀山海經》相似，宜置於永初三年<sup>477</sup>。而逯欽立先生認為當作於義熙二年，以賦中的「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市」等句而立論<sup>478</sup>。今案：淵明義熙歸隱，其為詩者有《歸園田居》，其為騷者有《歸去來兮辭》，則其為賦者當

475 參見《陶淵明集》9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6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477 參見王註《陶淵明集》1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78 參見逯註《陶淵明集》27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爲《感士不遇賦》了。三者宜合爲一個整體，方可系統地瞭解陶淵明在義熙歸隱前後的思想發展歷程。至於淵明晚年在宋晉易代及恭帝被殺時，他的思想確實產生了一定的波動，甚至還出現過短暫時期的突變，但其情感應該是悲憤，而絕不會再去敘述自己的歸隱緣由了，且此時詩人也已經隱居達十七年之久了，他又何須舊事陳提，弄得沒完沒了的呢？誠然，淵明雖然在永初元年至二年間情緒曾一度低落，但他此後家境日益貧窘，更兼疾病纏身，使他晚年很少從事詩文創作了。他在晚年（424年）寫給龐參軍的詩的序言中說：「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sup>479</sup>，這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因而他也不可能去創作《感士不遇賦》這樣的長篇了。

《感士不遇賦》的前面有一個序言，敘述其寫作的緣起，其文字如下。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sup>480</sup>

通讀這篇自序，我們就會很清楚淵明此賦的寫作動機了。說穿了，淵明的《感士不遇賦》實質上就是感歎他自己生不逢盛世。在他所處的那個年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真正恪守君子操行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而在士族階層中，已經沒有昔日的

479 參見《陶淵明集》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0 參見《陶淵明集》127頁~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那種廉潔謙讓的美德了，而是以毫無廉恥的手段去干名干利。這種現實是淵明所無法接受的，自然也成了他歸隱的直接動因。也由於淵明感歎在那個污濁的世道裏立行之難，故爾他纔去翻閱那些古聖賢的文章，在閱讀董仲舒與司馬遷的《士不遇賦》之後，便立即引發了詩人感念古人的情懷，由是而創作了這篇《感士不遇賦》（亦即讀《士不遇賦》有感）。

賦的文字比較長，我們不可能全部錄出，僅就其主要思想來作一個比較系統的評介。賦的開頭文字首標「人」在三才與五行中是靈性獨具者，而自古君子就有「擊壤而歌」或「大濟蒼生」的兩種處世之道。接著，淵明道出了他所處的時代的特點：「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因而在他的人生中只存在「乃逃祿而歸耕」<sup>481</sup>的唯一出路了。既而，詩人抒寫了他自己的情操，他仰慕上古的淳朴社會，他能甘居貧困，且在他的一生中認為沒有比為善更開心的事了。但儘管他「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sup>482</sup>，只因為他不遇時，「雷同毀譽，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有道者云妄」<sup>483</sup>。面對這樣一種社會現實，他能不歸隱麼？其中「物惡其上」一句，似乎進一步為我們提供了淵明歸隱的原因，儘管其他文獻載淵明歸隱，均沒有說出一個究竟來，而在這裏，我們似乎見到了淵明在官場上所遭受打壓的隱曲了。再接著，詩人歷舉張釋之、馮唐、賈誼、董仲舒等前賢不遇時的事跡，說明了「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社會風氣由來尚矣。此後，淵明筆鋒一轉，引出了《老子》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格言，然後對此又提出了質疑。這頗與組詩《飲酒》之二（詳上文）的那種思想情緒相近，說不定此篇就是作於隆安至義熙之間（402年～

481 參見《陶淵明集》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2 參見《陶淵明集》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3 參見《陶淵明集》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06年)。詩人對於《老子》的格言（其中還包含了「天得一以清」等格言<sup>484</sup>）提出質疑之後，便從反面例舉了伯夷、顏回等善人遭受惡報的歷史事實，從而說出了「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sup>485</sup>。在賦的收束之處，淵明再度表明了他的人生理想：「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市朝。」<sup>486</sup>顯然，這是詩人決意歸隱之作，自然應當是寫作在他彭澤歸來之前後，而他也斷不至於拖到永初年間來重溫這些舊事了。可見，《感士不遇賦》與《歸園田居》、《歸去來兮辭》三篇比較長的作品，應該是淵明彭澤歸來的時所作，它們是淵明的歸隱原因與隱居逸致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後人研究淵明彭澤歸隱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文獻。

陶集還有一首《臘日》，應當是作於歲暮的蜡祭之日。這種祭祀禮儀在周代叫做「蜡」，漢代叫做「臘」，其祭祀時間大約在冬至後的第三個「戊」日，發展至今天，大概也就演變成了我們臘月二十四的祭灶神了。此詩描寫了蜡祭的祥和氣氛，其卒章一句「章山有奇歌」<sup>487</sup>，倒爲我們推斷其創作年代提供了一根線索。《山海經》卷五《中山經》曰：「（鮮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sup>488</sup>，而詩人在這裏既是以章山之僊歌娛神，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對來年美景的憧憬。淵明大概在義熙二年的孟夏讀《山海經》而作組詩十三首的，而這個《臘日》的寫作內容又與《山海經》直接相關，故其寫作時間

484 在《感士不遇賦》中有這樣一句：「澄得一以作鑒」，其出處在《老子》之三十九章。其原文爲：「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參見《二十二子》5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85 參見《陶淵明集》1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6 參見《陶淵明集》1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7 參見《陶淵明集》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88 參見《山海經校注》1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大概去此不遠，也許就是這年的臘月。

《詠三良》在陶集中也是難以確定年代的作品，這首詠史詩取材於《詩經·秦風·黃鳥》。當年秦國盛行殉葬的禮俗，至秦穆公死時，殉葬的人多達一百七十七人，而其中還包含了子車氏的三良（奄息、仲行、鍼虎），秦人不勝哀之，而述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sup>489</sup>。淵明在此詩中說：「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sup>490</sup>，有人認為這是影射張禕，因他不願意向晉恭帝進毒酒，乃自飲而死。這似乎有一點道理，但仍需要更有力的證據纔能定論。

《詠荊軻》一篇是陶集中的名篇，但一時也難以確定其具體的寫作年代。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的事跡實在太感人了，淵明採集其舊史寫成了這首詠史詩。詩人對於荊軻刺秦王的不成功甚為感歎道：「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但他認為荊軻儘管沒有將秦王刺死，但他也將名垂後世，「千載有餘情」<sup>491</sup>。有人認為此詩為永初年間所作，這倒有一定的道理，其實，淵明在《擬古》之八中就有「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sup>492</sup>之句，因而應當與《擬古》的寫作時間相近，大約在永初二年（421年）左右。

陶集中的《聯句》一詩，是淵明與愔之、循之三人的唱和之作，內容是詠雁。詩中的愔之與循之兩人已經無法可考實了，且在淵明的詩文與行狀中均未涉及這兩個人的事跡，故無從考證。又《聯句》的前面四句題為淵明所作，其中有「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sup>493</sup>之句，這似乎不應該是淵明的口吻。雖然「居士」一詞在東晉時期並不完全是家佛教徒的專稱，但這

489 參見《詩集傳》77頁~7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90 參見《陶淵明集》9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91 參見《陶淵明集》9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92 參見《陶淵明集》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93 參見《陶淵明集》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個語彙在淵明的詩文中畢竟只見到了這一處，也許此詩是後人所竄入亦未可知。

## 二、《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疾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日，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

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

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 三、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侵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體解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紉緯蕭，

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繁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絮，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均，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賔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嶺，葺宇家林；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儵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觀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

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 四、陶淵明詩文繫年表

歷史年代	淵明年齡	淵 明 作 品
393年	29歲	《命子》？
394年	30歲	《閑情賦》
400年	36歲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歸林》二首
401年	37歲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雜詩四首》（共12首，其最後四首似與前面八首內容不同，故入另外入此年）
402年	38歲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和郭主簿》二首
403年	39歲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勸農》、《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飲酒》二十首
404年	40歲	《停雲》、《榮木》、《時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連雨獨飲》
405年	41歲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歸去來兮辭並序》、《詠二疏》？
406年	42歲	《歸園田居》、《歸鳥》、《讀〈山海經〉》十三首？、《感士不遇賦》？、《蠟日》•
407年	43歲	《祭程氏妹文》
408年	44歲	《責子》、《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409年	45歲	《和劉柴桑》、《酬劉柴桑》、《己酉歲九月九日》
410年	46歲	《庚戌九月於西田穫早稻》
411年	47歲	《移居》、《祭從弟敬遠文》
412年	48歲	《與殷晉安別》
413年	49歲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形、影、神》三首、《止酒》
414年	50歲	《雜詩》八首（另外四首附於前面）
415年	51歲	
416年	52歲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附 錄

4 1 7 年	5 3 歲	《贈羊長史》、《還舊居》、《悲從弟仲德》？
4 1 8 年	5 4 歲	《贈長沙公》？、《酬丁柴桑》？、《諸人勾划周家墓柏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歲暮和張常侍》？
4 1 9 年	5 5 歲	《九日閒居》
4 2 0 年	5 6 歲	《詠貧士七首》、《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 《五柳先生傳》
4 2 1 年	5 7 歲	《遊斜川》、《擬古》九首、《桃花源記》、《述酒》、 《於王府軍座送客》、《與子儼等疏》？、《詠荊軻》？、《詠三良》？
4 2 2 年	5 8 歲	
4 2 3 年	5 9 歲	《答龐參軍》二首
4 2 4 年	6 0 歲	
4 2 5 年	6 1 歲	
4 2 6 年	6 2 歲	《有會而作》、《乞食》
4 2 7 年	6 3 歲	《挽歌詩》三首、《自祭文》《聯句》？

說明：凡是加「？」者為疑似此年者，《聯句》一詩尚未確定其年代，故列於表外。

陶淵明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卒於劉宋元嘉四年(427年)。其中所歷帝王年號為：海西公(司馬奕)執政為366年；簡文帝司馬昱執政為371年；孝武帝司馬曜執政為373年；安帝司馬德宗執政為397年；恭帝司馬德文執政為419年。宋武帝劉裕開創宋朝為420年；宋少帝劉義符執政為423年；宋文帝劉義隆執政為424年。

## 後 記

光陰荏苒，轉瞬又是新年了。這個年頭對於人們來說，並非尋常的新年，乃是人們所翹首盼望的二十一世紀；而在吾生也非同平常，乃是吾生的「天命之年」了。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我癡長了這麼多歲，反思一生，良多慚慙。而最不幸者乃是人生五十，卻又遭逢失業，面對眼前的衣食毫無著落，實在感到人生無常，「去日苦多」。而聊為慰藉者，乃是吾處此艱難之時日，居然完成了一部《陶淵明評傳》，總算可以略不愧對這人生難得的「天命之年」了，也可以馬馬虎虎地去迎接那個舉天下皆大喜慶的「千禧年」的到來了。

對於陶淵明的詩文，吾自幼輒喜之，三餘之日，鮮有不研讀之者，亦鮮有不涵詠之者。但每每臨文嗟歎，恨不與古人同時，而得一夕之歡晤者。然自吾從教以來，光陰每每耗費於毫無意義的瑣事，且諸多是奉命執行的應付各級檢查的弄虛作假「工作」。因而儘管有心對淵明的詩文作一些研究與整理，但無賴時間白白耗費，乃至人生已屆「天命之年」而一事無成。而至今日，被迫「下崗」，方於痛定思痛之餘，得以回味淵明的詩文作品，勉強寫成了這部著作。回想吾之昔日，受苦良多。吾生而十月，慈母棄世，賴祖母艱難撫養成人。在昔年幼，人人得以欺之，頗有《樂府詩·孤兒行》中「助我者少，啖瓜者多」的感喟。且衣食毫無著落，夏日長饑，冬日苦寒，孤苦伶仃，至於成立。至於「志學之年」，又奉命下鄉務農，頗賴吾一生能喫苦耐勞，晝為農夫，夜輒燃燈苦讀，儒家經典、佛道要籍，皆於斯時略已粗覽。入學後，則更能刻苦，自修彌勤，由是於中國文化方有一些粗略的涉獵。然秉性剛正不阿，不屑屈躬，良恥諛世，故與世多忤，乃至垂暮之年，衣食尚無著落。而吾一生之毫無後悔者，乃是至今尚未做過一件違心之事，故雖家境貧寒，然起臥坦然，一切無所挂碍也。

如果站在人生之窮達來看，吾之一生辛苦，實在是人生之大不幸也。若於治學來看，若無飢寒交迫的生活體驗，又焉知淵明「夏日抱長饑」的艱苦？若非文人而遭小人之屈辱，又焉能體會淵明「毀譽雷同，物惡其上」（《感士不遇賦》）的況味？若非當年奉命下鄉務農，又焉知「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的苦楚？若無借貸之生活經歷，又焉知淵明乞食時「叩門拙言辭」的尷尬？若無「固窮」的氣節，又焉敢面對那些衣冠禽獸的施捨「麾而去之」……看來，人生的幸與不幸，實在是相輔相成的，「失之東隅，得之桑榆」，良有以也！吾生若無如此辛苦之遭逢，或許還歡欣於人生的得意之中，而喪失吾之夙志，淪為一介庸人。而今吾雖然並無任何造詣，但於艱苦之中，尚且成就了十二種著作，或許對中華文化也有少許貢獻。況且，吾既為華夏子孫，則吾之全部生命自然應當屬於這個民族的了，故不管今後人生路上還有多少艱險，吾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地去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事業略盡綿力。

人生在艱難困苦之時，良友的提攜自然是不亞於雪中送炭的。在吾失業之時，謀生實在太難，而余一介腐儒，拙於言辭，焉能作出「自插草標出售」之勾當？此時，二三友人，數次致函慰問，並鼓勵吾從事學術研究，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援助。由是吾遍稽群籍，竊雅好隱逸文化，而此文化之中又非淵明無以為代表也，故決意寫成此書。自七月受意以來，迄今半載，余焚膏油以繼晷，檢討昔日諸種心得筆記，查閱各種能夠獲得的文獻資料，總算完成了這部著作，沒有愧對摯友的厚愛了。

然而，由於吾所處之治學環境並不很好，各種文獻資料也不可能全部翻閱，只恐拙著之中尚有諸多未妥、甚至是謬誤之處。凡此種種，均是筆者之所至為惶恐者，亦是敬請讀者之多多諒解者。時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長沙蔡日新謹識於興漢門外之酌爽齋。